

李坚真回忆录



李 坚 真 回 忆 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北京

李坚真回忆录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印 刷：北京朝阳新源印刷厂

850 × 1168毫米 32开 7.125印张 185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6000册

ISBN 7-80023-387-1/K · 390

定 价：7.50元(精) 4.50元(平)



李坚真近照

李 坚 真 简 介

李坚真同志系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6月入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闽粤赣特委妇委书记，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妇女部长，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长征时在中央纵队任干部休养连指导员。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先后任东南局妇女部长，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兼党校主任，华中局民运部副部长，华东局妇委书记，山东分局妇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分局妇委书记，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粤中区党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监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李坚真养父家——广东省丰顺县蕉头窝村。



珍)，
斯诺摄。
一九三六年在陕北（右李坚真，左为高敏

一九四一年苏皖抗日根据地部分领导同志合影，左起：苏皖区党委书记邓振询、新四军16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苏皖区党委组织部长李坚真。



一九四二年在上海与邓振询合影。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日在第一次全国妇代会主席台上。右起：李德全、李坚真、谢雪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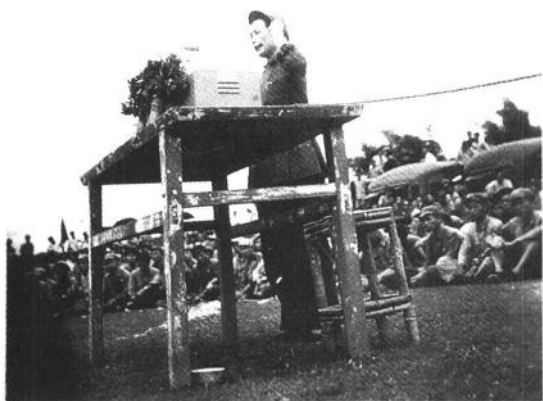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25日在北平西苑机场与毛主席合影
(左二为邱一涵)



1949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妇代会期间，参加过长征的妇女代表合影。前排左起：刘英、陈琼英、戚元德、周月华、危秀英，中排左起：邓六金、(左二不祥)、吴仲廉、(左四不祥)、李伯钊，后排左起：吴朝祥、邱一涵、康克清、李坚真、李贞、廖似光、蔡畅。

一九五〇年十月，
在广东省兴宁
县作土改动员报告。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休息室。左起：李坚真、区梦觉、蔡畅、刘少奇。



五十年代，党内几位大姐在一起合影。左起：李坚真、帅孟奇、钱瑛、邓颖超、蔡畅、区梦觉。



1977年在广州和韦国清一起向邓小平汇报工作。
左起：韦国清、邓小平、李坚真。



1977年在广州白云机场和邓颖超合影。左起：
邓颖超、王首道、李坚真。



1979年12月，在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做
工作报告。左起：罗天、习仲勋、李坚真。



1980年，出访罗马尼亚时参观当地果园。



1980年，在广州向叶剑英祝贺寿辰。



1981年7月，当年长征中干部休养连的老战友相逢在北京。左起：谢飞、钱希君、李伯钊、刘英、李坚真、邓六金、钟月林、侯政。



1981年在广州会见爱尔兰总统夫人梅芙·希勒里一行。



1984年在北京与福建的领导同志合影。左起：陈丕显、李坚真、罗明、谭震林、傅柏翠、江一真、项南。



1984年，广东省五届人大期间，与梅县地区的代表在一起。



1987年5月，在深圳与彭真等领导同志合影。
左起：薛焰、李灏、林若、彭真、李坚真、罗天、
宋志英。



1987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休息室与任仲夷(左)、谭启龙(中)合影。

序 言

读完徐冲同志写的《丹心映山河》原稿，我不禁为作者和亚雄同志本人都表示衷心的祝贺。作者值得祝贺的是，他能有幸在他要写传的人病危前几年中，每星期以半天时间访问本人并为她录音，再依照录音写稿后又逐章请她阅读修改。这些年来不少人为老一辈革命者写传记的人都只能在他们逝世后收集资料，或依靠别人的回忆，写出来往往有失实之处。徐冲同志在这方面得到了可靠的保证。这也是很少人有过的幸福。

现在全部材料写成，显然不能仅仅留给家里子女教育之用，而应当象许多亚雄生前战友、同志们提议的那样公开出版，使广大群众都有机会深刻认识这位令人深深怀念的无产阶级女革命家。

我虽对亚雄同志的经历不太陌生，但只在她生平的几个特定时期有过接触。她从苏联学习回国，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她同陈原道同志先后由中央派到天津，负责整顿并在河北省委工作，不久河北新省委遭到破坏，亚雄同志被捕，与我同时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另外就是在原道同志牺牲后的1934至1935年间，亚雄寻找党的组织关系寄居于太原和北平，和我有过接触。抗战以后，亚雄同志在山西过着游击战争的戎

马生活；解放战争年代，她在东北辗转各地，主持地方党的工作。我们都没有见过面，关于她的事迹，仅止同志们片断提到。这次读了徐冲同志所写传记，才获得系统的了解。

我和亚雄接触的那两个特定时期，都处于很不正常的恶劣政治环境之中，但她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毕生难忘的。她生活艰苦朴素，待人诚恳亲切，政治上敏锐勤奋，自强不息。她的优良品质，与她一生的斗争经历印证起来，始终如合节符、表里如一。今天回顾亚雄同志生平，我最深刻的总印象即是：她是一位从不知道屈服的女革命家。

亚雄同志的中小学生时代，大体没有碰到特别的困难。自从进入北京女师大以后，六十多年生涯，都是在和各种各样的困难与危险拼搏。1924—1925年间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斗争，对她是最初期的锻炼，加入中国共产党，又经过莫斯科中山大学两年马列理论学习，世界观根本改变，党性大大增强，自1928年底回国之后，她就一直以职业革命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了革命斗争。从到达上海的第一天起，她就没有脱离敌人的监视、跟踪和逮捕的白色恐怖。第一次严重的考验是1931年4月，刚刚建立起来的河北新省委被叛徒出卖，亚雄同志被捕受到刑讯关进监牢。出狱后返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每天每刻都处在特务的包围窥伺之中，也就在这非常困难的时候，她得到了原道同志被捕并被敌人杀害的噩耗。党为了照顾怀孕的亚雄同志，调她回到北方，却

又经历了将近三年找不到党组织的苦闷生活。就在这王明宗派主义盛行，敌特空前猖狂的时期，亚雄同志担负了丧失最亲密的同志、爱人，抚育襁褓中幼儿，失去党组织关系的沉重悲恸和精神、生活重担。多少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正是在这种类似的情况下，为解决实际困难而经不住考验，而亚雄同志，却挺着腰杆，坚持不屈，体现了共产党人钢铁意志和崇高品格。

恢复党的关系之后，在山西抗战形势下；亚雄同志大展革命身手，参加“牺盟”，领导女兵连，进入太岳和太行游击区，有时一夜疾行七、八十里，过的是女“夏伯阳”式的战斗生活。她同日寇战斗，同软骨头分子斗争，同左倾极端者斗争，同旧军军官斗争，还要和疾病斗争。担任根据地历史上第一位女专员之后，又要和来自敌人和我们队伍内部的各种险恶与困难斗争，如期如数地完成了为抗日大军和游击队的征粮和制作被服的艰巨任务，并在武乡筑坝截流，发展生产，手书“人力胜天然”几个大字，留下了她同贫困作战的战绩，也留下了她不屈的闪光精神。

在同一切困难和危险斗争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由于党的工作方面的某些错误带来的荒谬的误解。在这方面，亚雄遭受苦难最大的当然是“十年浩劫”。但是，在此以前，在延安整风时期，在康生“抢救运动”的大棒之下，亚雄同志即被诬为叛徒，参加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山西牺牲大同盟也算为“反党”，并被撤销党的“七大”正式代表资格。亚雄同志不能接受康生的

诬蔑，她奋起斗争，向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严肃汇报，据理力争，阐明真理，终于得到了正确结论。

一个共产党员，藐视敌人的威胁、刑讯、监禁，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勇敢；忍受穷困饥饿等物质熬煎，也不能算特殊的坚强。然而在自己最信任的党的误解或别有用心的人的诬蔑面前，能克制自己，用行动、事实、等待等等证明自己的无辜，则是绝对不寻常的，所谓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确实是得到验证的真理。这一方面，刘亚雄同志当之无愧。她的一生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艰难险阻可以使她屈服！她不知道屈服！

刘尊棋

序 言

陈 丕 显

李坚真同志献身革命事业已有 ~~十~~ ~~多~~ ~~年~~ 她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强的女老红军战士，~~为我国~~ ~~的~~ ~~妇女~~ ~~运动~~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她就 ~~冲破~~ ~~封建~~ ~~枷~~ ~~锁~~，投入革命的怀抱。当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危险关头，她毅然加入中国 ~~中~~ 共产党。从此，她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她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中32位英勇的女红军之一；她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火磨炼和考验。她先后从事妇女运动、土改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成为中央苏区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她在土改中就某些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称赞。无怪乎美国友人斯诺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在她所著的《续西行漫记》中，赞誉她：“刚毅果敢而且精明干练，实在是中国最受压迫的阶级，在革命领导的形式下所能产生出来的最动人的标准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李坚真同志长期在广东担负领导工作。她在任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在试点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政策，为全省的土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她在主持粤中区党委工作期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集中力量发展农业，建树颇多。她在任广东省委书记兼监委书记期间，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既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又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并以思想教育

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她主持全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热情接待来访的干部与群众，尽量帮助他们落实政策，消除怨气，振奋革命精神。她在晚年肩负广东省首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重任，为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经济特区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干部群众亲切热情，从而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大家尊称她为“李大姐”。

我认识李大姐已整整六十年了。1931年我们在中央苏区第一次见面时，我只有15岁，她长我9岁，所以我一直叫她“李大姐”。1934年10月，她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我随项英、陈毅同志留在远离党中央的赣粤边，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国共合作抗日，项英同志亲赴延安，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并向中央要干部。后来，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了一些经过长征的干部到江西，其中就有李大姐。我和李大姐同历战争的严峻考验，在江西重逢时，激情满怀，倍感亲切。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李大姐任分局的妇委书记、妇女部长，我任分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1939年3、4月间，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她和我分别继续从事妇女和青年的群众工作。在合作共事的过程中，她对党的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后来她和她的丈夫邓振询同志在苏南坚持战斗，而我则随陈毅同志赴苏北敌后开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然而，共同的奋斗目标，始终把我们联结在一起。

《李坚真回忆录》形象地再现了李大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斗生涯，生动地记述了彭湃、毛泽东、周恩来、陈潭秋、董必武、邓颖超、张闻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她的亲切关怀与爱护，深刻地反映了她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崇高品质。这部回忆

录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记叙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并穿插了她在各个历史时期创作的山歌，感情真挚，文笔质朴。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党史参考资料和对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我兴味浓厚地读了李大姐的这部书，感到有责任将它推荐给读者。我深信，在渗透与反渗透、演变与反演变、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中，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同志，一定可以从这部书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

1991年元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陈丕显
第一章 踏上革命征途	(1)
一、苦难的童年	(1)
二、彭湃指引我走上革命路	(3)
第二章 参加武装暴动	(9)
一、丰顺暴动	(9)
二、年关暴动	(11)
三、丰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3)
四、饶和埔根据地	(16)
第三章 进入中央苏区	(18)
一、在闽粤赣特委	(18)
1. 和村巧遇张鼎丞	(18)
2. 首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19)
3. 闽粤赣边区第一次党代会	(21)
4. 反“立三路线”	(23)
5. 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24)
6. 闽西山歌	(25)
二、到长汀当县委书记	(27)
1. 嫩肩挑重担	(27)
2. 布置假会场	(30)

3. 周恩来的教诲	(31)
4. 闽粤赣省党代会	(34)
5. 腿勤、手勤、嘴勤	(35)
6. 支援东路军攻打漳州	(37)
三、闽西的土地革命	(38)
1. “抽多补少”与“抽肥补瘦”	(38)
2. “何时分田何时得禾”的后果	(41)
3. 按人口分田还是按劳力分田	(42)
4. 查田运动	(45)
四、在福建开展的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48)
1. 事情的起因	(48)
2. 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情况	(51)
3. 强迫命令进攻大田屋	(52)
4. 李明光牺牲	(54)
五、重回省委妇女部	(56)
1. 陈潭秋指导我做女工工作	(56)
2. 福建省第三次党代会	(57)
第四章 在红色首都瑞金	(59)
一、进中央党校学习	(59)
1. 党校的课程	(60)
2. 董老是非分明	(61)
二、在中央局妇女部	(63)
1. 中央局机关	(63)
2. 苏区的妇女工作	(64)
第五章 长征	(69)
一、出发前的准备	(69)

二、踏上长征路·····	(72)
1. 告别众乡亲 ·····	(72)
2. 途中的群众工作 ·····	(73)
3.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	(76)
4. 在土城安置伤员 ·····	(79)
5. 遵义会议的传达 ·····	(81)
三、长征中的干部休养连·····	(83)
1. 特殊的连队 ·····	(83)
2. 钟赤兵锯腿 ·····	(86)
3. 茅台酒香 ·····	(88)
4. 报务员不能丢 ·····	(89)
5. 贺子珍负伤 ·····	(90)
6. 寄放连长之争 ·····	(92)
7. 金沙江畔的欢声笑语 ·····	(94)
8. 难以忘怀的收容队 ·····	(96)
9. 过泸定桥 ·····	(98)
10. 雪山千里行 ·····	(101)
11. 女红军的艰辛 ·····	(103)
12. 七天七夜过草地 ·····	(106)
四、长征胜利到陕北·····	(111)
1. 脱离险境 ·····	(111)
2. 胜利到达陕北 ·····	(112)
3. 长征山歌 ·····	(116)
第六章 陕北岁月·····	(119)
一、初到陕北·····	(119)
1. 从吴旗到瓦窑堡 ·····	(119)
2. 瓦窑堡的婚礼 ·····	(121)

3. 赤源筹款	(123)
4. 谢唯俊同志牺牲	(127)
二、到陕北省委	(128)
1. 在省委妇女部	(128)
2. 三边巡视	(130)
三、重回中央妇女部	(131)
1. 洛甫召见	(131)
2. 率工作团进延安	(133)
3. 参加延安会议	(135)
4.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党代会	(136)
5. 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	(137)
6. 三进中央党校	(139)
第七章 奔赴华东抗日前线	(140)
一、参加新四军改编	(140)
1. 到长江局	(140)
2. 新四军一支队的改编	(141)
3. 新四军二支队的改编	(143)
4. 闽西妇女的杰出代表范乐春	(144)
二、在江西省委	(145)
1. 重建省委的工作	(145)
2. 抗战初期的江西妇女工作	(146)
3. 江西青年抗日服务团	(148)
三、到东南局妇女部	(149)
1. 撤出南昌	(149)
2. 东南局妇女部	(150)
第八章 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52)

一、在苏南根据地·····	(152)
1. 到上海治病·····	(152)
2. 到新四军军部·····	(154)
3. 苏皖区党委党校·····	(155)
二、邓振询在皖南和苏南的工作·····	(157)
1. 皖南特委书记·····	(157)
2. 苏皖区党委书记·····	(158)
3. 痛失亲人·····	(163)
三、再当县委书记·····	(165)
四、在苏皖区党委组织部·····	(168)
第九章 在华中分局民运部·····	(174)
一、淮安鹅钱乡的土改实验·····	(174)
二、新安和莱阳土改·····	(181)
三、撤退到大连·····	(183)
第十章 华东局的妇女工作·····	(184)
一、发动妇女群众支援淮海战役·····	(184)
二、率团出席第一次全国妇代会·····	(185)
第十一章 广东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190)
一、重回故园·····	(190)
二、兴梅调查·····	(191)
三、“全省着眼，三县着手”·····	(192)
四、土改机构的建立·····	(193)
1. 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组建·····	(193)
2. 省土改工作团的组建·····	(195)
五、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步骤·····	(196)

094844

六、三县土改的具体做法·····	(199)
七、几个特殊问题的处理·····	(204)
1. 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	(204)
2. 对工商业者的政策·····	(206)
3. 乡村小圩镇的问题·····	(208)
4. 如何对待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的问题·····	(209)
八、三县土改的成绩和问题·····	(210)
九、对三县土改的再认识·····	(212)
后 记·····	(217)

第一章 踏上革命征途

一、苦难的童年

1907年元月（清光绪三十二年腊月），我出生在广东省丰顺县小胜乡。

丰顺是粤东山区一个贫困落后的县份，北面是铜鼓嶂，西面是鸿图嶂和九龙嶂，从东北至西南莲花山横亘县境，山多田少，全县20多万人，只有10余万亩稻田，平均每人不到半亩田，加之土地贫瘠，耕作技术落后，水利失修，全县年产稻谷不足3个月之食，除少数官僚和豪绅以大米为主食外，绝大多数人民常年以杂粮为主食。反动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还要将各种苛捐杂税强加于民。因此，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尤其在农村，土地集中在地主和被地主把持的宗族祠堂手里。地主加上自耕农只占丰顺农村人口的18%，占农村人口70%的佃农，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收获，除交租外，所剩无几，还要出卖劳力打工、挑担，勉强维持生计；还有12%的雇农，连地主的土地也承租不到，无地可耕，只得靠打工度日，生活更是困苦。不少人被迫离乡背井，到南洋去做苦力谋生。

我的父亲李目，是个佃农，租种了地主几亩水田，每年收获除交租外，不够养家糊口，农闲时只得出外做泥水工。我母亲王好，性格爽朗泼辣，做事手脚麻利，是个很能干的农村妇女，除了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外，还帮别人织布、绣花赚点钱补贴家用。我母亲共生育12个子女，夭折6个，卖了4个。我在兄妹中

排行第二，出生才8个月，便因生活所迫，以8吊铜钱的身价（1个月1吊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我的养父叫朱跃宏，也是户贫农，家住本县百溪村蕉头窝，以种田、砍柴、烧炭和帮人扎木排为生。他有3个儿子，我是他大儿子朱日犬的童养媳。

按照广东客家人的习俗，在我过门的那天，朱家的一位堂叔婆，带了8吊铜钱，一条绣有龙凤的大红布背带（广东人用来背小孩的），一只大公鸡（俗称带路鸡）、一小扎红头绳，打一把红色油纸伞，来我家迎亲。我父亲事先请人把我的生辰八字写在一张红纸条上。朱家的叔婆来到我家后，父亲便把这红纸条贴在大红伞上，陪送一只母鸡（俗称栖鸡），请我的婢娘背着我送到朱家。到了朱家，一位堂叔拉着新郎，用扇子在伞上叩三下，然后揭下纸条放在新郎身上，收起伞，解下背带，婢娘抱我这个襁褓中的新娘和8岁的新郎拜堂。拜了堂我就算是朱家的人了，我的名字就写在朱家的祖宗牌上。那时，我还没有名字，养父便给我取名李见珍。从此，我便开始了童养媳的生活。

蕉头窝是深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庄，村前村后都是山，在山谷两旁的坡上，有些小块小块的梯田，是宗族所有的公尝田。全村只有五、六户人家，都是佃农，佃耕这些梯田。梯田无水利灌溉，土质贫瘠，产量很低，每年打下的稻谷，除交租外，就只够过年过节时用餐大米干饭，平时老人小孩煮点米汤喝，主要的食粮是山坡上种的蕃薯。穿的是自己织的土布。农闲时村里的妇女就上山砍柴，挑到集上去卖，换些油盐 and 针线等生活必需品。

我的养父母心地善良，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抚养。我五、六岁时，开始懂事，养母煮饭时，我帮着烧火，带弟弟，还帮着打猪菜等。10岁那年，养父帮人家扎木排挣了点钱，要送弟弟到邻村去读私塾，弟弟和我同岁，但我的个子长得比他高，又懂些，养父就要我带弟弟去读书，并偷偷给教书先生多缴了点学费，让我在私塾旁听。那时，在我们山村，女孩子极少读书的，

何况我还是个童养媳。所以养父让我旁听之事不敢告诉家里的人，我上午和弟弟一起去私塾，下午在家里帮养母做家务。我没有书本和笔墨纸砚等文具，虽读了两年，只认得少许字，不会写字。以后，我便跟着养母做农活，到了十四、五岁，我便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我们客家地区，男人们多外出打工谋生，妇女是主要的劳动力，但妇女在家庭，在社会上却一点地位都没有。女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卖做童养媳，我的祖母、生母、养母、姐妹，以及村里的妇女个个都是童养媳，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要是敢于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想追求自己的爱情，那就会遭到装进竹笼沉塘的悲惨结局。我成年以后，对妇女这种低下的地位渐渐感到不平，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满，朱日犬在外面读书，接受了新思想，也不满意这种童养媳制度，他把我当成小妹妹，我把他当成大哥哥，我们之间没有爱情。我渴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我只能在上山砍柴时，用山歌来抒发心中的不平：

正月里来是新年，
做人阿妹不值钱。
爹娘家产匪有份^①，
当做猪牛去卖钱。

谁能改变这世代相传的历史？谁能改变我们妇女的命运啊？！

二、彭湃指引我走上革命路

旧时，丰顺县境内没有公路，与外界的联系靠水路。在县城

^① 匪（音Gí）即我，有（音Mò）即没有，是客家方言。

东部有个黄金市，县内主要河流丰溪、龙溪在此汇合，直通韩江，是通往潮汕的交通要道，东、西、北各乡的柴、炭、竹、木及其它土产均在此集散，三日一墟，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有个什么新闻，很快传到这里，也从这里扩散到各乡。我的家乡蕉头窝村，离黄金市只有10多里路远，我少年时常跟养母挑柴到黄金去卖，就听人传说：

“海丰有个财主家的少爷，叫彭湃，把自己家的田契烧了，把田分给佃户，还领着佃户成立了农会，不准地主调田和欺压穷人，真是大善人！”

“彭湃到外国读过书，放着现成的官不做领着佃户闹事，怕是中了邪，癫了！”

人们把这些当成奇闻，互相传叙着，它像投进一湖死水中的石头，在山区人们的心中引起了阵阵的涟漪。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主持下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广东成了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东的工农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农民运动从海、陆丰迅速地扩展到全省各地，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石。也冲进了丰顺这偏远的山区，唤起了山区被压迫、被剥削农民，挣脱封建枷锁，争取自身解放的觉醒。这时到黄金市趁墟的人们又传说着：

“现在省里闹起国民革命了，彭湃到了省里，成立了省农会，要减租减息了，地主不能调田。还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嘿！嘿！嘿！现在地主也怕农会了！”

“现在男女要平等了！婚姻要自由了！女人也入了农会！”

我的养父，常在外面帮人家放木排，见的东西多。他以前相信三合会。现时，他也相信农民协会。他对家里人和邻里们说：“还是农民协会好！”这些消息给山区贫苦农民带来一种新的希

望，他们盼望有个农民协会，来为自己争得有田种，有饭吃的权利。

听了这些消息，也使我产生了一种梦想，希望有一天彭湃也能来到我们山村，帮助我们实现“耕者有其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愿望。我日思夜想，盼望有这么一天。

没想到我的梦想竟成了现实。1926年5月，有一天傍晚，我的一位表哥刘阿溪突然陪着一位客人来到我家。那客人身穿一套香云纱便装，头戴一顶白色通帽，很斯文。起初，我以为是那家的少爷，不知他们来我山村做什么。表哥见我疑惑的样子，低声对我说：“他就是彭湃，现在是省农民协会的常委，来这里视察农民运动，还要帮助我们区、乡成立农民协会哩！”我一听又惊又喜，没想到我日夜盼望的这一天果然来到了，而且彭湃这位大善人竟然到我家里来做客，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招待为好。养母听说后，也很高兴。平时我们家都是吃蕃薯稀饭，这一晚养母特地为他们蒸了两碗大米饭，还炒了几个鸡蛋，热情招待。

吃晚饭时，他们边吃，边谈起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在一旁听得入了神。彭湃见我如此专心听讲，就转过头来对我说：

“农民要过好日子，就要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什么叫组织起来？”我不解地问。

“组织起来，就好比把五个手指捏成拳头，拳头打人才有力量。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就好象捏成了一个拳头，这样对土豪劣绅，斗争才有力量”。他真有办法，打个比喻一解释，我一下就听明白了。我又想：“不知象我们这样的农村女子，能不能组织起来？”彭湃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说：

“妇女要争取解放，要争取男女平等，也要组织起来，妇女也和男子一样，都可以参加革命斗争”。他又用海陆丰和省里一些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事迹来启发教育我，又说：

“你们区、乡、村最近都要成立农民协会，你把这些道理，

和村里的姐妹们说说，把她们组织起来，一起参加农民协会好吗？”

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新鲜的革命道理，心里好象突然亮堂了好多，连声说：“好！好！”我原以为象彭湃那样省里的大官，又到外国读过书，哪里会跟我们这些乡下女子谈在一起。现在亲眼看到了他，就象自家的兄长一样，这样看得起我，亲口对我讲革命道理，要我把姐妹们组织起来，我打心眼里越发崇敬他。

吃罢晚饭，邻村有些人来到我家，彭湃领着他们就在我家后院开会，朱日犬也参加他们开会。表哥要我到门前去放哨。我就站到屋前路口的一颗树下，在这里可清楚看到对面山腰那条进村的小路。这又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受革命任务，心情又紧张又兴奋，认真观察有无生人进山来，生怕出点差错。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我在树下唱山歌，装着没事的样子。会后彭湃走过来问我：

“你放哨怕不怕？”

“不怕”，我回答说。

“你怎么放哨？放哨时都做些什么？”

“我站在树下唱山歌，装着没事，眼睛盯着对面山腰那条小路，看有没有生人来”。

“好！你会唱山歌，唱个山歌给我们听听好吗？”

我们客家人的妇女不仅会唱山歌，而且还能即兴编山歌唱。我想了想，便把放哨时的情形编成山歌，唱了起来：

月亮明明树下棲，
手扳树杆拗树枝。
为了人民谋幸福，
一有情况就报知。

“唱得好！你真聪明。”彭湃听罢，笑着对我说。

当晚，表哥和彭湃就在我家留宿。这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彭湃对我讲的道理，越想越明白、越兴奋，觉得自己从

今以后不光会种田、砍柴、喂猪、煮饭，还能参加农民协会，大家组织起来，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想呀！想呀！想到整夜都没入睡。

第二天，彭湃和表哥走了。随即我们村成立了农协小组，我动员了几个姐妹一起参加农协小组，大家选我当副组长。我们客家人爱唱山歌，我便把组织起来参加农民协会的好处，编成山歌：

六月割禾正当午，点点汗滴入田土，
几多辛苦为别人，打下粮食有米煮。
哎哟哟……
田主收租太过份，把我谷种都拿走，
蕃薯有了谷又完，明年唔知怎落种^①。
哎哟哟……
农友快快来入会，捏成拳头团结紧，
减租减息不还债，组织起来斗豪绅。
哎哟哟……

开会时，我唱起山歌，群众情绪特别高，来开会的人也特别多。不久，我们第四区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大家选我为代表，在区农代会上，我被选为农协委员，大家知道我会编唱山歌，就要我搞宣传工作。当了区农协委员，工作就多些，我白天在家劳动，晚上到各村去宣传。我们是山区，村和村之间都隔着山，我常常在晚上翻山越岭去宣传，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参加减租减息，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这年的夏秋，我们区各乡、村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这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农民运动向深入发展。我县各区、乡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开始参加农民自卫军的多数是青、

① 唔知（唔音wú）即不知道，客家方言。

壮年男子，妇女不敢参加，我就动员了几个青年妇女参加了农民自卫军。9月，组织上吸收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上级党组织提出要在农民自卫军里，建立一支更精干的武装，叫常备队。11月，我们第四区农民自卫军常备队成立，我担任常备队的团支部书记。常备队担任巡逻、放哨，查禁烟赌，维持社会治安，并和地主民团进行斗争，因农民势力大，地主民团不敢嚣张，常备队在乡村真是威风。农民协会有了自己的武装，实际上成了乡村的政权机关，乡村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农民协会，过去被压迫的泥腿子，现在真是扬眉吐气了。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

从此，我这个只值8吊铜钱的童养媳，在澎湃的教育、引导下，在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浪潮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开始了新的人生。

第二章 参加武装暴动

一、丰 顺 暴 动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向前大大推进之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背叛了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查封一切工会组织，大肆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紧接着上海的大屠杀，4月15日，国民党右派又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逮捕和枪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民党省党部并派遣一批反动分子，到各地进行清党。一些丰顺籍的反动分子，被派回家乡，他们控制了县党部和县政府，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实行清党。他们四处张贴布告，通缉捉拿原县党部执行委员、中共党员黎凤翔等人，并派军警袭击县农会，抓走了县农会负责人共产党员陈思永。面对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丰顺县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黎凤翔等人及时转入农村，联合各区、乡农民武装和农会会员，树起农会旗帜，对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

4月25日，黎凤翔领导数百农民自卫军进城包围了县政府，要求释放陈思永，县政府不做人，农军即进行劫狱，与敌警卫队交火，激战数小时，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劫狱没有成功。

劫狱失败后，反动派将陈思永杀害了，这更激起了革命群众的义愤。5月中旬，党组织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攻打丰顺县城。黎凤翔领导各乡农民自卫军约四、五千人，高举镰刀斧头和犁头旗，拿着土枪、梭标、锄头、扁担，分几路进攻县城。我们四区

和附城区、良乡市的农军一起由黎凤翔亲自率领担任主攻县城的任务。在攻打县城之前，党组织已在城内警卫队中做了工作，争取了二十几名官兵，作为起义的内应，原计划待农军打到城外，他们便在城内起义，内外配合，夺取县城。战斗打响后，起义的农军很快便从四乡会集打到县城外，敌人死死守住县城，战斗从早晨打到下午，也不见城内有什么动静，后来才知道，准备起义的战士，被人告发，全部被捕。农军人数虽多，但武器装备差，又没有作战经验，虽英勇奋战，仍没有攻进城去。下午，汤坑区的保安队和民团赶来增援，城内的敌军见援军赶到，也从城内向外打，起义农军受到前后夹击。为保存革命实力，黎凤翔率领农军退到大田一带山区，在山区继续坚持斗争。6月初，在大田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大田区革命委员会。在这次会议期间，由刘中天、朱翠英两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4月下旬，国民党右派在丰顺清党，到5月农民自卫军攻打县城失败，丰顺县的革命力量虽受到一定损失，但仍在继续发展。反动派虽把持了县城和几个大的市镇，四乡农村仍是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会的势力。国民党统治时编的丰顺县志也不得不承认：“三月（指农历）奉命清除共产党时，共产党人散往各处树立农会旗帜，受共产党指挥，抵抗政府命令”，共产党“滋蔓各处，成难图之势”。

9月，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丰顺，各区农民自卫军纷纷响应，进行抗租抗暴斗争，没收地主土豪的粮食、钱财，支援南昌起义部队。10月，南昌起义部队撤出丰顺，地主民团和保安队又向农民自卫军进行反扑。我县部分农军遂转移到九龙嶂山区与梅县的农民自卫军会合，成立了广东工农革命军第十团。我们四区的农军由黎凤翔率领，在本区各山村坚持斗争。

二、年关暴动

1927年12月23日，东江特委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和党员，趁年关将到，地主豪绅、富商、债主，逼租、讨债之际，发动工农群众，举行年关暴动，没收地主、豪绅、富商的财产，分给群众，让群众过一个新年。春节前，黎凤翔、刘中天率领丰顺农民赤卫队，在龙溪、黄金一带举行暴动，两次攻打黄金市。黄金市是交通要道，有200多间店铺是丰顺县比较大的市镇。镇内设有第四区联防处，有民团驻守，民团人数不多，加之快要过年，团丁比较松散。当时在黄金市外，四乡都是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的势力，所以赤卫队沿龙溪各村，很快打到黄金，第一次没有攻进去，接着沿途各乡村的赤卫队和农会会员纷纷赶到，起义人数大增，吓得民团抱头逃窜，起义军占领了黄金市。打进黄金市后，我见区团防处门前的旗杆上挂着一面国民党旗，就爬上旗杆把旗扯下。我们在黄金市待了3天，没收了地主、豪绅、富商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群众，起义农军没有打算长期占领黄金市，当得知敌人保安队开来时，便带着没收的财物，主动退回到大田、上林坑一带山区。这次攻打黄金胜利，大家高高兴兴过了一个丰盛的旧历新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没有注意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黄金市把一些大商店的东西也没收了，还烧了一些房子。这些“左”的做法，在以后的斗争中，得到了纠正。

龙溪、黄金暴动取得胜利，群众情绪高昂。驻九龙嶂山区的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团长沙兴，和丰顺党组织负责人黎凤翔商量决定，由十团和丰顺各区农民赤卫队联合攻打丰顺县城——丰良镇。当时，在丰良镇的西部、北部与兴宁、梅县交界的山区，是工农革命军活动地区，东北方向的大龙华乡则是赤卫队的

大本营，东、南方面敌人的兵力较强。因此，起义指挥部决定，在攻打丰良之前，先奇取东面第四区的潘田乡，以阻断丰良与黄金、陷隘两个区的联系，形成对县城的三面包围。

2月4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我和队长率四区的赤卫队，很快就冲到潘田乡，十团的同志和其它区的赤卫队，也都很快打到潘田，起义军人数众多，乡联防处没有多少士兵，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抱头逃窜，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当天即发布了《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军事委员会布告》，申明：“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其唯一目的即在举行土地革命，实现不交租、不纳稅、不完〔还〕债之主张，并没收土地分给贫苦的工农群众”。接着成立了潘田乡苏维埃政府，由黎凤翔等六人组成，并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群众。2月6日是元宵节，起义军与群众在潘田共同欢庆元宵。

潘田起义的胜利，给丰顺工农群众和起义军指战员极大的鼓舞，革命斗志更加昂扬。2月21日，工农革命军和丰顺农民赤卫队3000多人以及农会会员近万人，趁攻克潘田之势，攻打丰顺县城。经过3天激战，攻下县城对岸的良乡市，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打垮了良乡的保安队，在良乡四周遍插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的红旗，吓得丰顺县长急电求援，惊呼：工农革命军“自在潘田打退县兵后，附者益众，盈山遍谷，到处均有匪旗”，“黎凤翔等率众据险扼绝县城与各处交通之孔道，声势极为浩大”，“县城岌岌。请钧座速派大军前来援剿。以救危城”。14日，敌军大部队赶来增援。起义指挥部闻悉后，为保存革命实力，将部队分散撤回原根据地。

接着敌人便开始对农军活动的各乡、村进行“清剿”，实行三光政策，并发出通缉令，悬赏捉拿以黎凤翔为首的共产党人，我也在通缉捉拿之列。我在这次战斗彻退时左腿中弹负伤，在同志们的掩护和帮助下，退到九龙嶂下猴子窠我妹妹家养伤。妹妹家

在深山谷里，是单家独户，妹妹是自幼卖为童养媳的。她的家公李开，也是农会会员，见我腿上血流不止，立即用丝瓜络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止住血，又采些草药来洗敷伤口。我在他家住了3个多月，伤口才痊愈。在养伤期间，组织上曾派同志来看望我，并告诉我同志们已转移到铜鼓嶂一带活动。我的养父养母也带着草药和食品来看望我，养父怕我遭到不测，要送我到暹罗伯父家去，我不愿离开革命队伍，决心跟着党干一辈子革命，我谢绝了养父的好意。我的伤治好后，在妹妹家过了端午节，便上铜鼓嶂找到了部队，同志们见我伤愈活着回来，有的同志含着眼泪，有的拉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有的向我问寒问暖。回到部队，真正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见到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比同胞姐妹兄弟还亲，一股热流涌向我的心头，即兴编唱一首山歌，表达我的心情：

小溪出水大溪流，同志姐妹处处有。

今日重上铜鼓嶂，来日下县打九洲。

此时，东江地区各县的年关暴动也先后遭到失败，彭湃领导的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红色区域被敌人占领，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群众惨遭杀害，许多革命同志英勇牺牲，也有一些人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逃到南洋，整个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东江特委机关转到普宁县的大南山坚持斗争。

三、丰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同年秋，五华县党组织负责人古大存，丰顺县委书记黎凤翔以及兴宁、大埔党组织的负责人，来到九龙嶂，与在九龙嶂坚持斗争的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团郑兴会合成立了五县暴动委员会，推选古大存为主席、黎凤翔负责组织，郑兴负责宣传。随后，揭阳、潮安两县党的领导人也来到九龙嶂、遂成立了中共七县联

合委员会，古大存为书记。七县联委成立后，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把过去分散的斗争，联成一起，革命力量大大加强。七县联委的领导成员分别在八乡山(丰顺南部与揭阳、五华、兴宁交界的山区)、九龙嶂、铜鼓嶂，建立和扩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东江的革命斗争开始复兴。

在2月攻城失利后，丰顺县委率农民赤卫队撤退到九龙嶂、铜鼓嶂下的马图乡大龙华乡一带山村坚持斗争。县委领导通过几次攻打县城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在当时条件下，要攻占敌人强兵驻守的主要市镇是不可能的。于是将赤卫队分散在偏远的山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争，骚扰敌人。当敌人大部队来进剿时，我们就退到深山去，小股地主民团来了，我们就集中赤卫队，缴他们的枪，敌人走了，我们又回到村里。这种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骚扰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丰顺县长急忙召集二、四、五三区联防主任和地主豪绅开会研究对策成立了三区联防总处，区组织了警卫便衣队来对付我们赤卫队。但他们只能守住县城和几个主要市镇，广大的乡村仍是农民赤卫队的势力。同时，我们还到敌军内部开展工作，先后有几个士兵带着枪投奔到农民赤卫队来，有些士兵帮助我们在敌军营中散发传单。使丰顺的反动统治者感到无可奈何，县长吓得弃职离丰，据丰顺县志记载：“时共匪猖獗，县长离丰”。

10月，由县委书记黎凤翔主持，在大龙华乡的叶华村，召开了丰顺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丰顺县革命委员会，推选黎果为委员长，戴君朋和我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在根据地内开展土地革命。

我负责抓全县的妇女工作，丰顺的妇女历来参加田间的主要劳动，还要生儿养女，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生活异常艰辛。因此，妇女比较容易发动，很多妇女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参加各种斗争也比较积极。为了培养妇女干部，进一步发动妇女参加土地

革命和各项斗争。县委决定由我主持在马图乡的谢岗涉开办了一个妇女训练班，各区、乡派来学习的妇女干部和积极分子，约有100来人，办了一个星期就结束了。

办完训练班，我便在马图乡和大龙华一带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这时是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只知道要搞土地革命，但具体怎么搞法，大家都不太清楚，也没有看到有关土地革命的条令、法令这一类的文件。那时，我们在山区打游击，与外界的联系少，搞土地革命就凭着自己对土地革命的理解，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去搞。我们想搞土地革命就是土地要归公，田契是土地私有的凭据，破除私有，就要把田契烧掉。这样我们就动员群众把田契拿出来烧掉，不仅地主的田契烧，农民的田契也烧。田契烧掉后，由革命委员会发给土地使用证。

这时正值秋收时节，我们组织农民进行抗租斗争，不向地主交租。在根据地内和游击区，地主武装早已被缴了械，农民有赤卫队作后盾，农民不交租，地主一点办法也没有，抗租斗争，取得胜利。许多农民又重新加入农会，农会会员增加到近万人，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各乡先后建立起40来个党支部，党员近千人；建立了县独立团，各区赤卫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贺昌从中央来到广东巡视，他在同年12月30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丰顺工作最好，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约万人，兵士极动摇，敌军士兵逃到我们这边来的共有四次了”。1929年3月，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也提到了丰顺：“丰顺据前月报告，同志亦有千人左右，群众组织有上万人。去年秋收抗租斗争得到胜利，农民群众对于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

丰顺的革命力量能够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是与县委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县委书记黎凤翔，是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丰顺建大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丰顺特支书记，国民党丰顺县党部执行委员。在“四·一五”后，国民党反

动派在丰顺清党，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黎凤翔和彭在旋等共产党员，及时转入农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树立农会旗帜，建立农民武装，与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率领丰顺农民赤卫队举行多次武装起义。1927年冬初，他与梅县郑兴等同志在九龙嶂建立了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创建了九龙嶂革命根据地。1928年夏，组建了中共丰顺临时县委，黎凤翔任书记。同年秋，他与古大存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共七县联委，为东江革命力量复兴和红军及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底，黎凤翔调省委工作，1930年初，调北江工作，在曲江被捕，惨遭杀害。

四、饶和埔根据地

在丰顺革命力量大发展的同时，与丰顺交界的五华、兴宁、梅县、大埔、揭阳等县的革命斗争也得到复兴和发展，到1928年底，丰顺西南的八乡山、西部的九龙嶂、北部的铜鼓嶂三块革命根据地几乎连成了一片，而东部穿过县境的韩江也被工农红军和赤卫队所控制，南部与揭阳、潮安交界的山区，也是我游击区。敌人只得龟缩在县城及汤坑、隍隍等几个主要市镇。1929年初，东江特委机关从潮安搬到丰顺南部蔗溪乡的崇下村，我被调到特委机关任妇委委员，妇委的主要负责人是景姑，特委的领导人有林道文、颜汉章（我们叫他阿颜哥）、陈魁亚和黄炎等人。4月初，丰顺县委率领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攻占了黄金市和隍隍市，击毙黄金区联防主任刘饮堂之子。接着李明光、刘光夏率部又攻占了铜鼓嶂下的黄花村和小胜乡。李明光率部过了韩江向大埔发展。为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特委决定派黄炎、丘忠海、李见珍、李云香4人大埔去工作。4月初，我们4人和特委领导颜汉章一起离开崇下，走到黄沙坑分手，当时丰顺的地方武装正攻下隍

隍，颜汉章去隍隍察看。我们4人往东走，过了韩江到大埔，这时，正是清明时节，沿途见到不少群众去上坟。

我们在大埔县的和村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便在广东的大埔、饶平和福建的平和三县交界的地区建立了饶和埔中心县委，丘忠海任书记，我任县妇委书记，黄炎是东委巡视员，没有在县委兼职。以后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谢卓元。

大埔出瓷器，和村也有几个瓷厂，主要生产碗，厂主雇佣了不少女工，把碗一担一担挑到韩江码头装船运往外地销售。我们到大埔后，县委派我到挑碗女工中去开展工作，我就和女工们一起去帮厂主挑碗，晚上就到她们各家去串门。她们跟我说，挑一担碗要走十来里路，才给一角五分钱工钱，饭都吃不饱，不挑连饭也没得吃，没有办法。我跟她们熟悉了以后，就找了几位胆子大的女工，一起商量对付厂主的办法。那天，我们几个人去挑碗时，就故意走在后面。趁人不注意时，把一担碗摔破，那位女工装着昏倒的样子，我就去把前面的女工喊住，说后面有人昏倒了，并趁机对女工们说：“大家跟厂主讲，工钱太低，吃不饱，挑这么重走得头昏眼花，再这样下去，我们没法挑了。”女工们早就有意见，现在见有人昏倒了，都很气愤，一致说：我们跟老板说、要他加工钱。大家把担子放下，那几个胆子大的女工就去把老板找来，老板一看这个形势，只得答应增加工钱，每担挑工加到二角。这次斗争胜利，女工们很高兴，每天都喊我跟她们一起去挑碗，有的女工还说：今天我们再摔一担碗。我对她们说：“这种办法只能用一次，老板加了工钱，就不要再摔碗了。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姐妹们就要组织起来，成立女工会，大家齐心，老板就不敢欺侮我们了”。女工们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愿意加入工会，这样，我们就在和村成立了女工会。

随后，我到罗村一带农村做群众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使我离开了饶和埔而进入了中央苏区。

第三章 进入中央苏区

一、在闽粤赣特委

1. 和村巧遇张鼎丞

我从广东东江进入中央苏区，纯属一次偶然的机遇，那就是我在饶和埔中心县委的一次会议上遇见了张鼎丞。

1929年秋冬，我在饶和埔地区的罗村一带做群众工作。当时，东江特委刚开过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党的“六大”和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精神得到贯彻，纠正了过去一些“左”的做法。根据东江特委指示，我们把根据地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两类，在巩固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在游击区，则只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在分田地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田，其它的土地没有动，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也没有没收私人的商店、作坊。这些做法，群众很拥护，土地革命的热情很高，群众发动得也比较充分。一天，县委通知我回和村开县委会。在这次会议上我汇报了罗村一带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以及我对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发动群众的一些具体做法。闽西特委的领导人张鼎丞正好来饶和埔视察工作，参加了我们的县委会。张鼎丞听了我的汇报，很感兴趣，说：“这位女同志的发言很好，她对政策执行得好，很会做群众工作。”散会后，他又找我聊天，详细询问我的家庭、工作经历等等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好！好！”没料到在和村这次会议上与张鼎丞相遇，就成了我日后进入中央苏区的契机。

几天以后，张鼎丞回闽西去了，东江特委巡视员黄炎同志告诉我：“由于饶和埔根据地和东江特委之间隔了一条韩江，沿江各渡口都有敌人驻守，来往交通不便，上级决定将饶和埔县委划归闽西特委领导。我们原从东委来的4位同志仍要回东委另行分配工作。”1930年1月，黄炎、邱忠海、李云香和我4人，便离开和村回东江特委。我们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韩江边，天色已晚，没有找到渡船，过不了江，就在江边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正准备过江，突然饶和埔县委的通讯员连夜赶来，通知我们说：“组织上已决定调李见珍同志到闽西去工作，她不要过江了，我马上送她去闽西。”就这样我和她们3人在韩江边分别，谁知这一别竟是永别。她们过了韩江，回到东委。不久，黄炎被叛徒杀害，邱忠海牺牲，李云香下落不明。我算幸运，到了闽西，而这一转机，对我一生的道路有着决定的意义。

我随通讯员从大埔走山路，到了福建省永定县的湖雷。我们是1930年1月30日到，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正月初一，我在湖雷过的春节。在湖雷接待我的是范乐春，范乐春参加过永定起义，是永定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一，当时，她还兼管闽西特委妇委的工作。我到永定不久，张鼎丞要我接替她，负责特委妇委的工作。我在永定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因为特委机关在上杭，我便到了上杭，在白沙、南阳一带做群众工作，搞土地革命，动员妇女为红军做鞋，组织基层妇女代表会等等。

2. 首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5月，闽西主力红军红十二军出击广东东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则准备攻打长汀和连城。特委要我带一个工作组，随部队到长汀和连城一带去做群众工作，我便带着工作组随部队行动。6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率红四军从江西来到闽西，占领武平，进驻长汀、上杭境内，使闽西革命力量大大增强。我们这支部队趁

势向长汀东部和连城方向出击，约在六、七月间占领了新桥，特委指示在新桥成立汀东临时县委，由我任临时县委书记，赖月华任组织部长。我们即在新桥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进行减租减息和剿匪斗争。

一天下午，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去汀州福音医院找张鼎丞同志汇报工作。我立即出发，到汀州时天已黑了，在福音医院找到张鼎丞同志，他告诉我是要向毛主席汇报。前几天在南阳开会时，我见过毛主席，听过他的报告，不过那时他不认识我。毛主席住在医院后面北山老古井的一座楼房里，张鼎丞同志把我带到毛主席住的房间，并向毛主席做了介绍。毛主席听说我带工作组随部队到新区做群众工作，还下乡剿匪，就笑着说：“呵，你这个女同志不简单哪！”接着向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群众发动得怎么样呀？开起来，他们敢不敢讲话呀？参加开会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些什么要求呀？等等。

我对毛主席提的问题一一作了汇报。他听得十分认真，边听边问，加以引导，有时又接过话题，分析议论，阐述革命道理。当我汇报到，对于组织农会，人们态度并不一致，那些穿着比较好，嘴巴能说的人，就不那么热心，还说：“我们几辈子没有参加农会，不是一样种田吃饭吗？”这些人开会喜欢挤在前面，他们看不起衣衫破烂，不大说话，站在后面的穷苦人，还常嘲骂穷苦人：“你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无一枚针，懂得什么！”毛主席插话说：“真正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无一枚针的人，受苦最深，革命性最强，是我们的依靠力量，一定要认真把他们发动起来。我们不能把工作的基础放在那些穿着得好，嘴巴能说的人身上，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当我汇报到我们还搞不清参加“三合会”、“三点会”等帮会组织的人算不算土匪时，毛主席指出：参加“三合会”、“三点会”的人，除少数会道门头子外，大部分是穷苦人，他们生活困难，没得吃，有时也自发地去

抢地主豪绅的东西。但他们不是土匪，你们不能打，要团结他们。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孤立和打击真正的地主豪绅。毛主席又形象地用散沙和湖洋泥（即一种叫湖洋田的水田里的胶泥）做比喻，进一步向我们解释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群众没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好比一堆散沙，缺乏力量，我们要用湖洋泥把这堆散沙胶在一起，捏成一团，这就团结得很紧，不会散了。

毛主席又问我是不是闽西人？我告诉他是广东丰顺县人，他听我说是广东人，又特别教育我要注意团结本地干部。他说：“本地干部土生土长，情况熟悉，夜晚不打灯也能摸着群众家的后门。你们不熟，群众家的大门开着，你也摸不着”。毛主席的比喻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它里面的道理又是那么深刻，对我启发很大。以前我仅是凭着阶级本能去爱谁、恨谁，碰到比较复杂的情况，就不知如何办好，听了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开始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聆听毛主席的教导，以后我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几年间，有幸多次得到毛主席的亲自教诲，使我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得到很大的教益。我这个山村贫农的女儿，能不断进步，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与毛主席、周恩来等领袖对我的教育分不开的。我永志不忘。

3. 闽粤赣边区第一次党代会

7月，红四军奉中央命令离开闽西，开往江西去攻打南昌。红四军开走后，福建的军阀部队，又进攻根据地。当时，我们的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人的主力部队打进来了，我们地方部队就撤出新桥，转移到畚心、四都一带去打游击，骚扰敌人。到了这年的年底，地方赤卫队配合地方红军攻下了连城，我们工作组跟到连城，在连城成立了临时工委，我任临时工委书记。闽西红军曾经攻占过连城，也曾经建

立过赤卫队、农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敌人打过来时，这些组织被打散了。我们到连城后，发动群众，把这些组织又重新恢复起来，并扩大了赤卫队和地方红军，准备建立连城县革命委员会。我在连城做了些筹建工作，革委会还未成立，便接到特委通知，要我到永定县的虎岗去开会，我便离开了连城。

1930年12月，我到了虎岗，才知道是要我参加闽粤赣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时，邓子恢同志已调走，中央派邓发来到闽西，会议便由他主持。邓发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撤销闽西特委，成立闽粤赣边特委的决定。会议还选举了新的特委领导成员，邓发任书记，李明光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郭滴人（以后是方方），萧向荣任秘书长，我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特委委员，任妇女部长。张鼎丞同志当选为特委委员，仍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我在特委负责妇女工作，主要是做群众工作，很少住在特委机关，多数时间是在下面跑，到各县、区、乡和妇女干部一起，建立各级妇女代表会。通过妇女代表会发动妇女群众参加土地革命，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为红军做鞋、做衣、送菜、送粮支援前线，动员妇女送亲人参加红军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妇女积极分子，发展女党员、女赤卫队员，选拔和培养妇女干部。各级妇女干部还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童养媳、等郎妹等不合理的婚姻习俗，也直接处理一些婚姻和家庭纠纷。我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特别是对农村妇女的思想、感情和她们的疾苦比较了解，和她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也喜欢到群众中去做工作，虽不会讲什么长篇大论的道理，但可以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和她们谈心，交朋友，和她们一起劳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群众也很喜欢我，她们不把我当外人，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我讲。部队刚打下连城时，

我去做群众工作，一天，有一个在地主家当婢女的姑娘跑来悄悄对我说：“我家主人把好多金银首饰都埋起来了，我只告诉你，你不要跟别人说是我讲的”。说罢她又偷偷把我带到埋东西的地方指给我看。我们随即带着部队去挖，果然挖出很多金银首饰和一大堆银元，还有枪支。我们把银元分给了群众，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并把那个地主从城里的住处拉回来斗争。那姑娘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以后还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妇女干部。

4. 反“立三路线”

1931年2月，由邓发主持在永定县的虎岗召开了特委常委扩大会议，邓发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这次会议主要是贯彻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当时，还没有接到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根据中央紧急通告的精神，会议同意常委会作出的“取消第一次闽粤赣党代表大会政治路线的决定”，认为党代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制定的。

我参加了这次常委扩大会，当时，对什么是“立三路线”，在理论上我搞不清楚，但我从自己的实践中的确感到有些做法是不对的，使群众很反感，也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如解散青年团组织，取消群众团体，成立什么行动委员会，造成组织混乱；要闽西主力红军进攻广东东江，还想夺取广州。这种冒险的军事计划，当时在特委领导中，就有人反对。记得有一次，特委和红军的领导同志在上杭县的白沙开会，讨论要不要进攻广东的问题，会上争论很激烈，张鼎丞和李明光都不同意进攻广东，会议开了一半，又搬到涂坊去开，还是争论这个问题。最后，上级领导决定还是要进攻广东东江。会后，李明光对我说：“红军要去打东江，我们准备回广东去吧”。那时，我也做好了回广东的思想准备。结果红军几次攻打东江都失败了，使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受了很大损失，许多同志对这种冒险的进攻，都有意见；还有当时宣传反封

建，提倡男女平等这是对的，但有些做法也太过份了一些，如：说男女平等就要男人从妇女的双腋下爬过去，还搞什么蛇蜕口，引起群众反感。我不同意这些做法。

还有一件事特别使我反感，就是凡开大、小会议都要做长篇大论的政治报告，这些政治报告脱离实际，群众听不懂。有次，我在上杭白沙召集群众大会，领导上要我在会上做国际形势报告，我的文化程度低，不会做什么国际形势报告，逼得我没有办法，哭着去找特委组织部长李明光说：“我不会做长篇大论的报告，还是把我调回广东去吧！”因为我不会做形势报告，成了我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这回反“立三路线”我很高兴，心想以后再不要我做国际形势报告了，放下了思想包袱。当时思想很单纯，我只是从自己亲身所遇到的几件具体事情，感到“立三路线”是不对的，至于什么“立三路线”的实质等等问题，我弄不清楚。

5. 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1931年初，闽西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还专门成立了肃反委员会。肃反的事全由肃反委员会的人掌握，搞得很神秘很紧张。为什么要开展这个运动，我不大清楚，但我负责妇女工作，常在下面跑，曾亲眼看到抓人。当我在上杭一带发动妇女为红军做鞋时，上杭的县委书记刘瑞生，头一天还召集开会作报告，第二天就被抓起来了，说他是“社会民主党”，以后被杀害了。有些十五六岁的小孩也被抓起来，说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并对他们施以酷刑，逼他们交代，小孩受不住刑，就把他们认识的人的名字讲出来。这些人就又被抓起来。此外，凡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多数都被抓起来了，女同志也被抓了不少。还有一天特委通知我回虎岗开会，我和一个叫王勇的同志一起从上杭回虎岗。当天晚上，睡到半夜，突然王勇来敲我的门，他说组织上要他马上出发，可能要上前线打仗，要我告诉萧月华

一声（萧是王的妻子）。过了几天，在虎岗召开审判大会，要大家都去参加，我们都去了。大会一开始，就有几十个人被五花大绑拉了进来，我一看大吃一惊，王勇也在被绑着的人当中，而我还以为他上前线了。大会宣判当场处死17个人，王勇也被处死，我真弄不清楚，好好的一个同志，为什么要处死他？执行时还不用枪毙，为了节省子弹，实在是目不忍睹。我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可谁也不敢乱问。就这样，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不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毫无根据的乱怀疑，再加上严刑逼供和轻信口供。结果，乱抓乱杀了许多革命同志，造成根据地内人人自危，不知道那一天自己遭殃。

我那时住在群众家里，天天和群众在一起，群众对我们乱抓人，意见很大，特别是抓小孩，对小孩施酷刑逼供，反映很大。很多妇女就悄悄向我反映他们的意见。我将群众的意见向特委领导邓发和卢德光反映，他们马上追问我“是不是有反革命？”李明光知道了，马上告诉我“以后要注意，不要随便对别人乱说。”此后，我思想上产生了顾虑，也很害怕，不敢再提意见。宁愿住在群众家里，不愿回机关，也不敢和同志们多来往，吃饭都不敢在一起吃。由于我的出身好，又常在下面做群众工作，群众对我很好，肃反中才没有受到怀疑。

后来，肃反委员会改组了，但并没有认识肃反的错误，仍然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弄清闽西究竟有没有“社会民主党”。直到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路过长汀了解到闽西肃反的情况，批评了这种错误的做法。以后又派任弼时来纠正，这场错误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才停止。

6. 闽西山歌

闽西的群众也和我们广东客家人一样，喜欢唱山歌。我从小就爱唱山歌，做群众工作时我更是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一起

唱山歌。山歌随编随唱没有固定的歌词，于是我就根据不同的任务，编出不同的山歌和群众一起唱。在扩大红军运动中，特委妇女部在才溪乡抓点，我便在那里组织群众开展山歌比赛。男女群众对唱山歌，一问一答，把扩大红军的意义，全用山歌唱出来，有时从晚上一直对唱到天亮，一方编不出词来了，就算输了。结果，群众情绪鼓起来了，很多人报名参军。那时农村没有电影，也没戏看，山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也是群众很容易接受的一种自我教育方式。通过山歌来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各项任务也比较容易完成。唱起山歌，群众在高高兴兴中受到了教育。我和群众在一起唱山歌，不分彼此，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联系群众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时，我编了许多山歌，时隔50多年，绝大多数都不记得了，仅仅记得几首，现录如下：

打土豪

苦人苦伤心，
豪绅不做一身新，
餐餐吃的鱼和肉，
三筒大米酒半斤。
苦人餐餐菜糊粥，
做生做死米半斤。
苦人团结心连心，
拿起扁担打豪绅。

为红军做草鞋

新做草鞋四方方，
送给阿哥上前方。

哥在前方打胜仗，
后方工作妹担当。

反对封建婚姻

十八娇妻三岁郎，
夜夜睡觉捧上床。
辛辛苦苦捧到大，
郎大妹老梦一场。

送郎当红军

石榴开花心里红，
哥当红军妹来送。
早日消灭反动派，
回来再把婚事成。

练兵

红旗飘飘手拿枪，
太阳未出就起床，
啊哟！心肝哥哟！
阿妹为了闹革命，
不要郎来我爱枪。

二、到长汀当县委书记

1. 嫩肩挑重担

1931年秋，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9月打下了汀州，接着又攻取了连城和汀、连、宁交界的广大地区；收复了杭、永、岩老区，闽西根据

地大大地扩大了，向北发展到宁化、清流、归化，西部与赣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根据地扩大了，中央决定将闽粤赣特委改为闽粤赣苏区省委。邓发已调中央工作，由卢德光任省委书记，李明光任组织部长，罗明任宣传部长，秘书长萧向荣，我仍任妇女部长。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敌人大批物资，其中有不少银元和金银首饰，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大大好转，但红军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仍十分紧缺。卢德光就自告奋勇到白区去采购药品。卢德光是香港产业工人出身，曾在香港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香港人地都比较熟悉，组织上同意他去采购。他走时带了不少用首饰熔成的金片，谁也没有料到，他竟一走不再复返。此时，长汀县委书记蔡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死亡。

卢德光走后，由罗明代理省委书记。一天罗明对我说：“现在根据地扩大了，需要很多干部到新区去工作，长汀是通往瑞金的要道，工作搞得好不好，对根据地影响很大。省委决定把长汀县这副担子交给你，你去当县委书记，你的意见怎么样？”

我听了后一时还不太敢接受这个任务，我担心这副担子太重挑不起。我虽有几年实际工作经验，也曾在汀东、连城当过临时县委书记，但那时是打游击，时间不长，管的地方也不大，任务也单纯些。现在要我独当一面管理一个县，要统管建党，建设地方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开展土地革命，领导生产，管好全县人民的生活。自己文化低，怕干不好影响根据地的建设。我就对罗明说：“我文化低，怕干不好。”

罗明说：“你以前当过临时县委书记，有实际工作经验，我再派一个文化高的同志去县委做秘书，帮助你学文化”。

我又顾虑自己是个女同志，当时中央苏区女同志虽多，但还没有女同志当县委书记的，我怕自己指挥不动。我说：“不知赣南

那边有没有女同志当县委书记？我怕人家不听女同志指挥。”

罗明说：“你怎么一下封建起来了，男女平等嘛！女同志怎么不行？现在中央强调培养提拔妇女干部。现在赣南和闽西虽没有女同志当县委书记的，你先开个头，以后就会有很多女县委书记的。你大胆放心去干吧！”

在罗明的支持、鼓励下，我想只要自己肯努力学习，多听听同志们的意见，虚心向同志们请教，纵有再大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我抱着虚心学习，拼命工作的决心，到长汀走马上任了。

长汀县位于福建西部山区，西与江西瑞金、会昌紧邻，东接连城，北与宁化、石城交界，西南与上杭武平毗邻。是闽赣两省的交通要道。1927年9月，周恩来等同志率南昌起义部队到长汀，在这里发展了少数党员，建立了一个特别支部，以后又建立了中共长汀临时县委。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曾率红四军第一次入闽，在长汀成立了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但其后不久，红四军四师撤回赣南后，长汀又陷于敌手。以后，红军几进几出与敌人形成拉锯状态，长汀成为游击区，直到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闽西与赣南连成一片，长汀才成为巩固的根据地。

1931年1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根据苏区中央政府颁布的划分行政区域的条例，划定长汀县的管辖范围为：河田、四都、古城、长汀城、汀东、童坊、张地等区。长汀城为指挥中心。县委设在长汀城（即汀州）。1932年初，重新划分行政区，长汀城成立汀州市委，省委搬到汀州，长汀县委搬到河田，管辖范围为：河田、濯田、大田、南山、中屋、涂坊、南阳、四都、古城、畚心、童坊、大埔等13个区，人口18万余。

县委设有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军事部、妇女部。各部的领导人是：组织部长钟连奎（从古城区委调来），保卫部长是阙初茂，宣传部长和军事部长的名字记不清了，以后郭滴人也被调来

长汀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妇女部长是涂新庭，以后是蔡丽珍。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是温必权，政府设有粮食部、民政部、土地部。下面设有土地委员会、妇女代表会、贫农代表会，各级苏维埃代表会，还有少先队（16岁至24岁），儿童团。陈丕显是少共省委的巡视员，经常到长汀县来工作，董小鹏是儿童团的团长，他们都是长汀人。

2. 布置假会场

我上任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我负责布置一个假会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赣南闽西及周围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其它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先后取得了胜利，全国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央决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根据地内盛况空前的一次大会，不仅有赣南、闽西的代表，还有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和白区的代表参加。在瑞金召开这样的一个大会议，国民党反动派免不了要来破坏，平时他们就常派飞机来轰炸苏区，这次敌人也极有可能派飞机来轰炸会场。为了保卫代表们的安全，和大会的顺利召开，组织上决定在邻接瑞金的长汀县布置一个假会场，来迷惑敌人。当时闽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到瑞金参加大会，省委就将布置假会场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接受任务后，就叫了几个同志一起去找合适的假会址，我们在汀州西郊通古城（古城是瑞金和长汀两县的交界处）的要道旁，找到一座无人居住的空茅屋，这里只有这一栋小屋，周围没有房子，离老百姓居住的村庄还有一定距离，如敌机来轰炸，不会伤害到群众。我们决定在这里布置一个假会场。茅屋不大，我们就在屋的四周拉上好几幅大红的大标语，茅屋的正中用松枝扎

了一个大的彩牌楼，上面挂上大横幅，贴上一张四方形的白纸，上书“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屋门前两旁还插上许多旗帜，会场布置得很热闹，很醒目。11月6日假会场布置停当，引来周围很多群众参观，他们真以为在这里开大会，这个消息很快在群众中传开了，当然消息也传到了国民党情报机关。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8日，敌人就派了几架飞机来，先在汀州城上空盘旋了几周，接着在我们假会场上先扔了几颗炸弹，在县城也扔了炸弹，假会场被炸平了，汀州城内兆征路被炸，一些店铺被炸毁，受了些损失，群众有些伤亡。幸好周围的村庄离会场比较远没有炸着。敌人满以为会场被他们炸平了，代表被炸死了，大会肯定开不成了。殊不知大会的代表们安然地坐在瑞金叶坪的会场内，热烈的讨论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等重要文件哩！大会顺顺利利开到20日闭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胜利诞生了。敌人妄图破坏大会的阴谋破产了。大会结束后，临时中央政府和省委领导都对我们布置假会场的工作给予了表扬。我自己则感到工作做得不够周密，没有保卫好汀州城，使城内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损失，真是遗憾！

3. 周恩来的教诲

我到长汀当县委书记时，闽西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运动还在继续。在布置假会场的任务完成后，省委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带一连赤卫队去古城抓反革命，省委一位领导对我说：古城问题很多，区委书记也可能有问题，你去了解一下。临走时，他交给我一个名单（区委书记于正平的名也在名单上），要我按名单把人抓回来。古城是长汀和瑞金交界的山区，是瑞金到长汀必经之路，红军在这里几进几出，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时，重新解放了古城。国民党撤退时散布了很多谣言说：“共产党、红军杀人”，

加之这时闽西根据地内肃反运动正搞得很紧张，在土地革命中又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错误政策。有些地主、富农和革命队伍内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就逃到了古城山区，这样就更增加了群众的恐怖，把谣言信以为真。因此，这里的群众工作比较难做些。我们到古城时，街上的店铺都关了门，冷冷清清，我们赶到古城区委时，区委书记于正平正在主持区委会，见我们来了，他很热情，赶紧给我们安排吃、住。晚上，于正平和区委组织部长钟连奎，还有一个干部曹得喜一同向我们详细汇报了古城的情况，问我们来古城有什么任务，我从他们汇报的情况来看，认为古城出现这些问题，主要还是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听信了谣言。我不相信对我们这样热情，又主动向我们汇报的这位区委书记就是反革命？第二天，我又找区委的一些同志谈话，从侧面了解情况，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来看，区委的领导都是好同志，只是在发动群众工作上缺少些办法，不是什么反革命。我就对他们说：“我们这次来古城主要是抓逃到山区的反革命”，区委的几个干部就带着我们进山，到山里抓了一些“白毛子”回来。“白毛子”是逃到山里的人，时间长了，头发变白，群众就叫他们为“白毛子”。至于这些人是不是反革命，该不该抓，我不了解，也没考虑那么多，只想到省委交来的任务，就该完成。我还自认为任务完成得不错，回到汀州就兴冲冲地到省委去汇报。

当时省委在城内一个旧政府的房子里办公，我一进门见屋里坐着一位陌生的男同志，穿着一身老百姓的便衣，中等身材，约模三十开外年纪，瘦瘦的脸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见我兴冲冲的样子，笑着问我：

“这位女同志干什么来着？”

我说：“抓反革命回来了。”

他一听就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说看，是怎么抓的？”

“从山里抓回来的”，我回答。

“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有什么根据？”

我一时答不上来，心里纳闷：他是谁？怎么刨根究底的？根据什么？领导上给的名单不就是根据吗？想到这儿脱口而出：“就根据领导上交给的名单抓的。”

李明光见我有点不太耐烦的样子，赶紧过来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中央局的领导周恩来同志，是刚从上海来，到瑞金去的”。

我一听这位就是周恩来同志，不由得为刚才自己的冒失弄得满脸通红，周身不自在，手脚却不知放在何处为好。周恩来见我这样，笑着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干什么工作？

李明光向他介绍说：“她叫李见珍，就是长汀县的县委书记”。

周恩来高兴地说：“好哇！我第一次进中央苏区，第一次见到一位女县委书记”。接着他就耐心地给我讲党的政策，他说：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的根据，要进行调查研究，弄清这个人有没有反革命罪行，是不是我们的敌人，切记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如果我们把好人当成敌人抓了，群众就会害怕我们，就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就不能团结大多数，就不能孤立和打击敌人，反而使我们自己孤立起来。周恩来对我的谆谆教导，打开了我的心窍，使我懂得了干革命光凭一股热情和干劲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会冷静地思考问题，特别是对人的处理，一定要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才能带领群众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才能不伤害自己的同志。不久后，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经过调查，把这次抓来的人都放回去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使我们避免了一次错误。周恩来的教导，使我终生难忘。解放后，我在负责纪检工作和组织工作时，在处理党员和干部时，总想起周恩来对我的教导，就特别慎重。

4. 闽粤赣省党代会

1931年12月下旬，闽粤赣省委在汀州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罗明主持，大会主要是讨论贯彻苏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央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召开闽西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和深入闽西土地革命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并选出了省委领导成员，罗明、张鼎丞、李明光、谭震林、郭滴人、萧向荣、方方、范乐春、李见珍等为省委执行委员，罗明为书记，李明光为组织部长，郭滴人为宣传部长，大会正式宣布了我为长汀县委书记的任命，方方被任命为上杭中心县委书记，萧向荣为永定县委书记。萧向荣原为省委秘书长，他到永定县后，由李沛群接任秘书长，我仍挂着省委妇女部长的名，妇女部的工作交傅彩秀负责。

1932年3月初，根据苏维埃中央局指示，在汀州基督教堂召开了中央闽粤赣省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苏区中央局派任弼时来指导，会议传达了苏区中央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总结了闽西一年来斗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过去一年在军事斗争，根据地的建设、土地革命斗争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在军事斗争上的单纯防御、肃反中心论，以及在土地革命中侵犯中农利益，在政权建设中排斥中农等等错误。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闽粤赣苏区党的任务》、《党的建设》、《苏维埃工作》等决议案。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大会宣布闽粤赣省委改为福建省委，并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新选出的省委执行委员有：罗明、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郭滴人、方方、萧向荣、范乐春、李见珍等等。罗明、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郭滴人为常委，罗明为省委代理书记（中央决定的，但正式省委书记中央一直没有派来），李明光为宣传部长，随后，中央派刘晓来任常委、组织部长。

根据党代会的决定，接着在汀州召开了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

代表大会，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张鼎丞任主席，郭滴人任文化部长，范乐春任土地部长，李六如任财政部长。

随即共青团也召开了省代表大会，陈荣任团省委书记，以后由冯文彬任团省委书记。

在此前后，又成立了福建省军区，罗炳辉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

在这一时期，闽西根据地扩大了，在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土地革命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5. 腿勤、手勤、嘴勤

长汀县由于经过几次反复，所以许多工作都要重新开始。党代会决定长汀等新发展的区域要在春耕前完成土地革命；要扩大红军，向红军输送战士，建立地方武装，省委要求长汀和连城两县要建立一个独立团，各个区、乡建立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向东发展扩大苏区；要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员，巩固扩大党的组织；要建立工会，贫农团，少先队，和女工、农妇代表会，以及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洗衣队支援红军等等，任务真是不轻。作为县委书记，样样都要管，忙得团团转。怎样抓好全县的工作，我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不靠报表，不靠汇报，自己下去，深入实际，当场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工作中，我靠的是“三勤”，即腿勤、手勤、嘴勤。

腿勤。就是多往下面跑，靠一双赤板脚，走遍全县各区、乡、村，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我随身带一张地图，一个小本子，一个干粮袋，一支手枪，一顶竹笠。走到哪里，就住在那里，吃在那里，一边把我了解到的情况，用各种不同的记号，记在本子上。如各区、乡、村的基本情况，各项任务完成的情况怎样，好的划上一种标志，差的划

上另一种标志，中等的也划上一种标志，哪些地段的土地肥，收成好，哪些地段的土地瘦，收成差，也划上不同的标志。各地的生产情况，群众生活情况，各项运动和各種组织建設的情况，我也记在小本子上。遇到不会写的字，就问周围的同志，有时间不到就划上个符号，等碰到文化高的同志时再问。这样对各地的情况，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布置任务时，就可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如征粮时，哪些地方该征多少，扩军时，哪些地方该扩多少，组织互助互救时，该采取些什么措施等等，我心中有数，任务就完成得比较顺利，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手勤。就是和群众一起干活，走到那里就拿起锄头或挑起扁担和群众一起劳动。我在家时，从小就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般农活我都能顺手的干，无论是下田割禾、插秧，上山砍柴，还是在家烧火煮饭，我都和群众一起干。通过劳动，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能进一步了解到各家各户的实际情况。例如：扩大红军是当时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经过多次扩大红军，积极分子都参军了，再要动员群众参军就比较困难，特别是苏区搞了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一些好人，有些群众不敢参军，一些红军战士也从部队跑回来。这就要了解各家各户的实际情况，了解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困难。确有困难的就不要太勉强，有实际困难的帮助他解决，思想不通的，做好家属和他本人的工作，这样分别不同情况去做工作，任务就比较好完成，群众也较满意。

嘴勤。就是多宣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的道理，通过和群众谈心，唱山歌等多种形式，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如：古城区刚解放时，群众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敌人撤退时散布了很多谣言，群众把粮食和贵重物品都藏到山里去了，店铺也关了门。我就和区委的干部一起，逐家逐户地做群众工作，向他们讲解党的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又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党的政策，讲明我们开展土地革命，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富农多

余的土地和公田，其他人的财产一律不动，并保护工商业。经过宣传，群众的思想顾虑慢慢解除了，接着我们就领导群众，对地主和富农多余的土地予以没收，分给贫苦农民，而工商业一律不动。在实际行动面前，群众受到了教育，进一步发动起来，敌人的谣言也破除了。

1932年春夏，毛主席在汀州傅连璋的福音医院养病，有一天叫我去汇报工作。他问我长汀县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怎么样？我如实地汇报说：有些地方生产搞得好些，群众生活也好些；有些地方群众的生活还是很苦，粮食不够吃，靠吃菜干、薯干，吃盐也很困难，盐很贵，又买不到。我们只得动员群众种杂粮，种瓜菜来渡荒。毛主席说：你们这样做很好，当个县委书记，要管好大家的家务，要组织群众多种杂粮、瓜菜、晒些菜干、薯干、芋头干、南瓜干、笋干等等准备渡荒。没有盐吃，可以组织群众挖烂屋的旧墙土熬硝盐，过去盐商屯盐地方的泥土也可挖来熬盐。有盐时，动员群众腌些咸菜，没盐时当盐吃”。我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编了个顺口溜：“大口小口，每家三斗（指三斗粮食），大袋小袋，每家三袋（各种干菜）；大缸小缸，每家一缸（指咸菜）”。我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要群众准备这些东西来渡荒。

6. 支援东路军攻打漳州

1932年4月，根据毛主席的建议，红一方面军的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进驻长汀，准备攻打漳州。毛主席在汀州召集了东路军和福建省委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部署攻打漳州的军事行动。福建省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消灭团匪，巩固根据地，在物资、运输等方面支援东路军。

会后，罗明同周恩来来到河田，召集我们县委领导开会，具体部署我们县如何做好后方工作，支援东路军攻打漳州。我们根

据周恩来和罗明的布置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4月5日，县委发出了《关于动员群众消灭苦竹山，中屋村的团匪，并实际参加革命斗争》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和共青团、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把群众动员起来，积极支援前线。

（1）我们组织了两个模范少先队连，和500名赤卫队员，参加主力红军作战，和担架运输工作；

（2）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蔬菜、草鞋支援作战部队，还组织救护队、洗衣队为东路军指战员洗衣和护理伤员。东路军进军漳州途中，路过河田、南阳，我们组织妇女老人沿途为红军送茶送水，送菜等等；

（3）县委领导率领独立营、赤卫队攻打苦竹山等地的团匪，歼灭了这一带的团匪，巩固了边缘地区，配合东路军攻打漳州的战斗。

4月10日，东路军攻下漳州，缴获了很多武器装备和其它物资，还有两架飞机。我们的两个少先队连，去的时候带的是梭标和大刀，回来时已用缴获敌人的枪枝、弹药装备起来。后来这两个连编入了少共国际师，经过训练后转入正规红军。那500多赤卫队员，也用肩担背挑，运回大批胜利品，连飞机也搬回来了。这些东西先放在河田，以后我们又组织赤卫队，把这些东西运到汀州，还在汀州开了个展览会，很多人去参观。5月1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还在长汀召开了游艺体育运动大会，纪念“5·1”劳动节和庆祝攻打漳州的胜利。

三、闽西的土地革命

1. “抽多补少”与“抽肥补瘦”

闽西根据地在1929年冬，已开始了土地革命。我是1930年1月到闽西的，在永定县的湖雷住了几天。过完春节，张鼎丞即要

我到上杭县的白沙去做群众工作，也就是发动群众参加土地革命。这时的土地政策，是按闽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的规定执行的，主要有以下几点：没收一切地主土豪及福会公堂的田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乡为单位，按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不打乱平分；对住在乡村的地主家属，酌量分给田地，给以生活出路。这些政策很受群众欢迎，贫苦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广大农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实现了世代梦寐以求的得到土地的愿望，男女老幼喜气洋洋，生产热情、革命热情大大高涨。他们努力生产劳动，积极支持红军，妇女为红军做鞋，送菜；男人踊跃参加红军，各村成立了赤卫队，巡逻放哨，维持社会治安。从而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抽多补少”的分配办法，只注意到土地数量的平均，忽略了土地的质量问题，结果抽出来的田，多数是瘦田，好田都是由原来主人自己留下了。这样就形成地主，尤其是富农留下的肥田多，贫雇农得到的多数是瘦田。他们原耕的田本来就差，补进来的又是瘦田，刚刚分到田时，贫苦农民沉浸在得到土地的欢乐之中，没有注意到肥田瘦田的问题，待到下了种，禾苗长到分蘖抽穗时，肥田、瘦田的差别就明显起来。同样的耕作，肥田的禾苗壮实，分蘖多，穗多穗大；瘦田苗弱，分蘖少，穗少穗小。见到这种情况，一些贫苦农民有意见了，感到单是按“抽多补少”分配土地，虽分到了土地，但一亩田收的谷子，比富农的少多了。不少人就要求重新调整土地。我们这些直接参加土地革命的同志，也感到单用“抽多补少”的办法来分配土地还是不够合理，使贫苦农民吃了亏。有必要进行土地的调整，但如何调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6月，正当闽西的干部群众议论如何使土地分配更合理之

时，毛主席率红四军第三次进入闽西，特委即将群众的意见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于是毛主席便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研究闽西土地革命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联席会议是在长汀县的南阳（今属上杭县）龙田书院召开的，会议由毛主席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红四军的领导和闽西根据地各方面的领导邓子恢、张鼎丞等，共有好几十人，我当时就在南阳附近搞土地革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

南阳会议讨论最热烈的是“抽多补少”和对富农的政策问题。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抽多补少”这个办法，手续简便，暴动后很快就可以分田，还是可行的。但也有缺点，就是富农把持的肥田多，贫农不满意。不如在“抽多补少”时，又来个“抽肥补瘦”，肥田多的抽肥田，瘦田多的抽瘦田，把肥田瘦田搭配均匀来分配，做到各人分配的田地数量上大体平均，质量上也差不多。这样贫雇农就会满意了。毛主席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在会议的决议中，保留了“抽多补少”，又加上了“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同时将过去的“不得妄想平均”的提法，改为“不得把持肥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

会上还有人提出要以劳动力为标准来分配，多数人反对这个意见，被会议否定了。

南阳会议也受到了当时党中央强调反对“富农”的“左”的错误影响，会议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案，将闽西党一大制定的一些正确政策否定了，作出了一些“左”的错误规定，如：

将过去闽西“一大”提出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两个正确的口号，改为“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的“左”的错误口号；

认为“富农的剥削比地主更加残酷”，富农“自始至终是反

革命的”，要和反地主斗争一样来进行反富农斗争；

把一些“不出租土地，又不雇用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作，但土地劳力农具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一种人”定为“初期富农”，这实际上是把富裕中农和部分中农划成了富农，并且还规定要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这样做，无疑是侵犯了中农的利益；

此外，会议将原来闽西“一大”规定的对田地上作物的处理办法，即“本届的生产归原耕人收获”，改为“何时分田，何时得禾”的办法（待后详述）。

南阳会议虽然受到一些“左”的错误影响，但会议坚持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和“给地主家属酌量分给田地”等正确的政策，得到了群众和干部的拥护。会后，闽西已分到田的地区，按会议规定的政策，进行了土地调整；新暴动区也很快的分了田地。

2. “何时分田何时得禾”的后果

在南阳会议前，闽西分配土地时规定：如分田在下种之后，则“本届的生产归原耕人收获”。南阳会议认为这个办法对富农有利，对贫雇农不利。理由是：“这种政策在每年收一次的地方，贫农及失业群众名曰分了田，实际要等到明年秋天才第一次收得谷子，每年收两次的地方也要下一次才收得谷子”，因此，就改为“何时分田何时得禾”，也叫“青苗跟田走”，但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都和原来想象的不一樣。

在贯彻这个政策时，我正在汀东县委工作，有一天，有些同志向我反映说：有些区、乡出了乱子，请县委领导同志快点下去处理。第二天，我就到乱子闹得最厉害的一个乡去了解情况，记得是古城区的一个乡，沿途看到很多农民正急急忙忙在割青苗。这时，禾苗已灌浆还未成熟，农民把没有成熟的稻穗割下

来，稻粒打不下来，就把稻穗磨成浆煮来吃。有的农民把菜园种的菜也拔了，连养的鸡、鸭和猪都杀了。我不知出了什么事。一了解，原来是农民听说调整土地时，青苗要跟田走，怕自己种的作物，将来分给别人，再加上有些坏人趁机造谣破坏，所以农民急忙割呀！杀呀！我一看情况严重，就逐家逐户征求意见，群众都提出：调整土地时，原来是谁种的庄稼应归自己，不要跟田走。我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对的，同时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做的。我就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谁人种禾，谁人收割，一切作物归原耕者所有，不跟田走”，要大家不要割青苗、杀家畜、家禽。这样才把混乱现象制止住了。我回到县委把这一情况向县委的同志们讲后，要求县委同志分头下去，向农民讲清情况，制止乱割、乱杀的混乱现象。有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认为我这样做“是富农路线”。

南阳会议提出“何时分田何时得禾”，目的是为了贫雇农的利益，但是没有考虑到要区分新分土地的地区和已分过土地地区的情况不同，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当时闽西根据地总的情况来说，大部分地区已不是第一次分田，田早已分了。贫雇农已在分得的土地上种上了庄稼。在局部调整土地时，提出“何时分田何时得禾”或“青苗跟田走”的口号，农民害怕自己种的庄稼被别人收了，尽管调整给他的田地上的庄稼归他所有，但他还是不放心，不愿意自己种的东西分给别人。因此，就出现上述那种乱割乱杀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生产。所以，我们制定政策，不能光从主观愿望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有时，主观愿望虽好，但客观效果却适得其反。

4. 按人口分田还是按劳力分田

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还是按劳动力为标准，劳力多的多分，劳力少的少分。这个问题在闽西的土地革命过程中，也曾

出现过几次反复，有一个认识过程。闽西第一次分田，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分田后，有的人看到富农家里人口多，留的田也多，就提出按人口分配对富农有利，要按劳动力来分配。南阳会议时，否定了这个意见，坚持了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会议认为“中国的富农既是以自己劳力为主体的占绝大多数，那末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这于富农是很有利的，因为他们不但有劳力还伴随着充足的牛力、农具与资本，不比贫农虽有劳力，但伴随的牛力、农具、资本很不充足甚至没有。所以，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于富农有利的”。南阳会议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就发展生产来说，也是按人口平均分配较按劳力差别分为有利”。但是，后来又有人提出要按劳力为标准来分配，还提出妇女、老人、小孩只能算半劳力，只分半份土地。这个问题一提出，在干部和群众中又引起激烈争论。劳力多的农民没意见，劳力少的就有意见，特别是妇女，意见很大。我做妇女工作，整天在各乡、村跑，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贫雇农家里的青壮年男子多数参加了红军，妇女实际上成为主要劳动力，她们分半份田是很不合理的。再说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的生活本来就有困难，如按劳力分配，他们分得的土地就少，生活就会更困难。我坚决不同意按劳力分配。

1931年4月，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又认为按人口平均分配是帮助了富农，最后通过的决议中，否定了南阳会议决定的以人口为标准的分配原则，决定以劳动力为标准来分配。决议规定：“只要有劳力的农民，应领得一部分土地。小孩、老人由群众大会决定酌量分给他们一部分田地，作为‘附加亩数’，亩数多少，要按照当地生活情形经过乡苏群众大会通过规定，但每人领得的‘附加亩数’不得超过有劳动力的人的每人应得的亩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使那些人口多，劳动

力少的贫苦农民和红军家属，分得的田就更少了。我对这个决议，思想很不通，但上级决定了，我个人也没有办法。

1931年夏，我参加闽西慰问团到瑞金慰问红军，在叶坪见到毛主席，他问起我们闽西土地革命的情况，我就向毛主席反映说：“现在群众对分配土地问题，讨论很热烈，有的人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有的人主张按劳动力分配，老人和小孩只分 $\frac{1}{3}$ 的

地，还有的说妇女和16岁以下的小孩是半劳力，只分半份土地，妇女和多子女的群众意见很大”。毛主席问我：“你的意见怎样？”我说：“还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好，最好是‘中间不动两头平’”。毛主席说：“要按人口平均分配，‘中间不动两头平’好！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中间不动两头平，即中农的土地不动，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地主、富农的田多是屋前村后的肥田，贫农的田多是边远山脚的瘦田，分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肥田和瘦田搭配均匀来分，替贫苦农民设想得周到一些！”我听了很高兴。我回到闽西后，有些地方已按劳力分了田，出了不少问题。1931年8月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又重新肯定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1932年3月，闽粤赣苏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

“过去依照年岁分田的决定和执行过于机械，以致多小孩多老人的贫农分田比较少，现在应该把所没收社党的土地，以及所清查出来的土地，由各乡自己设法，补给过去分田较少的贫农、雇农与中农，已分配好的地方不要重新分配”。还规定：“在新发展的区域如长汀、连城、宁化、武平等地，应赶快于春耕前分好，分田一般的原则是：雇农、贫农、中农以人口为标准，富农分坏田并要以人口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决议强调在新区分田时，不要侵犯中农利益，不能强迫分配中农的土地，应教育贫雇农，打破平均主义的倾向。还指出“消灭富农的倾向应纠正，同

时要防止富农弄鬼，窃取好田”。当时，我正在长汀县任县委书记，就是按这个政策去分配土地的。

4. 查田运动

闽西的土地革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克服了一些“左”的错误影响，解决了土地革命中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使得党的土地革命路线逐步得到完善，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到1931年初，闽西根据地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武平之间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5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生产积极性，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闽西根据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其后，他们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土地政策也逐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得到贯彻和执行。8月，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规定：“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富农可以分得一份较坏的土地”，开始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11月，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信中，更进一步指出：地主及其家属不仅不能分田，而且不允许租田给他们耕种，也不允许他们垦荒。这样就给地主及其家属在乡村的生活出路完全堵死了。信中还批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路线”。根据中央这个指示精神，在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各苏区内已经分配的土地，如不符合本法原则的，必须重新分配。并要求各地按照《土地法》的规定，进行土地检查。这样就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被否定了。

1932年7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检查土地条例》，在闽西根据地内开始了查田运动。这时我正在长汀县任县委书记

记，几年来参加土地革命的实践，深感土地政策的稳定，对安定人心，促进生产是十分必要的。政策变来变去，而且越来越“左”，使我们在下面做实际工作的人，无所适从，也不知如何向群众解释。政策变一次，土地又要从新调整和分配一次，这样一次、两次、三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使许多农民对土地革命产生怀疑，农民种田不敢下种下肥，妨碍了耕作，影响了生产，并且还造成人们思想上和社会上的混乱。在我自己思想上，对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也有些反感。在查田运动开始时，我就暗自思忖，作为一县之主要对全县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负责，要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负责，处事要慎重，尽量避免大的错误，避免出现混乱。因此，我对查田运动的态度不那么积极，但也不敢对抗。查田运动是由省苏维埃政府布置下来的，我就让县苏政府土地部去办，县委没有集中精力去搞。后来招致“长汀查田运动搞得不好”的批评。这时的查田运动刚刚开始，整个运动搞得还不厉害。所以，我们也没有受到太严厉的批评。

1933年6月，苏区中央临时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接着苏区中央局又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一场大规模的彻底的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全面展开，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查田运动一开始，苏区中央局就夸大了土地革命的缺点和错误，抹煞了土地革命的成就，认为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实行了不正确的路线（主要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造成有80%的面积，200万群众的地区，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所以要开展彻底的查田运动。要求在查田运动中，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给富农一份较坏的劳动份地。还要求在查田运动中，肃清反革命分子，改造地方苏维埃，洗刷地方苏维埃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出去等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查田运动越查越“左”，造成了严重的

恶果。

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开始时，也正是福建反“罗明路线”斗争紧张的时候。由于我对反“罗明路线”思想不通，被调离了长汀县委的领导岗位，在省委作检查。后又被调去连城，协助东方军做地方群众工作，没有参加查田运动的领导。9月，我回省委后，被派到各地巡视，这时也正是查田运动搞得最厉害的时候，有些地方把富农甚至中农查成地主，把一些中农甚至贫农查成富农；地主的一切土地财产全部没收，扫地出门，不准他们租种土地，也不准开荒，也不给饭吃，把地主剃成阴阳头游街，抓到劳役队去罚做苦工，有的地方还出现乱打乱杀现象。甚至连地主的小孩也不给饭吃。地主被抓被杀后，家属小孩就流浪街头到处乞讨。斗了地主，又斗富农。富农被斗，中农害怕，不少人逃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有的整个村的人都逃跑，结果使贫雇农很孤立。

在查田运动的同时，在苏维埃政府内甚至红军内部查阶级，结合搞肃反，大搞检举揭发，一些当了多年干部和红军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出革命队伍。有些被抓到劳役队去做苦工，有的逃到深山躲藏，也有的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在根据地内造成一种恐怖气氛，人人自危，使社会秩序更加不安定。在五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打过来了，不少人就反水，帮助国民党，使闽西根据地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况之中。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严重的后果，在当时就显示出来了。为了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于1933年10月颁布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两个文件发下后，各地纠正了一些被错划了的阶级成分。但由于当时党中央仍然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所统治，查田运动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没

有改变，“左”的错误政策仍在各地继续执行，错划了阶级成分的也没有完全纠正过来，一直到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

我在闽西根据地整整四年的时间，无论是在特委、省委做妇女工作，或在长汀县做县委书记，都很少呆在机关，多数时间是在下面跑，做群众工作，直接参加土地革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我都亲身实践过。看到过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土地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和给人民带来的欢乐；也看到“左”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1946年我在苏北淮安领导土地改革试点，和1950年在华南分局具体领导广东三个县的土改试点时，便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鉴，坚决摒弃那些乱打乱杀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将地主扫地出门等等“左”的错误做法。没想到我们在广东搞的三县土改试验，竟又被批评为“和平土改”。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深深感到不仅过去的历史教训要很好的总结，尤其是在我们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这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更应该很好的总结。我看到一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但已被党中央批判过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演，心里真是难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来之不易，是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用鲜血换来的，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都应当珍惜。

四、在福建开展的反所谓 “罗明路线”的斗争

1. 事情的起因

1933年春，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站不住了，就搬到江

西中央苏区来了。于是“左”的政策便进一步在中央苏区贯彻，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和打击，就连赞同毛主席主张的同志也接连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的打击。1933年2月，在福建开展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就是一场错误的党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同志受到了打击。

1932年冬，毛泽东被调离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曾住在汀州福音医院治病，正好罗明也在福音医院养病。毛主席就跟罗明讲：闽西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还指出：在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十九路军及陈济棠部队对苏区的进攻，这对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罗明听了毛主席的指示，第二天便召集福建省委会议进行传达。会议是在福音医院进大门右手边的一间大厅里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等，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听了罗明的传达，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以省委的全权代表到杭、永、岩去，领导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晓主持省委工作。

散会后，我问罗明：“根据毛主席这个指示，你看我们长汀县从哪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为好？”罗明说：“我先考虑一下，明后天我即去上杭，路过河田（长汀县委所在地）时再跟你们谈谈好吧？”我说：“好吧！到时我召开县委会，请你作指示”。

过了两天，罗明即来到河田，他是下午到的，我先将长汀县地方武装的情况，群众组织的情况，以及社会治安、边缘地区的敌情等问题一一作了汇报。罗明说：“现在上杭、永定、龙岩的情况比较严重，长汀的形势好些，长汀东南方虽有团匪的骚扰，但敌人力量较弱，还没有正式白军与之直接配合，县委要集中地方武装，肃清东南方向的团匪，与连城县配合行动，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与连城联成一片，巩固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把全县人民动员起来，加强县内的防卫，保卫根据地。”

当晚，我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请罗明作指示。他向大家传达了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并对县里的工作布置作了具体的指示。第二天，罗明离开河田去上杭。县委根据他的指示又作了些研究，随即集中县独立团、赤卫队配合地方红军，向东南方向出击，歼灭了几股团匪。我兼任独立团的政委，和部队一起在那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地方部队出击的同时，在县内进一步发动群众，把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等群众组织都动员起来，加强巡逻放哨，保卫苏区。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都积极参加斗争，有的到前线，有的在后方领导群众。通过这次动员和作战行动，使全县干部和群众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我们县地方部队的战斗力，也使群众对粉碎敌人“围剿”保卫苏区的信心大大增强。这一段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罗明对我们县的工作部署也是对的。

罗明到杭、永、岩地区后，又深入到各地了解情况，并到新泉、连城等县去检查和布置工作。他将去各地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于1933年1月，先后给省委写了两封信，向省委报告各地的情况，并提出他对长汀、连城、新泉三县的工作和杭、永、岩地区的工作意见。他建议把长汀东部和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建立巩固的后方；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向发展，以巩固闽西、闽北，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防止十九路军向连城、汀州和瑞金的进攻。他认为要抓紧当时的最好时机，来完成这一工作，如果丧失了这个时机，以后就要多花几倍的力量了。对杭、永、岩这个边缘区，他认为应该和根据地巩固地区有所区别，这个地区的中心工作，是动员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敌人，应该精简机构，集中力量领导战争。

罗明的意见是经过调查研究，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同时，罗明作为省委书记，省委派驻杭、永、岩的全权代

表，他给省委写信报告各地情况，提出个人的意见和建议，这完全是正当的积极的。由于罗明的意见与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和“猛烈地扩大红军”100万的指示相违背，临时中央就认为罗明是对抗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愿意扩大红军。1933年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已“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并宣布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随即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2. 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情况

2月一天，我突然接到李步青（当时中央苏区粮食部长）打来的电话，他说要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问我知不知道。打完电话，我心里实在感到很突然，不知道罗明有什么错误？什么叫“罗明路线”？我认为罗明的工作很深入，能联系群众，作风正派，待人诚恳，几次来我们河田，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为什么要反他？又想罗明会不会在前线出了什么问题，我疑惑不解？不久，我接到通知，要我到汀州开会。我到了汀州，中央局派来福建的代表陈寿昌找我谈话，他说：罗明犯了路线错误，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到杭、永、岩去是“退却逃跑”、“取消主义”要对“罗明进行‘残酷斗争’”等等。他讲了以后，我才知道罗明在前线没有出什么问题，我想罗明到杭、永、岩去，是听了毛主席的指示，省委开过会研究决定的，是大家同意的，并不是他个人定的，我参加过这个会议，也是同意的，怎么能说他是“退却逃跑”呢？而且罗明对我们长汀县工作的布置，也是积极的，怎么能说他对革命悲观失望呢？我的思想越发不通。

2月2日，遵照中央局指示，福建省委在汀州召开了省临时代表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央局派人参加。会议

由陈寿昌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罗明、刘晓、方方、李见珍、范乐春及各县委县委书记等。罗明在会上作了检查，大会发言对罗明进行批判。由于福建省委多数同志对反“罗明路线”思想不通，态度不积极，中央局认为：福建省委内以刘晓为代表对“罗明路线”斗争不坚决，是腐朽的自由主义，会上又对刘晓进行了批评。随之改组了省委领导机构，由陈寿昌代理省委书记。这次会议后，在福建省进一步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和迫害了一大批领导同志。

3. 强迫命令进攻大田屋

由于我对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思想上想不通，在临时代表会议期间，也受到批评。会后，回到河田。不久，接到省委书记打来的电话，要我带1万地方部队立即进攻大田屋。我一听吓了一跳。我们一个县哪来1万部队？县里只有一个独立团，只有几百人，全县的赤卫队集中起来也不过千多人，到哪里去弄1万人来？当时长汀全县的总人口才十七、八万人，几年来不断地扩大红军，一批一批的青壮年都参加红军了，短时间内怎么能一下动员出1万人来哩！况且也不能把全县的武装力量，连同少先队等全出动了，万一敌人来进攻我们怎么办？不是把根据地丢了？再说县里的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凡能打仗的，稍有些战斗经验的，都一批批的编入了正规红军。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多数是新参加的，没有多少战斗经验，主要任务是保卫根据地，有时瞄准有利时机，打击小股团匪，没有把握打这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就我自己来说，虽打过不少游击战，但也从未指挥过这么大规模的进攻战，县委军事部长也没有打大仗的经验。同时，我们对敌情也没有充分的侦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没有把握的仗是不能打的。对敌情不详，自己的力量又没有组织好，匆匆忙忙把队伍拉出去冒险进攻，只会打败。基于以上想法，我就在电话里把我

们县的实际情况向他汇报，并建议他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把队伍组织好，研究一下怎么打好。他一听就火了，批评我说：

“你害怕了，想退却逃跑？只许进攻，不准退却！这个仗一定要打！”我一听急得哭起来，就顶了一句：“朱总司令指挥多少人？我怎么能指挥1万人？这个仗我打不了！”他说：“打不了也得打！”上级的命令，不服从不行。以前我碰到困难，自己解决不了，就去找老首长汇报，请教。现在闽西原来的老首长自顾不暇，罗明被批判，张鼎丞、郭滴人都在作检查，李明光去前线，怎么办？真急死人了，后来我就找刘晓，刘晓答应带一个团来支援，总算得到了一点帮助。

我们县委的领导同志，四处去动员，把赤卫队，少先队通通拉进来，凑来凑去也只凑到两三千，加上刘晓带来的一个团总共还不到五千人，由刘晓和我加上县委军事部长3个人组成一个指挥部，刘晓任总指挥。按照省委书记的命令，进攻大田屋。

那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在进军途中，遭到敌人伏击，同志们个个英勇奋战，但由于没有作战经验，虽打退了埋伏的敌人，但双方损失都很大。正当我们向前攻击时，县委的通讯员赶来报告说，敌人快要进攻县委所在地河田了。我们只得停止进攻大田屋，带着部队往回打，待我们赶到河田附近时，得知敌人已攻占河田。我们带着部队把河田夺了回来，回到河田一看，县苏维埃政府的房子被敌人烧了，留在县委主持工作的组织部长钟建奎、宣传部长和县工会委员长3位领导同志都牺牲了，城里被敌人捣毁得乱七八糟，我心里难过极了。

打完仗，把情况如实向省委书记汇报，他又大骂我一顿，说我是盲动主义。是对反“罗明路线”有抵触，是自由主义，我伤心得大哭一场。心想事先我就不同意打，那时骂我是退却逃跑，现在又骂我是盲动主义，左右都不是。仗没打好，思想又不通，就把我调离长汀县委，到省委软禁起来。要我反省，写检查，还

要我到党代表大会上作检讨。我每天在房子里写检讨，看《红色中华》和《战斗报》，准备在大会上检讨。

不久，省委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批判福建省委内的“罗明路线”，要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等人检查，也要我和宁化县委书记在大会上检查，中央派3人来指导。会议开始不久，张鼎丞正在大会作检讨，罗明进来了，他一进门就大声说：“我是罗明，罗明路线就是我，与他们无关，一切由我负责，你们不要斗争他们！”他这一喊，会场就乱了。那些代表本来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作检查，他们是闽西根据地的创建人，在党员中威信很高，代表不愿批判他们。罗明这一么喊，大家就把矛头转向罗明，代表们也搞不清什么“罗明路线”，有的听说罗明“对革命悲观失望”，认为悲观失望就是反革命，有的听说罗明“退却逃跑”，还以为罗明开了小差。反正在会上代表们对罗明乱批一通。我们的检查也没有作成。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等人都被撤销了职务，郭滴人被调到长汀任宣传部长，我也调离长汀县委。会后，要我回长汀去交代工作，因新的县委书记没调来，我就把工作交给了郭滴人。省委要我到省苏维埃政府去当党组书记，苏维埃政府根本就没有党组，去当什么书记，我就在省委打杂。

4. 李明光牺牲

李明光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临时代表大会后，省委要他到前线部队去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一天，我接到从连城打来的电话，说李明光牺牲了。噩耗传来，我的嗓子一下哽住了，说不出话来，两眼发愣，木然地站在那里，萧向荣看我那样，吓了一跳，以为我触电了。我把话筒递给他，他赶紧接过话筒与对方对话，才知道是李明光牺牲了。

李明光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是广东大埔人，早在大革命时

期，就投身于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又参加了高陂暴动和百候暴动，创建了大埔县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后参加组建红十一军四十六团、四十八团，先后任这两个团的团长，他曾与古大存等人一起为建立东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0年后，他先后任闽粤赣特委组织部长、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福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在“立三”路线时，上级命令红军攻打东江，他不同意这种军事盲动主义。在闽西肃反运动时，他又反对乱抓乱杀的做法。在反“罗明路线”斗争时，省委要他到部队去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他不愿违心地这样做，就到前线部队去指挥打仗。他率领独立团在连城姑田一带与敌激战，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在敌众我寡，地形又于我不利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他几次请示上级批准撤出战斗，但是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根本不理，硬要他坚守阵地，结果部队陷于敌人重围，就在他率领部队突围时，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明光同志生前我曾得到他不少帮助和教育，当我工作上碰到了困难，思想上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去找他时，他都是很耐心热诚地开导我，帮助我，并支持我的工作。我非常尊重他，他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心里非常难受。

李明光牺牲后，省委要我和萧向荣一起到连城姑田，去处理李明光的后事。我们将李明光的遗体安葬好，就回到汀州，省委仍没有给我分配工作。

7月，彭德怀率三军团入闽，准备攻打连城。连城本是闽西根据地的一个县，1933年初，十九路军占领了连城。连城县的苏维埃政府和各群众组织都打散了，省委就派我随东方军一起到连城，开展地方群众工作。9月，东方军攻下连城，我们随着在连城建立了工委，由我任书记，又把各种群众组织和赤卫队等等建立起来。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见我搞群众工作有经验，很短时间就把各种组织建立起来了，就要我到三军团去当民运

部长，省委不同意，要我立即回去。三军团在连城打了胜仗，缴获了十九路军很多东西，我走时，部队送我两套衣服，二条毛巾，两条肥皂，一条香烟。在当时，有这么多东西就很富了。我回汀州路过河田时，把这些东西又分给长汀县委的同志们了。

五、重回省委妇女部

1. 陈潭秋指导我做女工工作

我从连城回到长汀，在省委第一次见到了陈潭秋。他是中央派来福建接任省委书记的。以前我也曾听说过他是党的“一大”代表，是大知识分子。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有些拘束。当时，他穿双草鞋，戴着蓝布帽，一身旧衣服，虽十分简朴，却透出了文雅和谦和。他一见到我，就说：“你就是见珍同志吧？”我答：“是”。他忙过来和我握手，见到我赤着脚，身材高大，一副农村妇女模样，他笑着竖起拇指打趣的说：“好样的！”他那风趣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的拘束顿时消失，好象见到了一位老领导一样感到亲切。接着他告诉我，省委决定调我回来担任妇女部长。

陈潭秋很尊重工农干部，也很重视妇女工作，他对我说：“你有丰富的农村群众工作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但还要学会做城市工作，做工厂女工的工作，你先把汀州城里各工厂的女工工作抓好。妇女部的工作要宣传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要组织女工学文化，办好女工读书班、识字班；组织妇女做好支前工作，做好红军家属的工作，帮助她们解决实际困难，使她们的丈夫在前方安心打仗。在工作中要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女工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培养妇女工作干部。”他还经常给我讲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优点，并介绍上海、武汉等地工人斗争的情况和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提高我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和增长我对工人运动方

面的知识。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使我的心胸更开阔了，眼光看得更远，工作实践的面更广了。我开始学做城市妇女工作，学做工厂女工的工作。

汀州市当年是中央苏区工商业重镇，红军在这里先后办起了被服厂、织布厂、斗笠厂、兵工厂、列宁书局、中华苏维埃贸易公司、中华纸业公司等工商企业，还有私营或公私合营的樟脑厂、熬油厂、炼铁厂、熬盐厂、弹棉厂，以及竹木、砖瓦、造纸等手工艺作坊和家庭手工业等等。城内有大小商店300多家，还开辟了两处红色市场，每天来赶集的上万人，是赣南、闽西主要农工产品的集散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也是中央苏区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汀州建立了市委，市委书记是王观澜，主要工作由市委管。省委妇女部直接抓了几个女工多的工厂，如被服厂、织布厂等的女工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汀州城里被服厂的女工发生了罢工，原因是城里没有面粉卖，女工上班买不到早餐吃，工人就不上班了。省委知道这个情况后，一方面要市委赶紧想办法，调面粉解决女工的实际困难，一方面要我到工厂去做女工的工作。我先找到女工班长彭雪英，做她的工作，我跟她说：“面粉供应的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请你协助我们动员女工上班。”彭雪英在女工中威信比较高，她的思想通了，就在女工中主动做了许多解释工作，我又和她一起，挨家挨户去动员解释，结果，当天下午就复工了，彭雪英过去一贯表现很好，这次又起了很大作用，我就介绍她入了党，以后她还当了支部书记，成为一名妇女干部。

2. 福建省第三次党代会

1933年10月，在汀州召开了福建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潭秋主持，中央派了张闻天来指导。陈潭秋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福建党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

经验教训，提出了在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福建党的具体任务是：充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努力发展经济，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巩固根据地并积极向外发展；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等等。大会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肯定了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但在选举新的省委领导成员时，仍将一些在反“罗明路线”时，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重新选进了省委领导机构。大会新选出的省委常委是：陈潭秋、张鼎丞、郭滴人、方方、李见珍等，陈潭秋为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郭滴人为宣传部长。我是第一次当选省委常委，仍任妇女部长。

少共团委书记，原是冯文彬，这时，他调少共中央工作，由江西调来的刘英接任少共省委书记。

省委机关的同志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我是党小组长，同志们向我交党费。那时生活很苦，没有工资，每月就从伙食费中节省一点钱，到了月底分给大家零用，叫伙食尾子，伙食费本来就低，能节省下来的钱也很有限，每人每月不过分到几分钱或角把钱。到了分伙食尾子时，我就向大家收党费，每人五分钱。陈潭秋跟我开玩笑，叫我“五分钱”，后来大家都叫我“五分钱”。同志们把几分钱的伙食尾子攒起来，攒到一两角，就到街上去买点油炸豆腐吃，谁买了油炸豆腐，大家都来吃，戏称为“打土豪”。

陈潭秋很注意培养工农干部，为了提高我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他向省委建议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他找我谈话说：“你有实际工作经验，现在组组上送你到党校学习，提高你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你去后好好学习，回来可以在省委担任更重要的工作”。能进学校去学习，这是我日夜所向往的，1933年底，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曾经战斗过四年的闽西，前赴中央党校。

第四章 在红色首都瑞金

一、进中央党校学习

从长汀到瑞金，约有六七十华里山路。我背着背包，在那山峦叠翠的武夷山中穿行，想到即将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想我刚刚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参加革命后，特别是当我当了领导干部后，工作需要文化，便常常为自己文化低而苦恼。我多羡慕那些文化高的同志啊！但是由于长期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我没有时间坐下来学习文化，学习理论，只能利用战争和工作的间隙，拼命学习，向有文化的同志请教，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笔一划地练习写。没有纸、没有笔，我就用树枝在地上学写字，帮群众做饭时，用烧剩的柴炭练写字，睡觉时也在手心上练习写。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几年学习，我已能看懂党的文件和报刊上的文章，在长汀当县委书记时，也能用一半文字一半符号把各区、乡的基本情况记在小本上。现在能有机会到党校去专门学习，真是高兴极了。我决心学好理论，学好文化。想到这里，我又有些不安，怕到瑞金后又学不成。因为在闽西时，有一次组织上已决定派我去学习，正好红军打下一个新区，需要一些干部去做群众工作，组织上临时又决定要我去新区工作，我只好服从，放弃了那一次学习的机会。这次怎么样？

中央党校在瑞金沙洲坝乡的黄竹坎下村，离党中央所在地下肖区不远，校长是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兼任，副校长是

董必武，他主持日常工作。罗明在党校当教务长，成仿吾也在党校工作。中央党校1933年开办，我们这一期是第二期，共分3个班，一是高级班，学员是有一定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一个是白区班，是从白区和新区来的干部；一个普通班，是一般干部，这个班的人数最多。当我知道被编在高级班后，怕自己文化低，学习跟不上，要求董老把我编到普通班学习。董老说：“你当过县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有实际工作经验，编在高级班是可以跟上的，学习上有困难，我找两个文化基础好的同志帮助你”。董老既严格要求我，又体谅我的实际困难，他亲自指定了两位同志在文化上帮助我，这样我就在高级班安下心来学习了。我们这个班共有八九十个学员，女同志也不少，蔡纫湘、危拱之、阚思颖和我4人共住一个房间，她们3人都是知识分子，以后又由她们帮助我学文化。

1. 党校的课程

党校的课程主要是马列主义理论课，分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党的建设三门。社会发展史和党的建设两门课由董必武同志亲自讲授。董老讲社会发展史，从猴子变人一直讲到人类社会最终必然实现共产主义。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个人的体会，讲中国社会的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农民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他知识渊博，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具体，使我们听起来津津有味。董老讲“党的建设”这门课，有一次当讲到工厂党的建设这一节时，他考虑到我们学员大都是来自农村的干部，对农村情况熟悉，对城市和工厂情况比较陌生，连什么叫做车间不少人都没听说过。于是董老讲解得格外详细，并在黑板上画图，说明工厂的组织系统，讲清什么叫车间，为什么党支部要建在车间，在工厂，党要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就好比火车头，党的先锋作用就象火

车头带动列车前进。他用这样通俗的比喻讲出深刻的道理，使我们很容易听懂，学员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

辩证唯物主义课则由成仿吾讲授，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第一次听讲辩证唯物主义，听起来有些玄乎，但也很感兴趣，很新鲜。有很多理论，我们一下弄不懂，讨论起来很热烈，有的同志说：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服都是物质，为什么还要讲主义？有的说：辩证法是不是变戏法？大家学习热情很高，整天争论什么是辩证法，晚上睡觉还争论不休，查哨的来通知熄灯，我们还在床上继续争论。

当时，党校的学员有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程度低，有些不常用的字不认识，有些词不理解。党校还开了文化课，给这些学员补习文化，以便更好地学好理论。文化课的教员是郭潜（此人以后叛变）。党校学员除了在课堂上上课外，还要参加社会活动和到附近的村庄去做群众工作。我到党校的第三天，就被派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当地党支部建立了联系。董老十分注意做好群众工作，他要求我们帮助周围的群众挑水、砍柴、送肥、洗菜，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就去帮群众劳动。

2. 董老是非分明

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根据地，中央提出了扩大100万红军的任务。1934年1月，党校的教员和学员都被派到各地去扩大红军，我曾曾在长汀任过县委书记，组织上就要我带一个组到长汀去扩红。我们到长汀后和县委的同志一起，深入到各区、乡、村做群众工作。这次扩军一方面是招收新兵，一方面是动员回家的红军战士归队。当时从部队跑回去的战士不少，动员归队的工作是比较难做的，过去对离队人员采取了惩罚的办法，结果使扩红工作更加困难，以后便改变了做法，通过做

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归队。我们和县委的干部下去后，便分头去做离队人员家属的工作，家属的思想通了，本人的工作也好办了。同时也了解离队人员有什么实际困难，尽力帮助解决，确实困难很大不能归队的，就允许他留在家里，不扣帽子。经过这两方面去做工作后，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当时，中央组织部规定，完成了扩红任务的，才能当选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党校的文化教员郭潜，到一个县去扩红，没有完成扩红任务。领导上要他到长汀县来参加我们的扩红工作。回党校总结时，他竟说是他到了长汀后才完成扩红任务的。我们这个组的同志听了很生气，长汀县委对郭潜这样违背事实的说法，也很有意见。董老知道这件事后，没有轻易表态，他找了各方面的同志谈话，了解情况，经过调查，搞清了事实的真相后，他一方面表扬了去长汀扩红的学员，任务完成很好；同时，指出郭潜的作法是错误的，开会批评了他虚报争功。董老还结合这件事，教育我们，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弄虚做假，不应争功。这件事给我教育很深，董老处理问题，不轻信、不偏听、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非分明，令人信服。

扩红任务完成后，我想这回可以坐下来好好学习了。不料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要召开了，我是福建省的代表之一，要出席大会。

1934年1月，我到沙洲坝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福建省的代表有张鼎丞、陈潭秋、范乐春、刘英和我等人，张鼎丞是代表团的团长。在这次会议上张鼎丞、陈潭秋、范乐春和我都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刚结束，组织上通知调我到中央妇女部任部长。接到这个命令，我心里七上八下，怕自己水平低不能胜任工作，我要求到党校学习。谁知这时中央组织部已派人到党校把我的行李搬到中央局去了。邓大姐找我

谈话，鼓励我要大胆工作。董老也给我写信来，要我服从组织分配，鼓励我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锻炼、增长才干。在董老和邓大姐的教育鼓励下，我增强了信心，愉快地走上了妇女部的工作岗位。我这次进了中央党校，但又没有学成。

二、在中央局妇女部

1. 中央局机关

2月初，我到了中央局妇女部。这时中央局机关有秘书处，秘书长是邓颖超大姐，组织部部长是罗迈（李维汉），宣传部部长是张闻天，妇女部部长是我。据说以前中央局没有妇女部，妇女工作是由总书记博古亲自抓的。后来彭老总提意见说：“总书记没有必要自己抓妇女工作，可找个女同志来做”。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就设立了妇女部。原先在苏维埃政府里还有个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负责人是周月林，我到妇女部后，周月林的工作也交给了我。

中央局各机关在瑞金下肖区的观音山，办公的地点是在一个大祠堂里，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总书记和组织部、宣传部的办公室在楼上，妇女部和秘书处在楼下。秘书处在妇女部的对面，中间隔一个天井。宣传部办公室在妇女部办公室的楼上。办公和住宿都在一起。在组织部工作的还有金维映，她是罗迈的妻子，以前当过胜利县的县委书记，是位很能干的女干部。毛泽覃、谢唯俊，他们2人是在受到错误的批判后，调到组织部来帮助工作的，以后贺昌也到组织部来帮助工作。在宣传部工作的还有吴亮平。妇女部的秘书是阚思颖和彭儒，以后钟月林、刘彩香调来妇女部工作，长征前夕在党校学习的邓六金、吴富莲、李桂英、蔡纫湘也调到妇女部来帮助工作。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是全总的女工部长，她也住在这里。以上同志都在一起吃饭，那

时根据地的生活很艰苦，粮食有定量，机关同志每人每天9两米，各人用一个小蒲包把自己定量的米包好，放在一个大锅里煮熟。邓大姐的饭量小，她常把自己的饭分给饭量大的同志吃。她工作很忙，正在负责起草党章，是为召开“七大”作准备的，周副主席住在红军总部，正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很少到邓大姐这里来。调我到中央局妇女部工作，是周副主席和邓大姐推荐的。1932年初，邓大姐由白区来中央苏区，路过河田，当时我在河田任长汀县委书记，那时，我们就认识，我到妇女部后，碰到有不懂的事，就去请教邓大姐，她总是很热情地帮助我，和邓大姐以及中央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使我得到不少的教益，增长了知识，增长了才干。

少共中央局机关也在下肖区，少共中央的书记是凯丰，其他负责人还有陆定一、张爱萍、王盛荣。萧月华是少共机关的收发，组织上给她做工作，要她和李德结婚，开始她不愿意，后来少共的领导找她谈话，做思想工作，她才勉强同意的。

2. 苏区的妇女工作

在中央苏区，每到一个大节日，都要搞一次群众运动，如“五一”就搞红五月运动。我去妇女部时是2月，为迎接“三八”妇女节，要求各级党组织吸收妇女入党、入团，发动妇女参加赤卫队、少先队，发动妇女为红军做鞋。各个县、区、乡之间还要开展比赛。这次运动中在福建、湘赣、粤赣三省共发展女党员3900多人，女团员2700多人，女赤卫队员14000多人，女少先队员13000多人；为红军做鞋15万双。这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紧张进行的时期，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反“围剿”战争，妇女工作也是围绕这个中心开展，主要是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是扩大红军，中央提出了扩大100万红军的任务，我们妇女部的工作人员，一方面要直接参加扩大红军的工作，另一方面

要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扩大红军运动。在扩大红军任务中，做好家属的工作，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家属工作一方面是做思想工作，一方面要安排好红军家属的生活和生产，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我们把红军家属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突击队和宣传队。以现身说法的形式，一村一户地做宣传和鼓励工作，使妇女们感到当红军家属光荣，同时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组织群众为红军家属代耕，组织红军家属学文化、办托儿所等等，使红军安心在前方打仗，这样大大激发了妇女送夫、送子当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热情。为表彰优秀红军家属，1934年夏，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委在沙洲坝政府大礼堂召开了模范红军家属代表大会，有江西、福建和粤赣三省的家属代表，还有红军的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给模范红军家属发了椭圆形的银质奖章，上面刻印着“模范红军家属”字样。发奖时，大家站起来拍手，大礼堂的楼板突然塌下来了，敌机来轰炸了。过了两、三天，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会场被炸了，牺牲了几个同志。我们女同志对着牺牲的同志痛哭不已，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都来了，要我们不要哭。毛主席说：眼泪换不来牺牲同志的鲜血和生命，要擦干眼泪，挺起腰杆、继续前进。他们的讲话使与会的代表更坚强起来，我们把会场转移到西江乡下，继续开会，代表们把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化成巨大的力量，纷纷表示要更加努力做好后方工作，支援前线。当场许多代表把自己头上的银簪、手上戴的银镯、围裙上的银链、耳环等等首饰捐献出来，支援前线。

第二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战争消耗很大，红军要不断的补充和扩大。青壮年男子，成分好的几乎都去当了红军，后方的生产任务就落在妇女肩上。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红军所需的粮食和服装都靠根据地内解决。因此，后方生产的任务更

重。据此，中央妇女部提出了“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象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的口号，来鼓励妇女积极参加生产。过去江西的妇女多数是做家务和参加些田间辅助劳动，犁田、耙田和播种这些活都是男人干的。现在妇女要承担主要劳动，必须学会犁田、耙田。于是，我们在各乡组织了生产教育委员会，请犁耙田能手直接教妇女们学会生产技能。但是，江西妇女有不少是小脚，小脚怎么下田呢？我们就动员青年妇女放脚。第一步，要她们解开裹脚布，穿上鞋袜，先在旱地干活，每天晚上用热水烫脚，让她们慢慢习惯在地里走路、干活；第二步，穿上草鞋下地；第三步，打赤脚下水田。江西的妇女真好，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她们硬是咬着牙下水田劳动。苏维埃政府为了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于1934年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福建、湘赣、粤赣省的妇女代表都来参加，部分代表中的犁耙田能手还到瑞金武阳区进行了劳动现场示范表演。毛主席亲自参加了现场会，那时毛主席被剥夺对红军的领导职务，只担任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他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看看妇女学犁田、耙田到底行不行，有什么困难，如果妇女能把犁田、耙田的担子挑起来，那么后方生产的任务也就有办法完成了。毛主席那天穿了一身便衣，脖子上搭一条毛巾，裤腿卷得高高的，站在田埂上。他看到那些妇女犁耙田能手，扶着犁把在水田里操作得很好，学习犁田的妇女劲头也很高，他高兴极了，对大家说：“封建社会有种迷信说法，说妇女犁田会遭雷公打，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也可以做到，今天你们不是做到了吗？……”毛主席讲完话，又亲自给学犁田、耙田的妇女劳动模范发了奖状和奖品。奖品是一条围裙和一顶竹笠，围裙上绣了“学犁耙能手”的字样，竹笠上印有“劳动模范妇女”几个大字。由于我当时也和妇女们一起学犁耙田，并做了示范表演，因此也得到了奖状和奖品。

为了解决根据地军民穿衣的问题，我们还发动妇女种棉花、种苧麻，纺纱、织布。江西妇女素有纺纱、织布和渍麻的手艺，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纱、织布，农忙下田，农闲纺纱、织布。妇女们为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项工作是支前。妇女们支前首先是为红军做鞋。那时根据地没有鞋厂，红军和地方干部穿的鞋全靠妇女群众做，做鞋是经常性的重要任务。江西妇女光在1934年的头两个月内就做了16万双鞋，长征前夕我们又动员妇女为红军做了20万双鞋和10万条米袋。为了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能有两双鞋，苏区的妇女从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到六七十岁的老大娘都动员起来了，她们不分昼夜地赶做，那一针针、一线线倾注着她们对红军的一片深情。除做鞋外，妇女们还组织了担架队、洗衣队、送粮队，为红军送军粮、抬担架、洗衣服。根据地内设有被服厂，红军的衣服由工厂做，但工厂做不过来，又要动员妇女群众帮助钉扣子、锁扣眼。

由于长期反“围剿”战争的消耗，红军所需的物质不断增加，而根据地内的财力物力却更加困难，为了保障红军的供给，苏区政府一方面动员工人、农民增加生产，另一方面动员苏区人民节省每一个铜板、每一斤粮食支援红军。苏区妇女也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政府的号召，她们无私地把自己陪嫁的银手镯、银耳环、戒指都捐献出来，支援革命战争。光是纪念“三八”妇女节那一次，妇女们就认购了10万元公债。

中央根据地的妇女工作，除了农村妇女工作外，还有女工的工作。当时在瑞金、兴国、长汀、上杭等县，我们都办了一些工厂，如纺织厂、被服厂、印刷厂、兵工厂等等，工厂有不少女工，女工的工作由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管。女工部长是刘群仙，她是无锡人，纺织女工出身，曾在无锡、上海等地参加工人运动，以后党送她到莫斯科学习，学习期间与博古结婚，回国后仍从事工人运动，后随博古一起进入中央苏区，负责全总女工部的工

作。刘群仙同志原则性很强，作风正派，心地正直，见到不公平的事，敢于正面提出。后来，她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又到苏联去学习，以后就下落不明了。当时根据地的女工工作中心是动员女工积极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主要工作有：发动女工参加工会，争取与男工同工同酬，组织女工参加识字班、夜校学习文化，建立女工代表会等等。

为保障妇女的权益，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婚姻法，妇女部的工作还要宣传和贯彻婚姻法。当时，也有不少妇女起来争取婚姻自由，反对不合理的婚姻。对妇女要求离婚的，我们经过调查，认为是不合理的，就批准离婚，一般的就进行调解。为了使妇女能安心生产，在根据地还办了托儿所。当时兴国县和瑞金县托儿所办得最好，两县共办了200多个托儿所。

事隔50多年，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当年苏区妇女送子、送夫当红军的情景，刚刚放开小脚的妇女下水田学犁耙田的情景，妇女们日夜为红军做鞋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她们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她们都是无名的英雄。

第五章 长 征

一、出发前的准备

1934年秋，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虽然苏区军民全力以赴，英勇奋战，但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根据地造成的恶果，加之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反“围剿”战争连连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这时，要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中央领导人决定放弃根据地，转移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转移，这在当时是军事秘密，是不能泄露的，我们在中央局机关工作的干部也不知道。但也不是毫无思想准备，记得在出发前的两个月，约在8月中下旬的某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在西江的一个小庙里召开了一个干部会，中央局、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参加，那天到会的人很多，小庙里挤得满满的。在直属机关工作的女同志邓颖超、刘群仙、金维映和我都参加了。中央领导人博古、张闻天、罗迈也都与会。会议由林伯渠主持。他说：“敌人对我们采取步步为营的干水塘政策，水干了就捉鱼……所以现在我们要转移，到湘西去。大家要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把粮食和一些贵重东西藏好。组织赤卫队加强巡逻放哨，先不要对群众说我们要走”。林伯渠说着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博古接着讲了话，他说：“我们先突围出去，过两个月再反攻，我们还要回来的……”当时我对前线斗争的形势不太了解，还真以为很快就会回来的，就悄悄对坐在我旁边的刘群仙和

金维映说：“过两个月就回来了，怕什么”。刘群仙拉拉我的衣襟，偷偷说：“我们可能回不来了”。我是在这次会议上知道部队要转移的。

会后，我接受了两项任务：一项是博古跟我说的，要我负责动员妇女群众为红军赶做20万双草鞋和10万条米袋子，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能穿一双鞋、带一双鞋和一条米袋子装干粮。

根据博古的指示，我们把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几位妇女干部，邓六金、吴富莲、蔡纫湘、李桂英等人，调到妇女部帮助工作，连同妇女部原有的几位干部，分头下去和各级妇女干部一起，发动妇女群众做鞋。当时群众只知道红军打仗需要草鞋和米袋，不知道红军要转移，到9月底，这个任务顺利完成。

另一项任务是罗迈交给我的，他对我说：“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妇女工作，你们妇女部先提出个名单给我，然后通知她们到卫生队去检查身体，身体合格的，就可随部队走了，总数不要超过30人”。我根据罗迈的指示，提了一个女干部名单：邓六金、吴富莲、吴仲廉、钱希君、贺怡、李桂英、彭儒、阚思颖、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危秀英、谢飞、蔡纫湘、谢小梅、危拱之，还有一位是兴国人，想不起她的名姓，她是左中农的爱人。我把这个名单交给罗迈，由组织部通知她们到卫生部去检查身体，以上同志经体格检查都合格。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参加长征，是由中央和组织部决定的，不用检查身体，他们是：邓颖超、蔡畅、贺子珍、刘群仙、萧月华、金维映、廖似光、陈慧清、刘英和我。我和刘英当时都没有结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由总政决定，她们是：康克清、李建华、邱一涵、周月华、杨厚珍、李伯钊。曾玉当时身体不好，但她坚持要随部队去，组织上也就同意她走。经组织批准随部队转移的是34人，后来因贺怡的丈夫毛泽覃、彭儒的丈夫陈正人被留下

了，他们两人也就留下了，在南方参加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所以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同志总共是32人，除现在各种党史资料中提到的30位外，还有两位，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兴国人，她随部队到了湘南后，因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伤员很多，组织上派她护送伤员到江西游击区了，以后没有音讯，可能牺牲了。另一位是蔡纫湘，她原是彭杨红军学校的组织科长，长征前又在中央妇女部帮助工作，长征时先后和我一起到民运工作队，到遵义后又和我一起到干部休养连，红军到了毛儿盖后她和吴富莲、王泉媛一起被编到左路军。以后西路军在甘肃被围困，吴富莲牺牲了，蔡纫湘逃了出来，回到了上海。当她得知中央到达延安后，又千方百计到延安找组织，不幸在敌机轰炸延安时牺牲，她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们应当纪念她。

还有些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因工作需要或身体关系，没有参加长征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有的已为革命光荣牺牲了。如范乐春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在中央政府任优待红军局的局长，是闽西根据地有名的女干部，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撤离前夕，她正生了孩子，还在月子里，在决定去留时，组织上一方面考虑到闽西根据地的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她带着孩子的实际困难，决定把她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她是林伯渠的夫人，他们夫妻俩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为了人民的解放，她只好留下了。临别时，林老对范乐春安慰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我们都不要难过了”。说完，林老抱着初生的儿子，深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不是爸爸不带你走，这是艰苦的斗争啊！是白匪的罪恶啊！不然，爸爸怎么能离开你们呢？”范乐春同志是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她带着孩子，在极端艰难激烈的斗争环境里，和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一起，领导了闽西根据地的斗争。她先后担任永定县委书记，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妇

女部长，闽西南潮梅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1941年5月，因劳累过度，长期抱病工作，不幸病逝。

唐义贞同志是卫生材料厂的厂长，是陆定一的夫人。长征时她正怀孕在身，组织上决定她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6月，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始终不说出组织的下落，不交出党的机密文件，残暴的敌人竟用刺刀刺入她的胸膛，剖开她的腹部，挖出她的心脏。唐义贞殉难时年仅25岁。

还有周月林、黄长娇、陈璧英等同志都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二、踏上长征路

1. 告别众乡亲

长征出发前，中央机关按战斗序列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是总指挥部，代号“红星纵队”，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军委领导同志都在这个纵队；二纵队是中央局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机关等，代号“红章纵队”，领导人是罗迈和邓发。编在一纵队的女同志有康克清，她是纵队司令部的指导员，李建华是做机要工作的。蔡畅、刘群仙、刘英、金维映在二纵队司令部工作。邓大姐当时有病，她和贺子珍及多数女同志都编在干部休养连。我在二纵队司令部任民运科长兼民运工作队的队长。

民运工作队约有100来人，工作队的成员，有的是在上海、广州、香港等白区工作的，有的是交通站的，有的是其他根据地来到中央苏区的、也有的是受王明路线的排斥打击，没有安排职务的领导干部。记得有陆定一、刘晓、谢唯俊、罗梓铭、邵式平、洪水（他是越南人），还有贾拓夫，他是从陕北来中央根据地汇报工作，正赶上长征，就编在工作队。女同志除我以外还有

阚思颖、蔡纫湘。工作队的任务是沿途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找粮食，找向导，找挑夫。

二纵队的队伍很庞大，带的东西也很多，各部的文件、资料、银行的银元、钞票、印钞票的机器、后勤部造军火的机器、X光机等等都带走，真是象大搬家一样。这些笨重的东西都是用人来挑或几个人来抬，运输人员有些是请来的老乡，有些是劳役队的，体力差，又没积极性，走得很慢，有的走到半路就不行了。

离开瑞金的那天，乡亲们看到红军一队队的走开，有的站在门前，有的站在路旁，流着眼泪望着我们走。我见着一位大娘把几个煮熟的鸡蛋放进一位战士的挎包里，又有一位大嫂拉着她的亲人，把一双新做的草鞋塞进他的背包里，啜泣着说：“你快点回来噢！”我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我从1930年1月到闽西，在中央苏区生活、战斗了5年之久，我是随着根据地的斗争发展而锻炼成长起来的，如今要离开这块用无数同志的鲜血换来的土地和曾经哺育过我的人民，我怎能不伤心？！我怎能不落泪呢？尤其是想到我们这一走，苏区就要遭到反动派的蹂躏，根据地的人民就要遭殃，我内心又感到无比的负疚，我只能用饱含着泪水的眼睛望着他们，向他们致敬，暗自地说：“乡亲们，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了，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就这样告别了乡亲们，开始了这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2. 途中的群众工作

红军出发时，每人只带15斤粮食，沿途所需的口粮和一切生活必需品，主要靠打土豪来解决。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除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外，还在各地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并到处张贴布告，扬言若有给红军带路、挑夫或卖东西给红军者，要杀全家，以离间红军和群众的

关系，企图困死红军。有些地方的群众不了解红军，听信了谣言，又怕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听见红军来了，就把东西藏起来，青壮年男子和妇女都躲到山里去，村里只留下些走不动的老人。有时向老人打听一下，哪一家是地主、土豪？他们都不敢说，总是支支吾吾有意避开。因此，要粉碎敌人散布的谣言、揭穿敌人的诬蔑，战胜敌人给我们设置的困难，就成为红军特别是我们民运部门一个重要的经常的任务。我们每进到一个村子，都严格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绝不允许乱拿群众的东西，借群众的东西一定要归还，损坏的要赔偿，实在赔不起的，要向群众讲清楚并写张欠条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赔。我们民运部门更是经常帮助群众挑水、打柴、舂米，以实际行动来粉碎敌人对红军的造谣诬蔑。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子，由于群众听信敌人的谣言，青壮年和妇女都躲到山里去了，只剩下些老人留在村里。我见一位大娘去挑水，就走过去对她说：“大娘，我帮你挑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抢过大娘的扁担，帮她挑了满满一缸水，大娘很高兴，问我：“你们真是红军？”她见我们跟敌人谣言中的红军不大一样，因此有些疑惑不解。我说：“我们是真正的红军，我还是个女红军哩！”她用目光上下打量我一番，见我穿过耳朵，有戴过耳环的痕迹，相信我讲的话是真的。就问我女人家为啥子出来吃粮（指当兵），我跟她讲起我的身世，我为什么要当红军，世上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讲起共产党和红军就是要推翻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使人民翻身做主人。我告诉她红军要在村里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穷人。老人听得入了神，握着我的手说“红军真好！你们是要能长住这里就好了！”接着老人也将村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说罢她又跑进山去将那些躲避的青年和妇女都叫了回来。对于村里的大户，我们经过调查了解，确实是土豪劣绅的，就没收他的浮财。

我们是一边行军，一边打土豪、筹粮款，要求速战速决，没有时间充分发动群众，也没有时间作充分的调查，但也不能乱打，还要求准确，怎么办？我们每到一个新区，我就带上几位同志，先到山岗高处，四周察看一番，看哪个村子有高房大院，豪户都住高房大院；再听狗叫的声音，听何处的狗叫得最凶，因为一般地主豪绅家的狗气大声粗，叫得最凶。然后再进村。先查看三栏（猪栏、牛栏、马栏），财主家牲口多；二看锅灶，有钱人家筑灶台，锅大油多；三看农具，地主家农具齐全。进屋后再看室内摆设，查检主人的来往信件等等。经过这样由远及近的调查后，作出判断，然后就在地主土豪家的大门上贴字条，最后再向群众核实。群众见我们已摸清了底，也就敢讲实情了。经核实后，揭去字条，没收浮财，并开列清单，放在地主家里，说明是红军没收，与群众无关，以免我们走后，地主土豪加害于群众。我们这套办法还真灵，往往一打一准。

我们将没收来的粮食、盐巴、现金和金银首饰等物，全部交由后勤部。后勤部是由宋裕和、杨立三等同志负责，由他们统一掌握分配。其中一部分粮食、盐巴，以及衣物、农具、家具等东西，当场分给贫苦群众。群众见我们只打地主、土豪，还把东西分给穷苦人，又见我们帮助村里的老人挑水、劈柴，觉得红军很好，和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就不再躲避我们。我们就进一步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宗旨。有的贫苦青年要求参加红军，还有的自动报名给我们带路和挑东西。我们又宣布：凡给红军带路和挑东西的，每人每天给一块大洋，老乡们听了更高兴，积极性更高。

我们工作队就这样一边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打土豪、筹粮款，解决部队沿途的给养，找到向导和挑夫，还动员了不少青壮年参加红军，使部队得到补充。对此，一些同志就跟我开玩笑，叫我为“打土豪专家”。

3.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2月，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省境的黎平。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黔西北进军。并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月底，我们抵达乌江东岸，乌江江面不算很宽，但水流很急，敌人沿江有重兵驻守，红军必须突破乌江，方能进军遵义。我们在乌江边的石头岩上迎来了1935年的元旦，过元旦那天我们从山上采来些松柏树枝和野花，扎起彩牌，老乡们给我们送来了糍粑（糯米做的糕点），军民还在一起唱歌、跳舞，开展联欢活动，愉快地过了一个新年。元旦后开始渡江，主力部队接连两次强渡都没有成功，第三次强渡成功后先头部队很快用竹子搭起了一座简易浮桥，让大部队通过，马匹则浮水过河。由于乌江河水流很急，有些马不敢浮水，就往桥上挤，为防止马踏垮浮桥，不得不忍痛开枪打死了一些马。我的那匹小红马，本来是很温顺的，见到滔滔江水，和其它马的嘶叫，也惊了，拼命嘶叫起来，不肯下水，也被打死了。饲养员见可怜的小红马倒在血泊中，伤心痛哭，我一面安慰小饲养员，自己也忍不住哭了。

在过乌江前，罗迈要我和邵式平、罗梓铭、谢唯俊、贾拓夫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到遵义发动群众、物色地方干部，筹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大家推选我当组长。1月7日，主力部队攻下遵义，工作组随着进了城，当天下午在天主教堂召开群众大会，有很多人来参加。在会上我们宣布党的城市政策和土地革命的政策，宣布红军要在遵义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些政策和决定得到了到会群众的拥护。会后，工作组即分头去发动群众。遵义城内原有一个进步学生组织叫“红军之友协会”，他们见到红军象见到久别的亲人，对我们很热情，他们都来参加了群众大会。有个女学生叫李小侠，是“红军之友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她主动向我介绍城里各阶级的情况，她和几个女学生还带我到大街转了一圈，并

逐家逐户地向我们作了介绍。我也向她们介绍红军长征和根据地的情况，并讲解党和红军的政策，我们之间很快就建立了革命的友谊。这些进步学生还帮助我们开展宣传工作，向群众解释红军的政策，要商店老板照常开门营业，他们还在大街小巷贴了许多欢迎红军的标语。

1月9日，“红军之友协会”动员了许多学生及遵义各界代表，还有些群众，齐集南门关丰乐桥头两侧，热烈欢迎中央纵队和中央领导同志入城。红军进到遵义后，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商人也很满意，各行各业相继开门营业。那时贵州吃盐很困难，盐贵如银。我们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盐行，除将部分盐分给贫苦群众外，其余则平价出售，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牵羊、杀猪来慰问红军，还有许多青年前来参军。

为了筹建县革命委员会，1月9日，我们工作组在老城区天主堂召开了一个群众代表大会，工人、店员、学生、贫民及各界代表共1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成立革命委员会及建立各群众团体的具体事项，并酝酿革委会委员名单。记得代表们对选举革委会成员时，是用举手表决还是投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人主张用选票，认为这样比较隆重些，多数人认为时间紧，群众中很多人没有文化不会识字，用选票又不习惯，比较麻烦，还是举手表决好，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用举手表决的办法。工作组要派一个人参加革委会，开始大家推举邵式平，邵式平不愿意，后大家又推荐罗梓铭参加革委会，他本人同意了。罗梓铭是湖南人，裁缝出身，大革命时参加工人运动，以后在中央苏区从事工人运动，任全国总工会手工业工会的副委员长，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长征时在民运工作队做群众工作。进遵义后，他便在遵义工人和店员中开展工作，组织赤色工会。他还推荐了几位工人代表参加革委会，我推荐了“红军之友协会”的李小侠。此外，红军总政治部还派了毛泽民等人参加革

命委员会。会后，我们便分头去做准备工作，很快便成立了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儿童团等等群众团体。

经工作组和赤色工会、“红军之友协会”等群众团体的发动，于1月12日在遵义老城第三中学的操场，召开了群众大会，这天到会的人很多，号称“万人大会”。当天早晨，天还没亮，赤色工会的会员，就在操场的南面，搭起了一座讲台，安放了桌椅板凳。“红军之友协会”的积极分子，连夜到城内城外，大街小巷去通知各家各户参加大会。早饭后，很多群众陆续来到会场，红军女战士王泉媛、李桂英、阚思颖等人在操场教群众唱歌，宣传革命道理，接着乡下的农民也赶来了。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手拿彩旗，高呼口号、热闹非凡。中午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博古、李富春等同志来到会场。大会正式开幕，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各界代表也讲了话。群众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罗梓铭任主席，周司和、李小侠、毛泽民等人为委员。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的县级红色政权。

革委会成立后，我立即到城郊去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的工作。我们自江西出来后，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只没收地主的浮财，解决部队的给养，没有分配土地。到遵义后，开始准备在遵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故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罗迈要我和罗梓铭各带一个工作组立即到城郊去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由于时间很紧，有的同志提出是否先搞减租减息，以后再分土地；有的同志认为应该立即分配土地，因当时庄稼早已收完，地租也交了，再减租没什么意义，群众得不到实惠，难以发动起来。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先粗略地分一下田地，第二步再烧田契和发新的土地证。这样，我带一个工作组到城郊的西南区，罗梓铭带一个组到西北区。我们下去后，立即把地主的田地分成块，

在田塍上插上竹签，钉上木牌，上面写明此块田地多少亩，分给某人耕种。我们下去只有七、八天时间，搞得快的村庄已经把田分完了，搞得慢一点的刚插上竹签，还未来得及分，就接到通知，要我们马上回城。回到遵义才知道红军要撤离。

4. 在土城安置伤员

1月20日左右，根据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我军先后从桐梓、遵义撤出，向黔北川南方向进军，准备在四川泸州上游各渡河点北渡长江，到四川西北部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我主力部队在土城一带与敌人发生激战，我军虽攻克土城，但伤亡较大，部队要迅速转移，伤员不能带走，组织上要我负责在土城一带就地安置伤员。

红军要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是一面打仗，一面行军，要求部队的行动要迅速，能机动灵活，否则就要被动挨打，甚至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伤员不能都带走，又没有根据地来安置伤员，只得将重伤员安置在沿途老百姓的家中，只有极少数重要的伤员，经组织批准才能送到干部休养连带走。寄放在老百姓家中的伤员，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同志，自己孤零零一人，就象失群的孤雁，那滋味真是难以忍受的，被寄放的地方，又都是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伤病得不到很好的医治，加之部队开走后，反动派来了还要遭到屠杀，所以被寄放的命运也是九死一生，很少有活下来的。但是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争取最后胜利，又不得不这样做。所以，那时同志们都普遍存在一种思想，就是不怕打仗战死，就怕负伤被寄放，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生病掉队。一旦负了伤、生了病，只要两条腿还能走，拼着命也要跟着部队走，有的终于挺过来了，也有的在途中倒下了。负了重伤，走不动了，也只有服从大局，接受被寄放的安排了。

贵州的老百姓，长期受到军阀、土豪的压迫、剥削，生活异常的

贫苦。我们进入贵州时，已是十冬腊月，看见许多老百姓没有棉衣，穿的破破烂烂，脚上还是一双草鞋，晚上没有棉被，盖的是秧被（用插田后剩下的稻秧，晒乾编成的草垫），吃的是杂粮，许多人家过完春节就没粮了，尤其是缺盐，贵州的盐特贵，老百姓要用很多粮食才能换到一点点盐巴。红军到贵州后，老百姓亲眼见到红军打垮了长期欺压他们的军阀，没收了土地、土豪的财产，使地主、土豪的威风扫地，给他们出了口气，红军还将没收来的粮食、盐巴、被服等等东西分给贫苦群众，他们感到红军和军阀部队不同，是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队，他们感谢红军，也很同情红军。在土城收容安置伤员时，就得到了贵州群众极大的支持，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帮我们抬伤员，妇女们帮我们照顾救护伤员，她们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食品——糍粑送给我们的伤员吃。他们还冒着全家的性命危险收留我们的伤员，谁家收留了红军的伤员，反动派来了查出来，要以窝藏“赤匪”论处，弄不好要遭到家破人亡的。开始有些群众愿意给我们帮忙，但不敢收留伤员，经过我们说服动员，尤其是贵州做地下党的工作的同志帮助，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和群众又有密切的联系，为伤员和群众的安全，找到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和人家，把一批批伤员安置妥当。我们也给收留伤员的人家留下些银元、粮食、盐巴等东西，作为伤员的生活、医疗费用和报酬。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点东西只能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贵州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决不是用物质所能报答得了的。

在安置伤员的工作中，我内心时时处在矛盾和痛楚之中，在没有找到妥善人家寄放伤员时，我心急如焚，一旦找到了妥善的地方和人家，伤员有了人家来照顾，我如释重荷，心安了许多；但当把伤员安置妥当，我要离开时，一阵悲痛又涌上心头。有的伤员紧紧拉着我的手抽泣不止，有的同志被伤痛折磨得痛苦的呻吟；有的苦苦的哀求我给他补上一枪，这有如一把把尖刀，刺着

我的心，我真想把他们都带走，可是感情终究不能改变这严酷的现实，只有暂时忍受这种苦难，努力奋斗，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使全国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和我们的伤员得到解放。

土城一带的伤员安置停当，我们立即撤离该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这时，又送来一位伤员，要我们找地方寄放。这位伤员是三军团的一位团长，叫姚喆，在阻击敌人时，右脚负伤，伤口已感染，脚肿得很大，正在发烧。大部队已急速向前开进，我们掉在后面，地下工作的同志，也已撤离。姚喆的伤不是要害部位，还可以医治，革命战争多么需要这样的指挥员啊！他随身还有位警卫员，一位饲养员和一匹马，我想不如把他带走。当时领导同志已经往前走了，于是我就和休养连连长侯政商量，侯政懂医术，他看了姚喆的伤说：他的伤不要紧，可以把他带走，我们两人一致同意，就把他带走了。当时找不到担架，我就和他的警卫员，饲养员3个人轮流抬着他走了几十里路。他的烧退了，见我们抬着他走，说什么也不肯让我抬。我们就把他扶上马，让他骑着马，警卫员和饲养员在旁边照顾他慢慢走，没几天他脚上的肿也消了。我们见他的伤好得这样快，真为他高兴。没想到这事被领导同志发现了，批评了我们一顿，说组织上已决定寄放了的，为什么不执行组织的决定。当时的组织纪律是很严格的，从纪律的角度要求，我们是不对的。我只好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救了一位同志，就是受了批评，我内心还是高兴的。姚喆在休养连待了几天，伤口还未痊愈，就赶紧回原部队去了。长征后期，他还担任中央纵队的警卫营长，全国解放后，他任武汉军区副司令。

5. 遵义会议的传达

2月初，部队在扎西集结休整。中央纵队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的精神。由洛甫（张闻天）作报

告，他报告的内容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主要讲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党中央领导人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以致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在突围撤离中央苏区时，不是有计划的坚决的战斗，而是惊慌失措的搬家式的逃跑，这样大的战略转移行动，也没有向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解释。后方机关庞大，用主力部队来掩护机关，使主力部队行动困难，贻误战机，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的打击，使红军又遭受很大的损失。他还指出：担负军事指挥的主要领导人华夫（即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领导方式极端恶劣，个人包办一切，压制下面的正确意见，把中国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说成是“游击主义”而完全抛弃，肯定了毛泽东的红军作战原则。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不但对华夫的错误没有及时纠正，而且拥护和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他在这方面应负主要责任。

最后，洛甫说：我们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我们的红军仍然存在，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全国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的。他说：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战胜川、滇、黔的军阀部队和蒋介石的军队，在云贵川广大地区，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他号召大家，要象一个人一样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这天天气很冷，还下着雪，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报告，洛甫讲完后，同志们热烈鼓掌，个个都很兴奋。同志们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被动挨打地位，早就有意见，特别是对李德那种太上皇作风和瞎指挥不满。现在中央撤销了他的军事指挥权，让毛主席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和军事指挥，大家都 very 拥护，很高兴，也增加了争取胜利的信心。

洛甫还特意召集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开了个会，他说：“现在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变，在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

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也不要破坏，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以前，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沿途打土豪时拿不走的東西，一时也来不及分给群众的就打破它。他还说：“对工商业也要改变过去‘左’的做法，一般的商店不要没收，使城市和墟镇的商人继续营业”。此后在地方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得到了纠正。

在扎西休息了几天，部队再次进行了整编，把一些笨重的印刷机，磅秤等东西丢掉了。当时中央决定留下一些同志在川、滇、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阚思颖和李桂英两人也留下了，我被调到干部休养连去工作。分别时，我们3人在一起哭作一团，心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以后川、滇、黔边界的斗争遭到失败，她们两人都被捕，关进了国民党的监狱，直到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组织经过交涉，才被营救救出狱。

三、长征中的干部休养连

1. 特殊的连队

还在遵义时，有一天总卫生部长贺诚见到我时，对我说：“喂！打土豪专家，到我们干部休养连来吧！休养连的任务重，干部缺，要自己找粮食、找挑夫困难很多，你会做群众工作，肯不肯来帮我一把？”

我说：“你别拿我开玩笑。”

他说：“真的，你若肯来，我就去向总政李富春主任要人。”

我想干部休养连的工作是难做的，但自己身体好，多吃点苦，担点险有什么关系，休养连女同志多，我去工作也方便些。况且，贺诚同志这样对我说了，我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哩！我就

很干脆地回答他：“我服从分配，组织上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这样，到扎西整编时，组织上便通知我到干部休养连任指导员。我高高兴兴到了休养连，找到连长侯政，满以为他会热情欢迎我。谁知他一见到我，脸拉得很长，满脸不高兴，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噢！你来了。”

弄得我莫名其妙，心想我也没得罪你，这个指导员别人还不愿干哩！我高高兴兴地来了，你倒给我泼一盆冷水，他见我吭声，又冒出一句：“连里女同志够多的了！”

啊！原来是看不起女同志，想不到你侯政这位红军领导干部竟满脑袋封建思想，你看不起女同志，那就等着瞧吧！我耐着性子对他说：“既然我已经来了，就请你把连队的情况向我介绍一下吧！”他无可奈何的样子，把连队的情况向我作了介绍。

干部休养连属卫生部领导，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全连约有300余人，分5个休养班，即：老同志班，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等在这个班；伤员班，收容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师、团级以上的干部，钟赤兵、张宗逊、文年生、姚喆等先后在这个班待过；女同志班，这是有病和怀孕的女领导干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先后在这个班的有邓颖超、贺子珍、萧月华、廖似光、陈慧清、杨厚珍、周越华、曾玉等；机要人员班，收容负伤和生病的机要人员及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同志；还有一个流动班，成员不固定，在长征途中生了病的领导干部就送到这个班，病好了就回原单位。休养连的工作人员分别编在医务室、警卫排、饲养排、担架排、运输排。担架员和运输员都是请的民夫。还有邓六金、吴富莲、王泉媛、钱希君、钟月林、刘彩香、邱一涵、危秀英、谢琼香（谢飞）、谢小梅、蔡纫湘等11位女干部，叫“政治战士”。她们什么工作都做，既做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鼓动工作，又帮助抬担架、挑药箱、护理伤员等等。全连共有21

位女同志，除以上19位外，还有吴仲廉和我。

连部设连长、指导员、秘书、文书各1人。连长侯政，原是八军团的卫生部长，黎平整编后调到休养连，接何长工任连长。前任指导员叫黄应龙，是个军政委，湘西整编后，回主力部队去了，我接他的工作。秘书是吴仲廉，文书是谢有发。全连建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总支书记是董必武，委员是侯政、邓颖超、李见珍、吴仲廉。下面还设有几个支部，我兼连部工作人员这个支部的书记。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由老、弱、病、伤和女同志组成的队伍，送到休养连来的伤病员，都是为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个连非常关心和照顾，但同时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要求我们必须将休养员一个不丢的护送到目的地。这个任务异乎寻常艰巨，也难怪侯政，不是他看不起女同志，休养连的担子确实不轻。后来，我们熟悉了，他才道出了真情。他说：“前任指导员调走时，组织上答应过我，要调位强有力的指导员来的，结果调来位女同志，我一看就凉了半截。我知道你是中央局的妇女部长，可这不是在根据地，现在是行军，前有千难万险，后有敌人追击，要保证这些休养员一个不丢，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难啊！女同志毕竟和男同志不一样，你能保证自己不掉队就很不简单了，组织上还要你来挑这副重担？我耽心会增加我的负担。开始对你不了解，你不要见怪，现在才知道我的耽心是多余的。”

休养连的同志团结得很好，大家同心同德。工作人员竭尽全力护送伤病员，伤、病员也很体谅工作人员，尽量减少连里的负担，尽力帮助连里的工作。特别是董老、徐老、谢老，不顾自己年老体弱，邓大姐不顾重病在身，日日夜夜为全连的工作操心，遇有重大事情，他们就千方百计出主意想办法帮助解决。董老是总支书记，邓大姐是总支委员，我们碰到困难就去找他们。他们也总是热心的为我们排忧解难，连里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就向

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反映。还有贺子珍等同志也帮我们向中央领导反映，使我们的困难能够得到及时解决。我们这支特殊的部队就这样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董老、邓大姐、徐老、谢老的具体帮助下，全连同志同心同德，以惊人的革命意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没有丢下一个休养员，全体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2. 钟赤兵锯腿

我刚到休养连不几天，就送来一位重伤员，他是三军团十二团的政委钟赤兵，在攻占娄山关的战斗中，左腿被子弹打穿。他重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由于流血过多，昏迷过去，被抬下火线。送到休养连时，已感染了破伤风，发着高烧，伤势危重。医生说必须立即锯掉伤腿，否则有生命危险。钟赤兵原是师政委，扎西整编时，三军团的师缩编为团，他变为团政委，在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立了战功。因此，休养连党总支决定，要千方百计抢救他的生命，立即给他做手术，并要我将他的伤情和总支的决定告诉他本人。我去到钟赤兵床前，把医生的意见和总支的决定告诉他。他一听说要锯掉伤腿，就火冒三丈，一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冲着我说：“指导员！你若锯掉我的腿，我就枪毙了你！”他思想不通，怕锯掉腿寄放到老乡家里，不能跟着部队继续前进。

是啊！一个身经百战的指挥员，锯掉一条腿如何行军、战斗啊！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不锯不行，有生命危险。我只得耐心向他解释，他火气消了些，说：“锯掉一条腿，我这个人还有什么用，不如给我补上一枪，倒少受点痛苦！”他还是不愿意锯腿。我把情况向董老和邓大姐汇报，他们即刻向周恩来副主席反映，周副主席指示：“腿要锯，手术后保证用担架把他抬到目的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把他寄放到老乡家里，他的警卫

人员保留，沿途照顾他。”董老和邓大姐都去劝他，并传达周副主席的指示，他终于同意把伤腿锯掉。

做手术时，没有麻药，大家只好用绑腿布将他的两手，上身及另一条腿绑在两张四方台上，以免他乱动，给他吃了一点鸦片作为麻药，医生就这样硬着心肠给他锯。黄豆般大的汗珠从他的头上和全身冒出来，他喊了几声就昏了过去，站在旁边的同志目不忍睹，止不住流下了眼泪。钟赤兵以顽强的意志终于挺过来了。以后就用担架抬着他走，一路上他吃了不少苦。

3月中，我们撤出遵义，向西行进，来到一个叫花苗田的地区，这里全是山路，极不好走，翻过一座山，又走进一个谷，路很窄，天又下着毛毛细雨，队伍拉得很长，主力部队早已走到前面去了，后卫部队远在后面。这时突然有股敌人从中间插来，向我们袭击。我们这个连队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立即将警卫人员集中起来，要董老带着队伍赶紧往前走，连长和我带着警卫员在后面阻击敌人。连长要我撤走，我叫他撤走。忽然听见有人喊我：

“李见珍！把枪给我！”

我回头一看，见钟赤兵一个人坐在担架上，还没有走，急得我不知他出了什么事，就问他：“你怎么了？怎么还没走？”

“我要和敌人拚了！”

“你的担架员呢？”

原来担架员听见枪声紧，把他扔下躲起来了，他怕拖累别的同志，准备和敌人拚了。但我们怎能让这位娄山关战斗的英雄再受到损伤呢？我叫来一位饲养员，两人抬起他赶快跑，追上了部队。连长和警卫员们在后面和敌人打了一阵子，幸好担任后卫的五军团很快赶到，把敌人打退，我们连才脱离险境，部队也没有受到损失。

3. 茅台酒香

3月16日，红军主力攻占茅台镇，在这里渡过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干部休养连也随之来到茅台。

茅台是赤水河畔的一个重镇，就是著名的茅台酒的产地。镇里有几家酒厂和作坊，里面摆着成排成排的大陶缸，有的密封着埋在地里，有的敞开放在地上。一走进镇里，就闻着阵阵扑鼻的酒香。那时，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从来没喝过茅台酒，就连这个酒名也未听说过，更不知这种酒的名贵。因此，闹出一些笑话。

干部休养连驻扎在一个酒厂里，老板和工人都走了，大家放下背包，拿起脸盆去找水洗脚，见到那些喇叭形的大缸里，装着清清的酒还以为是酿酒用的水，有的同志捷足先登，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脸盆就舀出半盆酒当水来洗脚，还边洗边喊：“这个水好清凉，洗脚真舒服！”这一喊，许多同志走过来，围到缸边闻一闻，才知道大缸里装的全是酒。长途行军疲劳，见到这么多酒，同志们拿来擦腿、擦手臂，擦伤肿。茅台酒一擦，真是舒筋活络，周身轻松舒服。好喝酒的同志，拿茶杯舀来喝，边喝边啧啧赞叹：“好酒！好酒！”有的同志干脆拿来水壶往里装。大家擦的擦，喝的喝，说的说，笑笑的笑，好不热闹。正在乐的欢，周副主席带着警卫员来到我们驻地，见有的同志用酒正在洗脚，就生气了，他大声说：“同志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不知道”，有的同志回答。

“这是名贵的茅台酒，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过奖的名酒，你们这些同志竟拿来当水洗脚！”

周副主席这么一说，大家傻了眼，尤其是那几位正在洗脚的同志，伸出舌头，瞪着眼，你看看他，他看看你，不敢吱声了。周副主席见大家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就耐心温和地给我们讲解

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要大家不要随便乱动作坊里的酒，要喝、要擦，要用钱买。他还给我们讲了茅台酒在国际博览会上得奖的故事，使我们增长了知识。我也是从这次才知道了茅台名酒。接着，总政治部就发出通知，不许进入茅台酒厂和作坊，不许随便乱动茅台酒。

4. 报务员不能丢

在茅台附近，红军向西三渡赤水，向川南前进，敌人以为红军仍要北渡长江，忙令各路军阀部队向川南开进，企图在川南围歼红军。没想到毛主席指挥红军突然向东，四渡赤水河，调头向南，在敌军间隙中穿插急进，于3月底南渡乌江，直逼贵阳。那时，蒋介石亲自坐镇贵阳，他没摸清我军的意图，以为红军要攻贵阳，吓得贵阳守军四门紧闭，不敢轻举妄动。我军则趁机从贵阳和龙里之间的一个狭窄地段，急急通过，向云南方向前进。

这段行军很是紧张，除在地上和敌人周旋外，天上敌机还不时来轰炸。一天中午，在急行军半天后，在途中稍事休息，吃点干粮。总部的报务员架起天线，正在发报。突然，几架敌机飞来，狂轰乱炸了一阵，我们休养连在一个山坡树林下较隐蔽处休息，没有受到损失，敌机飞走后，我们立即集合队伍出发，侯政带着队伍往前赶路。我在后面清点完人员、马匹、药箱等物后才走，紧跟在队伍最后。走了一段路，过了一条小河，见梯队司令员罗迈站在路边，检查中央梯队的人员，突然发现少了几位报务员，就问旁边的同志：“报务员怎么还没来？”

“有几个报务员被炸伤了，”旁边的同志回答。他一听报务员负伤就急了，见我正从他跟前过去，就冲着我命令道：“李见珍！你带个警卫班回去，立即将负伤的报务员都背回来！少了一个由你负责！”

我二话没说，带着警卫班就回跑，过了那条河，把报务员

全背了回来。罗迈见报务员都背回来了，才放了心。他见我浑身汗涔涔，气喘吁吁，这才意识到报务员没有来不是我的过错，适才不该对我发火，赶紧叫他的警卫员把伤员从我背上接过去，说：“看把你累成这样，报务员事关党的机密，是一个也不能丢的，背回来就好了，把他们送到你们连去吧！”战争时期，对上级的命令是要绝对服从的，不能计较态度，更不能讨价还价，否则会贻误大事。

通过贵阳和龙里之间那个狭窄隘道时，更是紧张，在贵阳和龙里都驻有敌人的大部队，我们要趁敌人没觉察之前，迅速通过，否则敌人从两边夹击就危险了。那天天不亮，我们就出发，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站在一个山岗上，亲自督阵，不断催促我们：快走！快走！你们无论如何要在中午12点以前，翻过前面那座“山，不然就麻烦了！”领导耽心我们不能按时过去，大家都很着急，这段羊肠小道很难走，董老、徐老、谢老带着轻伤员拄着拐杖，拼命往前赶，担架抬着重伤员，拼命催也走不快，上坡时，邓六金、王泉媛、危秀英、刘月林、谢小梅等女同志在后面帮着推。正在这个骨节眼上，有几个挑药箱的民伕，因又累又饿，走不动，把担子放下，坐在地上不动了。真是急死人哟！我就去跟他们说好话，请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一下，走过这个山头再说，有几个民伕确实走不动了。药箱是绝对不能丢的，我只好自己挑起一担，吴富莲也忙挑起一担，那些民伕见我们两个女红军挑起药箱走，也挑起药箱跟着一起走。我们咬着牙硬是在上级规定的时间，翻过了那座山。到了宿营地，全身象散了架一样。第二天一早，又继续行军，在贵州西南部连续走了四、五天，还算顺利到达了紫云。

5. 贺子珍负伤

4月中旬，我们来到黔西南紫云县境一个叫猪场的地方，天

已黄昏，正准备宿营，马匹上的伪装已经卸下，我和几个女同志就去找房子，给休养员休息住宿，刚走出不远，就突然发现了几架敌机飞来，这地方周围是山，远处看不见飞机，也听不见声音，待听到飞机声音时，敌机已飞到宿营地上空，防空已是措手不及了。我赶紧叫：“同志们！快卧倒！”我们的药箱是马口铁的，在夕阳照射下有些反光，马匹目标也大。敌机很快发现目标，开头一阵机枪扫射，接着扔下几颗炸弹，便甩头跑了。我们几个女同志靠在一个田埂旁，溅得满身都是泥，还好都没有事。贺子珍因产后不久，身体虚弱，正坐在担架上，没来得及卧倒就被弹片炸伤了，一位理发员和一位警卫员也当场牺牲，还有一位曾在白区做交通工作的小朱负了重伤，一些运输员也负伤了。马匹炸死了不少，药箱被炸坏。这是我们休养连在长征途中最重大的一次损失。我们连的干部又悲伤，又忙乱。要立即抢救伤员，收拾被炸的药箱行李物品，还要安排同志宿营。行军一天，同志们还没有吃饭，要赶紧设法买米，点火做饭，直是忙得团团转。

毛主席知道我们连被敌机轰炸后，便带着傅连璋，打着马灯赶来看望。他向董老问了我们连损失的情况，知道贺子珍负了伤，就去看望贺子珍。贺子珍被弹片炸伤了好几处，傅连璋看了她的伤，并给她包扎了伤处，还去看了其他伤员。毛主席见我们难过的样子就对我们说：敌人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但他们也绝不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这次被炸，有的担架员受了伤，有的跑了。毛主席就把自己的担架员给了贺子珍。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也来看望我们，中央领导的关心给我们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我们把全连人员安顿好，等大家吃罢饭，休息后，连长和我又带几个警卫员，打着马灯，强忍着悲痛，为牺牲的同志去挖墓坑，把两位同志安葬好，天已快亮了，我们稍事休息又准备开始第二天的行军。

第二天一早出发时，小朱知道自己伤重不能带走，就抱着我

的腿说：“指导员！你给我一枪吧！”他这一喊，我的心都碎了，那时红军不怕战死，就怕负伤不能随大家一起去。我们的马匹被炸死了不少，担架员一时也找不到。没有办法，我只好背起他去找老乡，把他寄放到老乡家里，安慰他说：“小朱！你好好在老乡家养伤，等伤好了来找部队，我们到了目的地，一定派人来接你。”说罢，我不忍心再回头看他一眼，含着眼泪，去追赶部队。以后，我们到了延安，中央派人去找伤员，多数都没有找到。

6. 寄放连长之争

在长征中担架员非常难找，坐担架是有严格规定的，不是谁病了都可以坐担架的，不然这支部队就很难开进。休养连的担架虽多，但都是按休养员的伤病情况而定的。董老、徐老、谢老是德高望重的“三老”，他们配有专马，必要时可以坐担架，但没有专门的担架。钟赤兵锯掉了腿，就配有专门的担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他有担架坐的。休养连的工作人员负了伤，是不能坐休养员的担架的，如果是轻伤，同志之间互相搀扶、照顾着坚持走，如果是重伤不得已只好寄放到老百姓家中，有一天，这个寄放的厄运落到了连长侯政的头上。

那是在贵州西部的山区连续行军途中，侯政的脚被草鞋磨破，草鞋磨破脚是常有的事，没有引起重视，他自己有匹马，如果这时骑马走就没事了。他要坚持走路，把马让给同志们驮东西，结果伤口感染化脓，红肿起来，以致不能行走。这下惹出了麻烦，驻我们连的特派员要把他寄到老百姓家中去。我一听要寄掉连长，眼前立刻出现寄放小朱时，他抱着我的腿的情景，那凄惨的喊声再次刺痛着我的心，我怎么也不能同意再寄掉连长。休养连虽说是个连，但与一般连队大不一样，全连300多人，有老有少（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58岁，最小的谢有法，只14岁），有男有女（女同志中有几位怀孕在途中生孩子的，还有缠小脚

的)，有党的创建人、中央委员、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还有掌握党和红军重要机密的机要人员，这些同志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要把这些同志一个不丢地全部安全护送到目的地，这个任务异乎寻常艰巨。组织上把这个连长的任务交给侯政，是经过慎重考虑和选择的。侯政参加过大革命的战斗和武装起义，指挥过战斗，又学过医，先后在师和军团当过卫生部长，他对卫生部门的工作很内行，跟总卫生部的领导又熟悉，伤病员在医疗方面碰到什么难题，他很快便能解决，如果医生缺乏时，他还可以亲自给伤员做外科手术，如行军途中碰到敌人突然袭击，他又可带着警卫员顶上一阵。到哪里再去找这样合适的休养连长呢？为了全体休养员安全护送到目的地，他不辞劳苦，不顾个人安危，带着这样一支特殊的连队长征，如今他的脚被磨破，暂时不能走路，就将他寄掉，也太不近人情了，我思想上真想不通。我对特派员说：“侯政为连队出了不少力，要带好这样一个连队不容易，况且他的伤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致命伤，治疗一下，坚持几天就会好的，他现在不能走路，还可以骑马，他自己有马，让他骑着马走吧！我不同意寄掉他！”

特派员说：“你能保证他的伤几天就能好吗？他那匹马能把他驮到底吗？他现在有伤，连长的工作也干不了，你能负责吗？”

我说：“我不保证他的伤哪一天一定好，但我们可以帮助他，让他的伤尽快地好，如果他的马死了，我还有匹马可以给他骑，我的马如果也死了，我就背着他走，连里的工作我拼着命来干，你为什么一定要寄掉他？”

我们两人争吵了起来。这位特派员是政治保卫局派来的，平时他对连里的工作老是挑刺，有时故意找岔子，我们对他敬而远之，他当然不高兴，所以这次他坚持要寄掉连长。当时总卫生部长贺诚也不同意寄放侯政，但贺诚作不了主。休养连以前归卫生部管，这时卫生部和休养连都同属第三梯队领导。这一下把我急

坏了，我想我这个指导员应对连里每个干部战士的生命安全负责，把不该寄的同志寄掉，不仅害了同志，也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我虽没有权力决定寄或不寄连长，但可以提出意见，向上级反映情况。于是我便去找蔡大姐，她当时在梯队部工作，同时李富春同志又是总政治部的代主任。我把侯政的工作和伤情，以及特派员和我个人的意见都如实地向蔡大姐汇报，请求蔡大姐向梯队领导和李富春同志反映，不要寄掉连长。蔡大姐听了我的汇报，也同意我的意见。她也了解侯政，当初侯政不愿到休养连来工作，还是蔡大姐跟他谈话，说服了他才来休养连的。蔡大姐把情况向李富春同志说了，这才把侯政留了下来，摆脱了被寄掉的厄运。侯政骑着马走了几天，脚上的伤口就痊愈了，仍率领连队继续前进。后来那位特派员调离了休养连，最后在长征中光荣牺牲了。

7. 金沙江畔的欢声笑语

4月下旬，红军在贵州西南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境内，云南的军阀部队已被调出开往贵州，云南境内敌军兵力空虚，这一段行军比较顺利，我主力部队连续攻占了好几座县城。云南的物产比较丰富，地主土豪家里都有榨菜、火腿之类的食品，在这一带打土豪没收了不少东西，使部队的给养得到了补充，我们的生活也得到改善。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这有利时机，迅速渡过金沙江，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

军委纵队的干部团在皎平渡弄到几只船，首先渡江成功，并控制了渡口。5月5日，我们连和军委纵队一起渡过了金沙江。9日，全军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把敌人甩在金沙江南岸，这是四渡赤水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渡江后，向会理方向前进，那几天各单位先后都会了餐并开了庆祝会。庆祝渡江胜利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休

养连也在会理附近开了一个同乐晚会。在晚会上徐老表演了一个捉虱子舞，他模仿孙悟空的动作，弯着腰，全身上下这里抓抓，那里挠挠，抓一个，往嘴里吃一个，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使晚会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徐老跳完舞又对大家说：“孙悟空是大无畏的，不怕困难，不怕妖魔鬼怪，我们也要象他那样，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妖魔鬼怪，要统统战胜他们。”他又说：“猴子不懂得讲卫生，身上长满虱子，只好一个一个地捉住送进嘴里吃掉。我们红军战士有条件时，要讲卫生，要常洗头、洗澡，不要生虱子。虱子这家伙吸我们的血，还传染疾病，只有消灭它。”大家听了，才知道徐老跳舞，不仅是逗大家乐，还是对我们进行教育，鼓励大家战胜困难。大家又欢迎谢老唱歌，谢老说：我唱不好，还是讲个故事吧！于是谢老就讲起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起义和在大渡河边失败的故事。他最后说：“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军，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导，失败了。石达开到达大渡河边时，还有好几万军队，有部分军队已过了大渡河，但这时他没有抓住战机，迅速渡河，却大摆筵席庆贺自己的王妃生了王子，以致耽误了全军的渡河时间，酿成全军覆灭的悲剧。我们是红军，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铁的纪律，我们不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我们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央已作出决定要迅速渡过大渡河。谢老讲这个故事，原来是给我们作思想动员。听完谢老的故事，邓六金、王泉媛、危秀英几个女战士分别唱了福建和江西的山歌，大家又欢迎我唱山歌，我素来爱唱山歌，自从到干部休养连后，因任务重，事情又多，还没有唱过山歌，这晚大家高兴，趁此过过唱山歌的瘾，我即兴编了首山歌，唱了起来：

金沙江水急又深，手牵手来心连心。

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

同志们轻松、愉快地渡过了一个欢乐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夜

晚。

8. 难以忘怀的收容队

在会理附近休息了几天，继续北上，这一段路，因敌机不断来侦察和轰炸，多数时间是夜行军。连长的脚伤早已痊愈，不幸的事轮到了我的头上了。在一次夜行军途中，部队沿着一条旁山小路上急速前进，这时正值梅雨季节，淫雨霏霏，天黑路滑。同志们一个紧挨着一个，互相照应着往前赶路，走着走着，我一下发现路边有一个大坑，我怕同志们没注意掉进坑里，就站在坑边，向路过的同志们招呼着：“小心，这里有个坑，靠里边走！”等休养连的同志们都安全通过后，我才松了口气，也许是刚才思想太紧张，站的时间太久，刚松了口气，想往前走，突然感到头重脚轻，身不由己，掉进坑里了。待我苏醒过来时，部队早已走远了。坑底一片漆黑，我试着爬上去，无奈坑壁很陡，又没有草和灌木可以攀沿，试着爬了几次都掉下来了。“难道就这样完了？”一种不安的情绪向我袭来，要是爬不上去，赶不上部队，一个人在这深山野岭可不就完了。我又想，我曾遇到几次危险最后都死里得生，这次也不能就这样轻易地完了，总会有办法的，兴许收容队还没过去！我用耳朵贴在坑壁听听上面有无脚步声，过了一会，果真听到了脚步声。我在下面大喊：“坑下有人”！上面来的正是卓雄带的收容队，他们听见坑下有喊声，知道定是有人掉下去了，就用几条绑腿接起来，扔下坑来。我摸到他们扔下来的绑腿布，我在腰上系好，抓住绑腿布，收容队的同志把我拉了上来。这次算我幸运，得到了收容队的搭救，才免于灾难。要是收容队的同志沿途不仔细搜查，没发现坑下有人，我可就真的完了。

我在女同志中，身体是最好的，个子又高大，行军走路，跋山涉水，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大的困难。在民运工作队时，我是

打前站的，到了休养连也还是打前站。一般是带几个同志先到预定的宿营地，把休养员住的房子，门板等东西准备好，大家喝的开水烧好，等连队到达宿营地时，休养员就可及时休息。可是有一次，我这个身高马大的人也掉队了，又幸亏得到收容队的帮助，才赶上了部队。

那是在进入凉山彝族地区时。一天，我去买粮食，见七、八个彝族同胞围坐在一堆篝火边，篝火上正烤着一只猎获来的野兽，他们一边说笑，一边从那烤着的猎物上割下一块一块的肉在吃。我走上前去，问他们有没有粮食卖。我讲话他们听不懂，他们的话我也听不懂，看样子他们对我倒是很热情，一位彝族同胞从那烤着的猎物上割下一块肉递给我吃。在进入彝族区前，领导上已把彝民的风俗习惯向大家交待过，如果他们请我们吃东西，你不吃，他们就认为你看不起他们，会生气的，甚至动武。所以我赶忙接过这块肉，和他们一起吃，这块肉外面烤的焦焦的，还挺香，可里面还是生的，吃了两口，一股血腥味冲鼻而来，又嚼不烂，实在难以下咽，我使劲控制自己，硬是把这块半生不熟的肉，一口一口地吞下去了，吞完后赶快走，决不能再来第二块。我向他们点点头，表示感谢，就往回跑。回来就呕吐了，要是吐完了倒好，又没完全吐出来，到了晚上睡到半夜，肚子就痛起来了，接着就拉肚子，折腾了半夜，没有睡觉。第二天行军，双腿发软，肚子阵阵作痛，还不时要找地方去拉稀。开始我还挣扎着赶上队伍，到了下午实在不行了，怎么样挣扎也跑不动了，终于掉了队，而且越掉越远，最后剩下我孤身一人。掉了队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可能被土匪或头人捉去杀死。不少同志就因掉队而牺牲在路上的。所以我不断地催促自己：快点走，快点走，一定要赶上队伍，可就是走不快，快到黄昏了，我还一个人远远落在后面。一阵孤独和恐怖感向我袭来，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唉！我真幸运，收容队又来了，卓雄见我一颠一颠地向

前挪步，忙过来问道：“李见珍！你怎么了？”

我说：“昨天吃了生肉，拉稀拉的掉队了。”

他说：“不要紧，我给点药你吃。”

我奇怪他哪来的药，当时药品奇缺，弄到的药都集中在休养连，这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准打土豪的，从哪儿弄到药呢？我说：“你哪儿有药，别骗我了！”

“你不要管，保险你吃了就好。”他诡秘地笑笑，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来，我一看，哪是什么药，里面包的是几颗鸦片泡子。我说：“这哪是什么药！这东西管什么用？”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捏出一颗鸦片泡子往我嘴里一塞，说：“吞下去！保证你马上就好”。

我依着他把鸦片泡子吞了下去。过了一阵，果真泻是止住了，可我好象腾云驾雾一样，跌跌撞撞更加走不动了。他叫两位同志架着我连拖带拉，走了一阵，把我送到了宿营地。这时快到午夜了。同志们早已休息。特派员见我回来了，不由分说，训了我一顿，他说：“到了宿营地到处找不到指导员，休养员连水也没有喝，你跑到哪里去了，现在才回？”我也顾不上向他解释，倒在地上就呼呼睡了，到第二天才清醒过来，这次又多亏了收容队，才使我跟上了部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的收容队。

9. 过泸定桥

5月下旬，我们通过了彝民地区，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听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在这里全军覆灭。而这时我们的境况也很困难，前面有敌人扼守大渡河天险，后面还有几十万敌人追击。敌人也想利用大渡河天险来消灭红军，使我们变成石达开第二。但是，我们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有英勇的红军，历史的悲剧是决不会重演的。首先是十七勇士抢渡了大渡河，接着红一师全部过了河。中央决定其它部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夺

取泸定桥，从泸定桥渡过大渡河。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320华里，道路蜿蜒曲折，崎岖难行，路的左面是高入云霄的峭壁，右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对岸的敌人还不时向左岸射击。我们要抢在敌人到来之前渡过泸定桥，必须昼夜行军。这时，又值雨季，淫雨连绵，路滑难行。老同志、轻伤员拄根棍子，互相搀扶着，一会这个滑倒了，一会那个摔了跤，摔倒了又爬起来继续走。饿了就吃点干粮。晚上行军，对岸有敌人，不能打火把，就摸着黑一个拉着一个，前后呼应着走。担架员运输员更艰难，女战士们就和他们轮流着抬和挑。就这样走了两天两夜，大家精疲力竭，两只脚象灌了铅一样沉重。但同志们顽强地坚持着继续前行。

快到泸定桥头了，突然对岸一阵枪弹打过来，我的饲养员负伤了，他头部胸部鲜血直流，一只眼睛也被打伤。这是位很好的红小鬼，只有十六、七岁，是江西瑞金下肖区人，是我到下肖扩红时动员他参的军，参军后分配到我这里当饲养员。长征时他一直跟着我，一路上他和那匹小红马形影不离，对它精心照料，每到宿营地，必先找些草料把马喂饱，然后自己才吃饭休息。有时在行军途中，见马驮东西累了，就偷偷把自己的干粮抓一把塞到马嘴里，干粮不够就自己忍着饿，还瞒着我说已经吃饱了。其实红小鬼的秘密我早就发现了，我就把自己的干粮分一些给他，并要他当着我的面吃完，免得他又塞给马吃。过乌江时，那匹小红马被迫给打死了，他还哭了一场。二渡赤水后，他跟着我到了干部休养连，抬担架，挑药箱，背伤员，无论什么工作，他都积极热情地抢着干，就在前两天他还向支部表示过决心：“要不惜一切，把休养员一个不丢的安全护送到目的地。”我也曾想过：“象这样的红小鬼，就是缺少文化，等革命胜利了，一定送他进学校去学习文化知识，使他能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没想到他竟在长征路上负了伤，又偏偏在这荒山野岭里，连一户人家也没

有，部队又在急行军赶路，怎么办？我就拼尽全力背着他走，背着他爬过了两座小铁索桥，我的衣服被汗水和他的鲜血湿透了。脚步越来越沉，又掉队了。后续部队走过来，一位领导同志见我背着一位重伤员，艰难地往前走，就关心地对我说：

“唉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这位女同志还背着个伤员，怎么走啊！快放下他吧！快赶路要紧！”

我说：“这里没有老乡家可寄放，我不能丢下他呀！”这时我隐约听见他那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指——导——员！放——下——我——吧！”

我的心真如刀割，想起他母亲送他当红军的情景，想起苏区人民对红军的一片深情，如今我绝不能把这位江西老表丢在这荒山野岭，他就是死了，我也要将他安葬好。他的手已扶住我的肩，我把腰往下弯弯，不知那来的一股劲，背着他又走过了一坡又一坡，来到一个桥头，这里有几户人家，只是人都跑了，还有一座小庙。我把他安放在小庙里，他已全无知觉，只是心脏还在跳动，我真想坐下来痛哭一场，可是时间不允许啊！我要组织全连人员安全渡过泸定桥，任务重，时间紧迫，我只好解下干粮袋放在他身边，又把随身带的几块银元放在他的口袋里，心中默默地祈望着：“老乡们！快点回来吧！救救我们这位兄弟啊！”

我赶到泸定桥头时，大家还在等待过桥。这时，主力部队已夺取了桥头堡，九根铁索联成的桥身已铺上门板，但桥面没有铺满，门板也来不及固定，人走在上面象荡秋千一样。桥下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真有些令人胆战心惊。这时，找来的挑夫见到如此危险，怕过桥后回不来就跑了。我们连的人员、马匹、药箱都堆在桥头，时间又是刻不容缓，急得我们一筹莫展。正好毛主席从这里路过，见我们如此情景，立即将他的警卫班留下帮助我们过桥，这真是雪里送炭。我们用绑腿将担架杠子绑在身上，两个人在前面拖，两人在后面推，将重伤员的担架一副一副拖过去，

轻伤员和老同志由两位同志扶着过去，药箱由女同志背过去。吴富莲、邓六金、王泉媛和我几个身体好些的女同志把药箱绑在背上，手抓住铁索，匍匐前进，一趟趟把药箱全部背过了河，就这样我们连的人员、马匹、药箱全部安全地通过了泸定桥，大家真是兴奋极了。我心里却还惦记着那位小饲养员，不知有没有老乡去救他！？

10. 雪山千里行

红军渡过大渡河，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尾追，继续北上。我们又面临着一场和自然的生死搏斗，必须越过几座大雪山，跨过渺无人烟的草地。9月，我们来到第一座雪山——夹金山下，这座山海拔4000米，山峰高耸入云，终年积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传说鸟都难飞过去，只有神仙才能过去，当地群众称之为神山。过山前，领导上要求我们作好物资准备，可是当时连御寒的白酒也找不到，只买到一些辣椒、生姜、大蒜。周副主席很关心我们，派人送来了一些肉类和粮食。那时正值6月酷暑，大家穿的只是一身单衣，为了能抵御山上的严寒，我们千方百计向藏族土司买到些羊毛和羊皮。每人做一件背心。出发那天天气晴朗，开始走的还很顺利，但越往上走，天气越冷，路越窄，坡越陡，老同志和轻伤员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住马尾巴往上爬。担架员、运输员就更困难，抬担架走在前面的稍好些，抬后面的就难上去，女政治战士就在后面使劲推。快到山顶时，突然又狂风四起，风雪交加，大家冻得浑身发抖，赶紧嚼片生姜。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大家一步一喘，一步一歇，但同志们顽强地坚持着，互相鼓励：“不要停下！坚持就是胜利！”一位运输员喘不过气来，眼看要倒下去了，大家赶紧扶住他，拖的拖，拉的拉，硬是把他拖过山顶，然后用雪擦他的四肢，使他缓过气来。我们这些老、弱、病、伤和女同志终于翻过了这座连鸟都难

以飞过的神山。

翻过夹金山，到达一个叫达维的村庄，在这里见到了日夜盼望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我们经过千辛万苦，竟在这白雪皑皑神山下，见到了亲人。红军两大主力部队，在这里会师了，怎不令人激动万分，欣喜若狂！这夹金山真是神山。四方面军的同志个个穿着整齐，精神饱满。他们见我们一方面军的同志长途跋涉很疲劳，忙把房子让给我们住，还给我们送来粮食和衣服。当晚开了联欢晚会，庆祝两军会师。第二天离开达维，到了懋功，在懋功休息了几天，总政治部在这里又开了一、四方面军的干部联欢会，还会了餐，美美地吃了一顿。大家恢复了疲劳，又精神饱满地继续前进。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接着，我们又从两河口出发，翻过了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卓克基。梦笔山和夹金山差不多高，但没有那么陡，加之有了一些翻雪山的经验，休养连没有出什么问题，但我们仍看到前头部队有几个同志牺牲了，倒在雪山途中。

到达卓克基进入藏族地区。这一带人烟稀少，藏族同胞长期受汉族反动军阀的欺压，民族仇视很深，加之反动派严令藏民不得帮助红军，否则就处以死刑，结果造成藏族同胞一听到红军消息就躲避，还不时有人躲在暗处向我们放冷枪。卓克基有一个大喇嘛寺，里面的经堂很大，可容纳几百人，陈设庄严堂皇，也有点阴森森。寺内的喇嘛都跑了，我们干部休养连就驻扎在这个大经堂里。在卓克基休息了几天，于9月初，又接连翻过了三座大雪山。这时我们的处境极端困难，伙子很难找，粮食又极缺。藏民走了，几乎每个村庄都是空的，买不到粮食。这一带地里种的青稞麦还未成熟，为解决吃饭问题，只好到地里把没有完全成熟的青稞麦割下来吃，能找到当地藏民的时候，就按价付给现款，找

不到人时，只好把钱留在地里。割下的麦子因未成熟，麦粒打不下来，我们就先用火烧，象爆米花，麦粒就自然脱落，然后把半生不熟的麦粒，放在脸盆里煮成稀饭，每人半碗，勉强充饥。那时，我们随身都带有脸盆，脸盆的用处可大，除洗脸洗脚外，烧开水喝和煮东西吃都用它。越深入藏民地区，粮食就越困难，尤其是干部休养连，行军都走在后面，前头部队把麦子都割完，等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地里都空了，我们只得捡掉在地里的麦粒、麦穗，捡到的麦子凑不成一锅，就这样直接用火烧来吃，烧得半生不熟，用手抓来吃，吃得满嘴都是黑的，象长了胡子一样，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哈哈大笑，虽然生活如此艰苦，但还是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一次，我和廖似光两人去找粮食，找了半天，一粒粮也没找到，两人垂头丧气往回走，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棵树下有头小猪，我顿时精神抖擞，连忙分两路包抄，捉住了小猪，抱回营地，大家喜出望外，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再往后走连未成熟的麦子也找不到了，地里只有碗豆秧子，我们就只能采些野菜和碗豆苗煮点稀汤喝。组织上对我们连一直很关心和照顾，但这时整个部队都缺粮，伤病员也只得喝野菜汤，不过他们的碗里比我们多了几颗麦粒而已。这样的艰苦也熬过来了，虽然身体瘦弱些，但意气仍不减，同志们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我们相信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没有了精神支柱，物质条件再好，人也是会垮的。

11. 女红军的艰辛

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32位女同志，绝大多数在干部休养连呆过，有先有后，时间有长有短，有的是休养员，有的是工作人员。我任指导员时，连里共有21位女同志。这些女红军一路上边行军，边工作，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亚于男红军。我们连是个

由老、弱、病、伤人员组成的连队，伤、病员不能走路的，都坐担架行军，因此，担架多，还有药箱和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等等要背、要挑，这些都是由民伕来抬或挑。每个政治战士要负责几副担架，管好他们吃、住、行军、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民伕是沿途临时雇请的，他们只走一段路，一般不走出本县或本省，到了预先讲定的界线，他们就要回去，得另找人。民伕很难找，我们所到之处，多是人烟稀少地区，加上反动派的威胁，群众都不敢给红军当挑伕，经过我们反复宣传动员，使他们增加对红军的了解，并付给较高的报酬（每人每天一块大洋，有时两块），才能找到一些民伕，而这些人对红军的认识有深有浅，想法也不一样。行军时，政治战士要随着民伕一起走，不断向他们进行宣传和鼓励，使他们跟上队伍。上山时，担架难上，他们就在后面帮着推，过河时，她们扶着担架过。有时在途中遇到危险情况，有的民伕害怕，撂下担子跑了，她们只得顶上去抬担架或挑药箱。到了宿营地，又要照顾民伕的生活，让他们吃饱睡好，困难时自己吃野菜，也要把仅有的粮食让给民伕吃。有时还要挨伤、病员的骂。我们的伤、病员一般是比较自觉的，能体谅工作人员的困难，但由于身体不好，伤痛难忍，心情烦躁，有时不免也发发脾气，这些女战士也能体谅病员的痛楚从不计较。一路上她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担了多少惊，遇了多少险，真是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尽，但他们没有叫一声苦，没喊一声怕。

吴富莲、邓六金、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都抬过担架、挑过药箱。吴富莲、邓六金在途中生了病，没有担架坐，只好由战友扶着，咬着牙，一步一步跟着走，幸好挺过来了。

白天行军，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到了宿营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要忙着去找禾草、找门板，安排伤病员和民伕的休息，顾不上管自己。待到把一切工作安排好后，我们能烧盆水烫烫脚，就很舒服了。第二天出发时，我们要捆禾草、上门板，归

还借来的东西，便又匆匆出发，连梳头洗脸都顾不上。行军遇上小河时，大家总是很高兴，可以在河边洗洗脸，谁有毛巾就用谁的，没有毛巾就用衣服擦擦，没有牙刷便在河边摘几根草，在牙齿上擦擦就算数。梳洗打扮之类的事，跟我们无缘，大家也就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连想也想不起来。一心想的是：如何把休养员一个不丢的安全护送到目的地。

女同志还有更难言的苦衷，月经来了，没有草纸，只好找块破布来代替，连一块破布也很珍贵，用完了，洗干净，大家轮流着用，到后来破布也难找到，就用小块破布包些乾树叶垫上，仍然爬山涉水。有时蹿过小河，河水都被染红一片。那时，也顾不了这些，许多女同志因此得了妇科病。组织上对我们女同志是很关心的，但当时条件就那么艰苦，也没有办法。到了毛儿盖时，政府机关的负责人林伯渠同志（长征前是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长）千方百计买到些酒和当归头，分给我们女同志，并教我们煮水喝，他还通知各部队，杀了羊时，把羊头送给女同志，我们不懂羊头有什么好处？我和刘群仙等几个同志拉着林老问个不停。林老告诉我们说：“羊头补血，吃了可以防治妇科病”。

林老对我们女同志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使我们内心感到无比的温暖，真是比吃了当归和羊头还补。林老还教给我们怎样煮吃，大家这才高高兴兴地走开。

我们连在长征路上有5位女同志生孩子，他们就更不容易了。在途中生孩子，没有营养，孩子不能带走，生下小孩后还要继续坚持行军。那时，伤、病员和产妇都集中在一个连队，连长和指导员也很难个个都照顾得周到。有时，因找不到担架，刚生完孩子就得走路。长征路上，如能弄到一些糖，我们总是小心保存起来，等哪位同志生孩子时，冲碗糖水给她喝，这就是最好的补品了。当红军进入贵州时，廖似光由于劳累和颠簸，仅怀孕7个月就早产了，产后找不到担架，邓大姐就把担架让给她。廖似

光产后还没满月，就帮助我们沿途做群众工作。贺子珍也在贵州生下了一个小孩，她生产后不久，又被敌机炸伤，她是带着全身的伤痛，以顽强的意志，坚持长征到底的。曾玉在行军途中，产前阵痛突然发作了，好不容易坚持到宿营地，同志们找来一捆稻草，让她躺在稻草上把孩子生了下来，第二天又要行军，连寄放孩子的老乡也没找到，就用块布把孩子包了一下，放在空屋的稻草上，留给房子主人回来收养，母亲便由两位女同志扶着艰难地跟着部队出发了。天下哪有不爱孩子的母亲？女红军也是母亲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在挣扎、在啼哭，那哭声有如尖刀刺着母亲的心，她们只能以坚强的毅力克制自己的感情，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抱着对孩子负疚的心情，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继续前进！这就是我们女红军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女红军为革命做出的牺牲！

这些女红军，无论是工作人员或休养员，都历经了艰难险阻，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胜利完成了长征，在途中没有一个掉队，没有一个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吧！

12. 七天七夜过草地

经一个多月的艰辛，行程千余里，我们终于在7月中旬走出了雪山，到达四川西北部的毛儿盖。这是松潘地区最大的一个村镇，约有好几百户人家。我们到达时却看不到老乡，原来，胡宗南有一个营住在这里，被我前卫部队全歼，当地的土司和头人胁迫藏民逃到山里去了。这里较之雪山地区富裕多了，地里种了很多青稞麦，并且已经黄熟，因老乡都走了，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各单位只好自己到地里去割麦，等老乡回来，再按当地粮价，如数付款给他们。

我们休养连也全部动员起来去割麦，工作人员、警卫员、饲

养员以及能动的休养员都参加割麦，董老、徐老、谢老3位受尊敬的老同志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带头去割。但我们连哪里比得上那些战斗部队，行军时我们走在后面，等我们到达毛儿盖时，就近的麦田已被前面的部队割完了，我们只得到远处的麦地去割。因各单位都去割麦，很快远处的麦地也割完了。我们连的动作比较慢，只得割到少量的麦，就没有麦可割了，我们只好到先头部队已割过的麦地里去拾掉在地上的麦穗和麦粒。在毛儿盖休息了20来天，大家的体力都得到了恢复。

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北上抗日和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本来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大大加强了革命的武装力量，对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很有利，但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有个人野心，以为自己掌握的四方面军人多马壮，看到一方面军减员多，衣服破烂，看不起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时，他就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主张向川康退却。这次中央又做了他的工作，再次重申北上抗日的方针，并决定将一、四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分兵两路北进，右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党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和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

干部休养连和中央机关一起随右路军行动，休养连长侯政随总卫生部长贺诚一起到左路军去了，此外，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蔡纫湘等几位女同志也编到左路军去了。邓大姐也离开休养连到中央机关去了，廖似光、邓六金、刘彩香、危秀英等几位同志被调出做其它工作，新调来一位姓毛的连长，这样一来，干部休养连的工作人员大大减少，而且几位身体好的女同志都调走了，而伤病员并未减少，有些伤病员的身体更虚弱，我感到休养连的担子更加重了，连长是新调来的，我的责任就更大了。从毛

儿盖往北走就是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神秘莫测的水草地，要把休养员一个不丢地全部安全送过水草地，任务真是太艰巨了，我当时真担心，不知道能不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领导上已经这样安排了，我也就横下一条心：有我在就有休养员在。

过草地前，领导上要求每人必须备足15斤口粮，以便通过草地。毛儿盖地区虽较富裕但突然增加上万红军，且驻了20多天，有点粮食也吃得差不多了，要筹足过草地的粮食很困难，尤其是我们休养连，收到一点麦子早吃完了。眼看就要出发了，我们的粮食还没有着落，我真是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董老见全连口粮还差很多，就亲自带着警卫员、饲养员到山上去找，晚上还打起火把去找。那些土司、头人藏在山里的粮食，早被先头部队象篦子一样篦了一遍，哪里还找得到能吃的东西哩？况且晚上进山是很危险的，常有反动分子向我们开冷枪，怎么能让董老去冒这个危险呢？周副主席曾经交待过：休养连有什么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可找罗迈和李富春同志，但休养员是一个都不能丢，丢了要砍脑壳的。这时由于机构的变化，罗迈和李富春同志都不在中央纵队，他们到别的单位担任领导工作去了。于是我便去找纵队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我将休养连过草地的粮食还没筹足的情况向他汇报，希望得到领导的帮助。结果不但没得到帮助，反而挨了一顿批评。蔡主任板起面孔对我说：“休养连也不能特殊，要和战斗部队一样，一律按上级命令行事，粮食自己找、自己背。休养员和运输员的粮食，由你们工作人员去找，伤病员的粮食，由你们工作人员代背！”我想这位领导同志怎么这样不了解下情，不从实际出发，休养连尽是些老、弱、病、伤，怎么能和战斗部队一样呢？我接受不了他这样的批评，感到很委屈。我这人有一股蛮劲，再苦再累我也受得了，危险我也不怕，但也有弱点受不了委曲。平时休养连的伤病员，因伤痛的折磨心情比较烦躁，有时工作人员照顾不到时，也有的同志向我们发脾气、骂我

们，这些我也碰到不少，我能体谅他们，但领导上对我这样，我受不了这个委屈。因此，回来哭了一场，董老见我哭，问我为什么？我赌气说：“要求休养连和战斗部队一样，这个指导员我干不了，我情愿去当挑伕！”董老耐心地教育我说：“共产党员干革命，越是困难越要干。我们当干部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沉住气，要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也顶得住困难。现在大家的粮食都很困难，部队要打仗，首先应该保证战斗部队的需要，我们的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对蔡主任的批评在思想上仍然不通，摆在面前的粮食问题，还是要解决，休养员没吃的怎么过草地，运输员是请来的民工，没有吃的，怎么抬担架，我只好带着几个警卫员和几个女同志一起，连夜打着火把上山找粮。后勤部的杨立三听说我们几个女同志晚上进山去找粮，立即派了一个警卫班上山把我们找回来。杨立三说：“你们女同志晚上进山太危险了，藏在山里的粮食早已没有了，你们到哪里去找啊？你们连缺的粮食由后勤部帮你解决，要注意安全，不要蛮干”。杨立三这番话，象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委屈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

因我曾赌气向董老提出：“我不干指导员了，我宁愿去当挑伕！”纵队政治部派干部到休养连召开党支部大会批评我，并给我口头警告处分，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受批评和处分。

8月下旬，开始进入草地，第一天走的还算顺利，还是在草地边缘，没有进入草地纵深处，晚上宿营时，还能见到一些树林，找到一些树枝烧点开水和煮饭吃。到了第二天已深入草地，环顾四周，一片茫茫水草，无边无际，没有树木，没有人烟，草丛中泥潭星罗棋布，明河暗沟纵横交错，这一个个泥潭和一条条暗沟都是陷阱，稍不注意，或走错一步，陷下去就麻烦了，越用劲想往上爬就越往下陷，越陷越深，是很难爬出来的。草地的气候也是变幻无常，整天是浓雾迷蒙，少有太阳出来的时候，时而一阵大雨，时而一阵冰雹，这里真是一个神秘莫测的“鬼怪”世

界。但我们红军战士不怕妖魔鬼怪，我们一定能降服它，我们要用这双铁板脚，走出草地。

进入草地时，每人都带有一根棍子，这棍子用处可大，一是草地路滑，拄根棍子可少摔跤；二是碰到河沟时，先用棍子插进水中，试探一下水的深浅，看能否涉水过去，如果棍子被水漂起，说明水深，如棍子插进水中，感到似乎有人在水下攥着一样，说明此处河底有暗沟和漩涡，决不能涉水过去，必须绕道走；三是晚上宿营时，几根棍子凑起来搭个架子，上面盖块雨布，就是个夜宿的小帐篷。

有一天，我们走到一条小河边，我把木棍插进水中，立即被水冲上来，差点把我的棍子冲走，我对大家说：“这河水深，还有漩涡，我们不能从这里蹚过去，必须绕道走”。

毛连长很不以为然的说：“哪有什么漩涡，不怕，可以蹚过去，不信，我先下去试试。”

我说：“不行，你别下去，太危险了，还是绕道走吧！”

他不相信我的话，一定要下去试试，结果刚下到河里，就不见了他的身影，眼看着连长被河底的漩涡卷走了，我们没有办法抢救他，大家心里难过极了，流着眼泪，站在河边为毛连长默哀，然后绕道继续前进。沿途我们还见到不少倒在路旁的同志，这些红军战士，没有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牺牲，却在草地里被这恶魔般的泥潭吞噬掉宝贵的生命。

在草地走的时间越长，困难越大，许多同志的脚被水草扎破，我的脚也被扎破感染化脓，肿了起来，草鞋穿不进去，没办法我找来块生牛皮扎几个洞，用绳子绑在脚上，拄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走，生牛皮踩在草上很滑，稍不注意就摔倒，也记不清摔了多少跤，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走，饿了就抓把炒面塞在嘴里，后来炒面被雨淋湿，结成硬疙瘩，就啃这个硬疙瘩。我们的衣服被雨淋湿，穿在身上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晚上宿营就用拄着走路的

棍子支起来，上面搭块油布，让伤病员在下面休息。身体好一些
的同志，就在露天铺块油布，大家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过夜。就这
样我们在草地里走了7天7夜，终于走出了草地。我们连除毛连长
牺牲外，休养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全部安全的走出了草地。

四、长征胜利到陕北

1. 脱离险境

走出草地，在班佑一带休息了几天，一方面在此筹集粮草，
恢复疲劳，另一方面是等待左路军到此会合，共同北上。组织上考
虑将伤病员集中在一个连队，负担太重，行动不便，决定撤销干部
休养连，将伤病员分散到各单位，刘少奇同志来向我们宣布了这个
决定。我回到中央直属队在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同在一起做民运工
作的还有刘晓、谢维俊、罗梓铭、王盛荣等同志。我曾经和他们
在一起工作过，大家都很熟悉。做群众工作是我的老行当，比在
休养连当指导员轻松多了。当时，邓振询同志也在政治部做民运
工作，我们以前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虽认识，但不熟悉，我和他是
从这时开始在一起工作，互相之间逐渐了解的。

在班佑等了好几天，也不见左路军的同志到来。有一天夜
里，突然通知我们：马上收拾行装立即出发。天还没亮大家急忙
出发，一口气走了七、八十里路，第二天继续行军，晚上到达甘
肃南部的俄界。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次紧急出发的原因，后来才
知道是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密电命陈
昌浩带领右路军南下。中央获悉后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
党中央机关和一方面军立即出发，脱离险境，继续北上。随后中
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
误决定》。并致电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部队北上。但张国焘
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

四军、三十军南下。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将俄界会议的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没有向干部传达。我们当时虽不知道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具体内容，但对张国焘搞分裂主义也有所闻，尤其在班佑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们来，这次紧急行军也不见四方军的四军、三十军一道走，大家也都猜出几分，对张国焘在这样困难关头居然分裂红军，削弱革命力量的错误都十分气愤。在俄界，我们只剩下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的七、八千人了，我们虽然人少，但大家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跟着党中央北上。我们这支部队，能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能战胜雪山、草地的险恶环境，我们也一定能战胜党内的分裂主义，取得最后胜利。

2. 胜利到达陕北

离开俄界，沿着白龙河向麻牙寺前进，这是四川通往陕甘的交通要道，中间要通过几处栈道。栈道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许多石眼，将木桩钉进石眼，木桩上铺上木板作为道面，只能容一人走过，我们就排成一路纵队慢慢通过。栈道年久失修，走在上面摇摇晃晃，下面是几丈深的白龙河，水流湍急，往下俯视，不禁有些胆战心惊，连战马走上栈道，也扒在木板上不动，不敢迈步，只得由一人在前面拉着它，一人在后面推，慢慢把马拉过栈道。唐朝大诗人李白曾作“蜀道难”的诗，诗中说：“蜀难道，难于上青天”，我们身临其境，深感蜀道的险要。我们比常人过栈道还更增加了一层难处，即反动分子还不时从河对岸向我们放冷枪，以及在山崖顶向下往栈道上滚石头，使我们随时都有伤亡的危险。过栈道时有些伤亡，但大部队还是过去了。主力部队在前面已经开始了夺取天险腊子口的战斗，我们则在麻牙寺休息了一天。过腊子口又是一关，这里的地势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北上又非通过这个关口不可，别无他路可走。当时敌人在隘口筑有碉堡，并驻有重兵防守，我主力部队英勇奋战，

终于击溃守敌，夺取了腊子口，打开了北上的通道。9月中旬，我们通过了腊子口，接着又翻越了岷山，进入甘肃南部的哈达铺。

哈达铺的人民群众，听说红军打垮了平时欺压他们的反动军队，对我们很热情，把房子腾给我们住，小商小贩也主动把东西挑来卖给我们。尤其是那些妇女从来没见过女人当兵，听说我们是女红军，都很惊奇，开始他们不相信我们是女的，因我们的头发剪得很短，装束和男同志一样，有些妇女围着我们问长问短，有的老大娘就故意紧挨着我们，用手摸摸我们的身子，说：“天冷了，你们穿的衣服好单薄。”实际是对我们进行调查，我们上厕所时，也有老大娘跟着来。他们确认我们真是女红军后，对我们真是热情，把我们请到家里作客，青年姑娘更是又好奇又羡慕，把我们拉到她们的热炕上，问这问那的问个没完。

哈达铺的物质比较丰富、东西又便宜，羊肉、鸡、蛋、蔬菜、面粉都有。中央规定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随便拿群众的东西，也不准开借条，要用现款向群众公开买东西，离开了藏族地区，又恢复了打土豪的政策，对地主土豪的粮食和银财，实行没收。我们几个月没有吃过油盐、白面、肉类等等，在哈达铺美美地吃了几顿好饭饱饭，真是痛快。个人卫生也打扫了一番，疲劳得到了恢复。

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干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他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人数是少点，但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他宣布说：“现在我们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我兼政委”。他鼓励大家要振奋精神，一定要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在哈达铺休息了五、六天，我们出发继续北上，有次我骑着马，驮着一位伤员找老乡家寄放，走到一个村子，我把马拴在村

前一棵树下，因跑了一段路很热，就把外衣和我们全部行装一起撂在马鞍子上，背着伤员找到一个老乡家，给了老乡一些银元，又跟他说了很多好话，他才同意接收伤员，待我把伤员安顿好，离开了老乡家，走到村前一看，我的马不见了，这下糟了，我除了身上穿的一件破单衣外，全部东西都丢光了。到了宿营地，太阳落山，气候骤冷，冷得我上下牙齿碰得咯咯作响。大家都是随身穿的破衣服，哪有多余的衣服。怎么办？王盛荣见我冷的哆哆嗦嗦的，问我：“你怎么还穿一件单衣？”

我无可奈何地告诉他：“今天下午去寄伤员时，东西全被贼偷走了！”

王盛荣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件衣服递给我说：“我这里有个没收来的和尚衣，你穿不穿？”

我冷得够呛，哪管什么和尚衣不和尚衣的，接过来就往身上穿，我穿上这件衣服，和尚不象和尚，尼姑不象尼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李开泉又忙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块布，送给我说：“这块土豪的布给你，你自己做件衣服穿吧！”

刘晓又拿出一床羊毛毯子给我，说：“这也是打土豪得来的，你拿去盖吧！”他们把打土豪得来的东西都给了我，身上穿的，晚上盖的都解决了。刘晓送给我的这床毛毯，成了我以后在瓦窑堡结婚时的唯一的嫁妆。直到现在我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这是长征中唯一留下的纪念品。

9月下旬，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敌人苦心经营的渭河封锁线，到达榜罗镇，在此休息了一天，中央召开了全支队干部大会，传达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到陕北去，与陕北红军会合，以陕北作为抗日基地，这时，我们才知道有刘志丹的红军，有根据地，我们终于有了具体的目的地，找到了落脚点，同志们热血沸腾，更加信心百倍，争取长征的最后胜利。

第二天从榜罗镇出发，越过了西兰公路，10月初翻过了六盘

山，到达甘肃庆阳地区。组织上派我和罗梓铭、谢维俊同志一起到曲子镇去做群众工作，筹集粮食。起初，群众对我们不了解，把粮食藏起来，把羊群也赶到山里去了。我们分头去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当地也有不少群众参加过哥老会，哥老会的势力很大，我们找到哥老会的负责人，向他解释红军的政策，争取和团结他们，我还跟他们的家属结拜姐妹，他们对我们了解后，就把粮食送给我们，把羊群也赶回来了，哥老会的人很讲义气，知道我们当时很困难，就主动借钱给我们买粮，还牵着羊来慰问红军。

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在吴起镇听同志们说，他们在途中经过一个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山上有个古庙，庙里有和尚，据和尚说，山上的鸡叫，三省都能听见，故又叫“鸡鸣三省”。我和罗梓铭、谢维俊等同志是从定边县南部到吴起镇的，没有经过老爷山。

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了物质上和自然环境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真是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终于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进入了抗日前沿阵地，我们将从这里开始一场伟大的抗日民族斗争。数万革命同志倒在这长征路上，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人民将千秋万代纪念他们。

毛泽东同志对长征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

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中国的革命，从此不断发展，直到胜利。

3. 长征山歌

我爱唱山歌，在长征路上编了一些山歌，既是当时感情的抒发，也是一点历史的记录。

出 发

分田分地阶级明，
革命处处为人民。
紧记国仇与家恨，
北上抗日去长征。

进遵义城

红军歼敌进遵义，
牵羊捧酒齐欢迎。
分田分地掌大印，
送儿关郎当红军。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舞春风，
迎来日出东片红。
军民欢呼乾坤转，
娄上关上出英雄。

娄 山 关*

娄上关上雪花花，
红军宿营石崖下。

遵义妇女爱亲人，
跋山涉水送糍粑。

渡赤水河*

红军四渡赤水河，
遵义人民觉悟高。
送粮带路抬担架，
枪林弹雨显英豪。

夜行军

翻过一岗又一岗，
夜黑行军道路长。
肩抬担架闻天下，
革命思想当太阳。

过金沙江

金沙江水急又深，
手牵手来心连心。
阶级姐妹团结紧，
不怕敌人百万兵。

过泸定桥

红军抢渡泸定桥，
炮火连天铁索摇。
脚踏铁索心不跳，
女兵争把药箱挑。

过雪山

夹金山上雪似银，
脚踏冰雪奔前程。
革命豪情比火热，
熔冰化雪步不停。

过草地

万里行军不怕难，
踏平草地烂泥滩。
七天七夜风雨过，
红旗指向六盘山。

到延安

主席领导到延安，
红旗高插宝塔山。
千里长征闹革命，
到处亲人到处欢。

长征胜利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情意浓，
万里长征记心中。
中华大地出新秀，
万树千花别样红。

注：有*者为1986年纪念长征50周年而作，其余为长征途中和到陕北时所作。

第六章 陕北岁月

一、初到陕北

1. 从吴旗到瓦窑堡

陕北苏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发展起来的。1935年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六座县城，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根据地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成立了陕甘晋省委，在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主力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到近万人。9月，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革命形势是很好的。但当时陕北苏区内外却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一是，在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错误的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原陕北苏区的一大批领导人被逮捕，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二是，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了解到这些情况，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党中央来解决。并成立了五人委员会来纠正肃反中的错误，立即释放了刘志丹等同志，及时地挽救了一大批受“左”倾错误迫害的同志。这一措施，挽救了陕北的党，深得陕北广大党员干部的拥护。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周恩来亲自率领红一方面军南下富县，迎战敌军。11月下旬，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十五军团共同作战，在直罗镇歼敌一〇

九师，击毙该师师长牛元峰，接着又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建立广大的西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敌人发动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同时，常有小股敌人和地主民团以及土匪等，不时在根据地内部进行骚扰。组织上要我和谢唯俊一起，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定边、吴旗和保安一带剿灭土匪。我们先集中兵力，将吴旗至保安一带的民团、土匪肃清了。随后，谢唯俊带部分人向西北定边方向发展，我则带小部分人在保安以东活动。记得有一天在劳山碰到杨得志，他跟我开玩笑说：“李见珍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也带兵来打仗？”我说：“这里的敌人都被你们消灭完了，我只有做群众工作了，为你们筹集粮草吧！”

这时中央决定原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的干部仍回原单位工作。不久中央机关搬到瓦窑堡（今子长县）。吴旗剿匪结束后，我们到瓦窑堡向中央组织部报到。当时组织部只有部长罗迈和科长金维映两个人。我去到组织部，正好他们俩都在，我向他们敬了个礼，问了好便说：“组织上通知我回来，我是来报到的。”

金维映热情地拉我坐在炕上，告诉我说：“女同志都在瓦窑堡，就你一个人现在才回来，你在吴旗剿匪怎么样？身体吃不吃得消？回来好好休息几天。”

我将剿匪的情况简单向他们汇报了一下，便对金维映说：“你看，我的身体不是好好的吗，我是不是仍回妇女部工作？”

部长听我这么问，忙接过话题说：“现在没有妇女部，你到苏维埃政府去工作。”

听他这么说，我不敢多问，心想组织部不是通知都回原单位吗？邓六金、刘彩香等几位女同志已留在妇女部，为什么说没有妇女部，要我到政府去呢？我弄不明白。第二天，中央机关开会，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同时宣布博古、谢唯俊、罗梓铭和我4人调办事处工作（原江西中央政府工作的同志，

仍在办事处工作)，没有宣布我的具体职务。也许是组织上照顾我，让我休息一下。

2. 瓦窑堡的婚礼

瓦窑堡当时是陕北根据地的中心，中央机关搬到这里，就结束了一年多来长征途中那种前堵后追，边战边走，长途跋涉，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有了根据地，有了家了，生活相对安定了一些。长征中碰到的困难和危险虽然是无与伦比的，死亡也随时威胁着每一个人，但红军也是普通的人，他们有着丰富的感情，尤其是在患难相交，生死与共的革命友情之中，有些男女同志之间，也暗暗地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到了瓦窑堡，这人间爱情之花，便一朵一朵的开放了，洛甫和刘英，刘少奇与阿香（谢飞）、董必武和何莲之等等，都在这里举行了婚礼。

我一到瓦窑堡，蔡畅大姐、邓颖超大姐、刘群仙、金维映出于对我的关心，接二连三找我谈话，要我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他们又积极为我牵线搭桥。蔡大姐、刘群仙曾跟邓振询一起工作过，对他比较了解，力主我和邓振询结婚。

邓振询，又名邓仲铭，在江西时是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劳动部长。那时我们就认识，但不熟，长征后期，我们都在总政地方工作部工作，互相之间才增进了了解。他是江西兴国人，也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6岁时死了父亲，跟着母亲艰苦度日。10岁时，母子2人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母亲被迫改嫁，他随母亲到了继父家，继父对他不好，13岁便离家外出，独立谋生，学做泥水匠。三年学徒期满，师傅要他干重活，累活，又吃不饱，穿不暖，还常挨师傅的打骂。苦难和凌辱，使他产生了对旧制度的不满。1926年，北伐军进驻江西，兴国县的农民运动兴起，他参加了农民运动，并成为当地农运的领导人之一。1928年春，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组织和领导了兴国县的武装暴动。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3月，毛主席率红四军进入兴国，建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他被选为委员会委员。随后，又担任兴国县总工会的委员长。1932年担任江西省总工会委员长。1933年5月，全总苏区执行局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手工业工人代表大会，振询参加了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并被选为全国手工业工会委员长。从此，他便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得到刘少奇的指示，成为中央苏区手工业工人运动的领袖。1934年1月，他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部长。长征初期，他在五军团任地方工作部部长，毛儿盖整编后，才调总政地方工作部。

我们在一起长征了一段，我觉得邓振询很朴实，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具有中国无产阶级那种大公无私、坚韧不拔的品德，他和同志们相处得很好，对同志诚恳，宽厚，但对自己要求严格，他是位很好的同志。但那时我没有想到会跟他结婚。蔡大姐和刘群仙向我提出他时，我才考虑，发觉邓振询和我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两人的经历差不多，走的是同一革命道路，我们在一起也能谈得来，有许多共同语言，他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能和他结成终身伴侣，我感到很幸福。

我对蔡大姐和刘群仙说：“不知邓振询同志对我怎么样？”

他们两人笑嘻嘻地说：“老邓就看上你了，你这样的媳妇到那里去找呀！”在她们的撮合下，我和邓振询在瓦窑堡结了婚。

举行婚礼的那天，邓大姐、李富春和蔡大姐、刘少奇和阿香、博古和刘群仙、洛甫和刘英、罗迈和金维映，还有罗梓铭等等很多同志都来向我们祝贺。当时，大家都很穷，到了瓦窑堡组织上给每人发了几角钱鞋袜费，同志们就把这几角钱凑起来，买了些羊肉和鸡，在饭堂大家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餐。开饭前，我见人多还有些不好意思，就偷偷溜到街上去了，正好碰到陈士福，他见我就说：“恭喜！恭喜！你今天结婚，该请我吃糖。”

我说：“好吧！我请你吃面条。”

陈士福不知道我是偷偷溜出来的，就跟我一起到一间小面铺去吃面，那边参加婚礼的人到开饭时，不见了我，都嚷嚷起来，“新娘怎么不见了！”刘群仙和金维映就跑到街上来找我，瓦窑堡地方很小，就那么几间店铺，一下子就到面铺里找到了我，把我拉了回去。

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极端艰苦，初到陕北，虽已到冬天，还没有穿上棉衣，更没有棉被。新婚时，我们住在一个旧窑洞里，晚上盖的还是长征路上刘晓送给我的那床毛毯，这是我唯一的嫁妆，也是我和振询这个小家庭的唯一家当，我非常珍惜它，它伴随我经过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四十年的社会主义，直到现在仍然铺在我的床上。

3. 赤源筹款

我新婚刚刚一个星期，组织上又派我到赤源县去工作。组织部长罗迈对我说：“我们刚到陕北，很多同志还没有棉衣，没有粮食，没有钱，党中央决定要扩大红军，要派些同志到各县去筹款、扩军。你做群众工作有经验，组织上决定派你去。”

我从吴旗剿匪到瓦窑堡还不到一个月，真想回机关工作，调整一下，但组织上既然这样决定了，我还是服从组织。我自己暗自思忖，一起长征的女同志，都留在机关工作，唯独要我一个人又是去剿匪，又是去筹款，可能还是因过草地前，提出不干指导员而受到口头警告处分的原因吧！组织上派我到最艰苦的地方，要进一步考验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接受组织的考验。于是我对罗迈说：“好！我明天就去。”

临走时，他交给我十二项任务：筹款、筹粮、扩军，发动群众为红军做鞋、做袜、做棉衣，搞好和陕北地方党组织的关系，搞好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关系，做好群众工作，遵守纪律等等。并说：

“如果任务完成了，叫地方政府给你做一套棉衣，一双棉鞋，给一匹骡子你骑回来。如果完不成任务，什么也不给你。”

和我一起派到赤源去的还有陈士福、刘文安，还有一位江西老表共4个人，由我负责。罗迈跟我谈话后的第二天，我一个人先出发。时值1935年12月，陕北的冬天很冷，那天又下着鹅毛大雪，我穿着几件旧单衣，外加一件羊毛背心，两条单裤，一双旧布鞋，拄着一根棍子，冒雪去赤源。路不熟，道又滑，在雪地里走了大半天，脚都冻麻木了。陕北这地方，人烟稀少，村庄和村庄之间相隔好几里路，到了下午肚子又饿，身上又没钱，在根据地内作为中央红军，我不能随便到老百姓那里要东西吃，只好忍着冻挨着饿坚持走路。走着走着，不知怎的一下摔到一个大雪沟里。黄土高原有很多沟沟壑壑，沟底有丈多深，又没有树，尽是冰雪，很难爬上来。我想长征时经过千难万险，我都没有死，这回也不能白白在这里冻死，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在沟里大喊大叫起来，叫了好一阵。算我运气好，正好有位老汉赶着羊群打这里经过，听见喊声，知道有人掉进沟里了，他就把拴羊的绳子丢下来，把我拉了上来。老汉见我是位红军，对我很热情，问我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是到赤源县。他听不懂我的话，讲了好半天，还是听不懂，后来我说去苏维埃政府，他这才听懂。他主动给我带路，终于找到县委。

赤源县是横山、靖边、米脂、安定四县交界的地方，陕北党组织在这里建立了赤源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县委书记是李景膺（解放后任中央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景膺和县委的同志对我非常热情，见我冻得那样，急忙给我披上一件棉衣，接着给我端上一碗热汤糊糊。穿上陕北同志给的棉衣，喝上热汤糊糊，全身都暖和了，心里也是暖融融的。我向他讲明来赤源的任务，并希望县委帮助共同完成。他说：“今晚你太累了，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再一起研究。”李景膺叫来一位女同志，向我介绍说：“她是县农

委的贾红玉同志，你就和她住在一起吧！”他又对贾红玉说：“这位是中央红军的李部长，你要好好招待、照顾。”（当时我虽没有担任妇女部长的职务，但许多同志仍叫我部长）这一下就闹出了一个笑话。

当时男女红军穿的衣服没有什么区别，我的个子长得高大，扎了一副绑腿，剪了一个小分头，戴上帽子不见头发，小贾误认为我是男同志。她听李书记说完就愣住了，不知李书记安的什么心，把个男同志安排和她住在一起，她有些不高兴，但当着我的面又不好说。李书记善解人意，一下看出她的心思，就故意跟她开玩笑说：“小贾，你不要怕，中央红军纪律严明，李部长是位领导干部，我担保不会出问题的，你放心！”我来赤源的前一天，县委开过会，通知各区和县委机关说有几位中央红军要来赤源工作，要求大家积极帮助中央红军的工作，并热情接待，小贾听说中央红军要来他们县工作非常高兴，在支部会上表示一定用最大的热情来接待亲人。这是后来小贾告诉我的。所以小贾虽对李书记的安排不解，还是很热情地把我领到她住的窑洞。窑洞靠里是一个土炕，小贾早已烧热了，进到窑洞里感到很暖和。她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烫脚。见我一双大脚放在盆里，更深信我是男的无疑了。在30年代，陕北的妇女都是裹小脚的，小贾只有十六七岁，从未出过县境，不知道南方有些妇女不裹脚的事。我见她很拘谨的样子，心想她可能听说我是位领导同志，年纪又比她大好多的缘故，便主动跟她讲话，向东向西，跟她拉拉家常，但我那带有广东客家口音的普通话，她一句也听不懂。她讲的陕北话，我也半懂不懂，语言不通，一下子也很难沟通。晚上，我们两人睡在一个炕上，她不敢脱衣服，把被子裹得紧紧的，连头也蒙进被里。我因为走了一天路，很累，躺在热炕上舒舒服服，一下子就呼呼大睡了。

第二天一早，她领我去吃早饭，李书记见到小贾，又逗她

说：“小贾，昨晚怎么样？我说中央红军很好嘛！很守纪律的嘛！是不是？”小贾点点头。李书记又说：“李部长长得很英俊，我给你做个媒吧！”小贾便以为真，脸上泛出了红晕，低声对李书记说：“他有没有婆娘？”她真的对我产生了爱慕之心，旁边的几位同志哈哈大笑，李书记也嘻嘻的笑个不停。小贾和我莫名其妙，我问李景膺：“有什么好消息，你们这么高兴？”李景膺说：“好消息！好消息！我们小贾爱上你这个中央红军了，我给你们做媒，今天你们就结婚吧！”我这才恍然大悟，乐得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我忙拉着小贾说：“他们逗你玩哩！我是个女的。”弄得小贾怪不好意思，满脸通红，跑开了。这笑话就传开了，同志们见到我就问：“你有没有婆娘？”

陈士福、刘文安等3位来赤源后，我们和县委、县苏维埃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如何完成中央要求的筹款和扩军的任务，我向陕北的同志介绍了在中央苏区发动群众和筹款、扩军方面的一些做法。我们4人和县委县苏的同志一起分别到各个区、乡去开展工作，李景膺很照顾我，要我就在县委所在的区工作。小贾仍跟我在一起到各乡、村去做工作，我们熟悉了，语言也逐渐通了，她还给我当翻译。陕北的干部和群众对中央红军很好，对中央红军从南方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的事迹非常感动，尤其是对中央红军艰苦卓绝的精神和所向无敌的英勇气概非常敬佩。对中央布置的任务，坚决地、积极地去完成。当时赤源全县都动员起来了，陕北群众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为了支援中央红军，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口粮，一升一斗地拿出来慰问红军，有的群众把自己养的羊、鸡送来，妇女们更是自愿为红军做棉衣、做鞋做布袜子等等。

由于李景膺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支持，赤源县提前完成了筹款筹粮和扩军任务。在一个半月内筹到款1600元（任务是1500元），扩大红军200名，筹粮任务也超额完

成。县委还组织一批妇女为红军做了许多棉衣、鞋、袜等等。县委送给我们4人每人一套新棉衣，一双布袜、一双棉鞋。我们回去时，县委给了我一匹骆驼，上面装满穿的吃的东西，我骑着骆驼回到瓦窑堡。

4. 谢唯俊同志的牺牲

谢唯俊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1929年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30年后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南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前委秘书、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

我是在江西瑞金时认识谢唯俊的。那时苏区中央局推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政策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除了在福建开展了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排挤坚持正确路线同志外，又在江西开展了反所谓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由于邓、毛、谢、古等同志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王明的“左”倾政策、策略，遭到了无情的打击，谢唯俊因此受到了错误的处分，被撤销江西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师师长的职务，调到中央组织部帮助工作。

组织部的办公室就在妇女部的楼上，大家又都在一个饭堂吃饭，天天见面。他虽然受到了错误的处分，但从不消沉。在组织部，有时被派去各地巡视，有时去扩大红军，有时去筹粮、筹款，无论什么工作他都是任劳任怨，积极主动去完成。他组织性很强，服从组织的处理，但仍坚持原则，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长征开始，他被编在我们民运工作队当一般队员，他热情主动的帮助和支持我的工作。他身体不太好，但他坚持行军走路，

还提着白灰桶，拿着条帚，沿途书写宣传标语，一到宿营地，就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红军的宗旨，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他无畏艰险，不怕疲劳。在长征路上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他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因战事匆匆，来不及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谢唯俊被错误处分的事，也没来得及解决，他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而是为革命前途有了希望而高兴，他心情舒畅，更坚定了胜利的信心。遵义会议后，他调到总政地方工作部，我到了干部休养连。以后，我也调到地方工作部，我们又在一起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到了陕北我们又一起到吴旗剿匪。

不久，中央决定在定边、靖边、安边三县成立三边特委，开始组织上要我担任三边特委书记，后又通知我到瓦窑堡，由谢唯俊任特委书记。是年年底，敌人进攻定边，谢唯俊在战斗中牺牲。

谢唯俊牺牲时年仅28岁，他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团结、统一和富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共产主义的忠诚的勇敢的战士，是值得人民永远崇敬和纪念的。

二、到陕西省委

1. 在省委妇女部

1936年初，中央决定成立陕西省委，省委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贾拓夫，军事部长钟赤兵。我从赤源扩红回来，中央组织部便通知我到陕西省委工作，我的职务是省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兼妇女部长。省委机关在瓦窑堡。

省委妇女部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妇女群众送亲人参加红军，动员妇女为红军做鞋、做袜，送粮、送菜支援前线等等。我在陕

省委工作时间不到一年，主要时间是参加中心工作，真正的妇女工作做得不多。

当时，振询也住在瓦窑堡，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长。是年初，刘少奇去华北白区工作，把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交给了振询，由他兼任全总西北执行局的负责人（主任或委员长）。刘少奇同志离开瓦窑堡前，曾找振询和我一起去，对全总的工作作了些指示，刘少奇同志说：“目前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为完全殖民地的地位。全国各阶级、阶层的人，除极少数人外，都开始参加或同情和赞成抗日救亡的斗争。我们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但要实现，还有许多困难。工会的工作就要充分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在工会工作中要注意克服关门主义，尽快恢复和发展各地的工会组织，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全总的一些具体工作，他也向振询作了指示和交代。

3月初，陕西省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我和振询都出席了大会，他作为全总的代表向大会致了贺词。

陕北苏区，从1935年十月革命节到1936年1月，已超额完成扩大红军任务，共给红军部队送去了3600多名新战士。陕西省委成立后又提出在3月底以前继续扩大红军2600名的任务。一次，省委开会研究如何完成这次扩红任务的问题，罗迈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常到陕西省委来指导工作。省委认为安塞和蟠龙的工作比较差，上次的扩红任务没有完成，需要加强那边的工作。罗迈就提出要我到安塞去。省委书记郭洪涛说：“安塞和蟠龙是我们和敌人拉锯的地方，那里常有敌人去骚扰，女同志去那里不太合适，太危险了，还是派男同志去为好。”罗迈坚持要我去，他说：“不要怕，当地有党组织嘛！”我不知道这是组织对我特别信任还是对我的考验还未结束？就说：“我不怕，我去安塞”。

省委会议一结束，当天我就骑着马去安塞。果不出郭洪涛所料，走到半路我就碰上了敌人的骑兵。一人单枪匹马怎敌得过一队骑兵？我当机立断，连人带马滚到一个沟壑里，幸好我们的骑兵很快就追过来了，把我从沟里救出来，我又一次死里得生。和我同时出发去安边扩红的刘文安同志，也是走到半路就碰上了敌人，他被敌人捉住，敌人将他双臂都砍掉，把他丢在地上后跑了，他硬是坚持着爬了回来。

我在安塞还是和当地的干部一起，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不仅完成了扩红任务，还组织妇女为红军做鞋，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安塞的工作上去了，我便回到省委。

2. 三边巡视

我从安塞扩红回来，对振询说：“这次去安塞在路上碰上敌人骑兵，真危险，差点回不来了。”

振询说：“安塞的情况很复杂，工作困难大，你这次去的任务完成得怎样？”

我说：“困难是大些，和县委的同志一起下去跑，扩红任务完成得不错，县的工作也上来了。我很累，真想休整一下。”

他说：“你别想休息，明天你就知道了，我们一起去定边”。

第二天通知我们去开会，组织部宣布成立三边巡视团去三边工作，团长是贾拓夫，副团长是毛齐华，巡视团成员由中央工、青、妇各部门负责人组成，振询是工会方面的代表，我是妇女方面的代表，我们两人都是巡视团成员，一起去三边。三边指定边、靖边、安边3个县，是陕西、内蒙、宁夏交界地区，也是蒙回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在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向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进军。为配合红军西征，组织了 this 巡视团到三边

地区开展工作。主要是贯彻和落实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工商业政策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和巩固三边的民主政权。

我们先到定边，红军攻克盐池后，我们又到盐池。记得我们还去看过产盐的老池盐坝。在盐池只待了几天，又回到定边。在定边工作时间不长，便到了保安，这时党中央机关、中央政府机关已搬到保安，陕北省委搬到安定。此后，我便调离了陕北省委。我走时由白茜接任妇女部长，史秀云是共青团省委的妇女部长。史秀云比白茜大几岁，白茜又活泼些，她们两人就对调了一下，由史秀云任省委妇女部长，白茜到共青团省委任妇女部长。

我在陕北省委工作期间，无论是郭洪涛，王达成等省委领导同志，或下面县里的同志，对我都很好。我深深体会到陕北同志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体现了他们对同志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对中央红军热诚和尊敬。我得到了他们的热情的帮助支持，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三、重回中央妇女部

1. 洛甫召见

从定边回到保安，中央总书记洛甫叫我去见他。我去到他住的窑洞，刘英也在，她当时在中共中央工作，我们曾经一起在福建省委工作过。到了陕北后，因我常在下面工作，很少见面，这次见到，免不了在一起亲亲热热说笑一番。洛甫跟我说：中央决定要你回中央妇女部任部长。我听后不知怎的，一股辛酸涌上心头，忍不住哭了起来。刘英说：“你这个人，干起工作来很泼辣，像个男同志，怎么哭起鼻子来了。”我对洛甫说：“我的水平低，怕担当不起，还是在下面工作吧！”洛甫虽是党的总书记，但他平易近人，为人厚道，对下属干部既坚持原则，又备加

爱护。他听我讲了后没有批评指责我，而是耐心的开导我，一方面教育我，一方面又鼓励我。在洛甫的教育和鼓励下，我接受了组织的安排，重新担起中央妇女部长的担子。

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还有邓六金、刘彩香、危秀英等几位女同志。当时党中央机关都在一个党支部，洛甫参加我们这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我们妇女部几位同志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洛甫常跟我们讲工农干部要努力学习文化。他说：“我们将来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实现共产主义，没有文化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的”。他还经常给我们讲马列主义理论。

是年秋冬之间，我第三次到定边，这次的任务主要是动员和组织妇女群众为红军做棉衣、做鞋、袜、手套、米袋等等。当时主力部队正在那一带打仗，冬天来了，部队需要大量的棉衣。后勤部门也有专人做棉衣，但赶不及，因此我们发动妇女群众帮助做。鞋子、袜子、手套、米袋这些小一些的东西，部队没有专人做，就全靠妇女群众来做了。记得当时定边群众还很封建，男女之间不能接触，我们工作队的同志开始下乡到了群众家里，妇女们总是揭开窗帘偷偷看我们，不敢和我们讲话。我是女同志，到群众家里，做妇女工作比较方便，我和她们的关系也很好。

这次到定边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约有一两个月，当时很多熟人在定边，罗迈也在定边，罗梓铭在定边任三边特委书记。中央党校也搬到定边。定边城周围有很多沙子，同志们在沙窝里比赛摔跤，我和那些男同志在一起比赛，有些男同志还摔不过我。那时虽然很苦，但生活还是十分愉快和有意义的。

在定边时，罗迈要我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我也很想去学习，但又接到通知，要我回保安去接待丁玲。丁玲是我们党内的著名作家，在上海从事文艺运动，后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逃离南京，辗转来到陕西。中央对丁玲的到来很重视，派我专程到保安迎接。中央还特意开了欢迎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欢

迎会。为迎接丁玲，我放弃了进党校学习的机会。不久，即发生了西安事变，我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

2. 率工作团进延安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把延安让给了我们，东北军撤出延安后，当地的民团占据了延安的清凉山、宝塔山、凤凰山3个山头，在山上筑有碉堡。陕北哥老会的势力很大，民团和哥老会结合在一起，把一些青壮年男子都裹胁到山头上去了。王春圃（江华）是延安城防司令，他带着部队在山下围了很久，山上的人就是不出来。我们对哥老会的政策是团结争取，延安又是张学良让给我们的，山上的民团与东北军、西北军又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能硬打。而几个山头不拿下来，党中央机关就不能搬进延安。当时，中央就考虑派一个地方工作团去做群众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消除群众对中央红军的误解，争取山上的人下来。

有一天，我去洛甫家里请示工作，正好博古在他那里，他们正商量派工作团到延安的事。我请示完工作，见洛甫写了一个条子递给博古，又听他们两个小声说：“这个任务太玄，女同志带队去合不合适？”洛甫说：“让她去试试，不行再说。”第二天，博古跟我说：“中央要组织个工作团到延安去做群众工作，争取哥老会和民团下山，你去任工作团的团长”。博古又将洛甫写给他的那张条子给我看，纸条上写着“要李见珍带工作团去延安”。我一贯喜欢做群众工作，到陕北后也做了一年的群众工作，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个工作团共有200来人，是由中央各机关抽调的干部，还有中央党校和陕西省委党校的学员，我现在记得的有马文瑞、陈士福、强晓初、铁汉，还有位姓白的同志，很多同志的名字一下记不起来了。工作团临走前洛甫向我交代，要以“枪杆子做后盾，宣传打先锋，你们去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争取群众”。

我们工作团从保安出发，当天黄昏到达延安，我在延安没找到住的地方，没办法当晚我们又退回到安塞。第二天再去延安，大家分头去找老乡，当时延安群众听信了谣言说：“中央红军共产共妻”。我们找到老乡，他们就问我是中央红军还是陕北红军。当听说我们是中央红军时，就很冷淡，我们就向群众作宣传，宣传中央红军的政策，并告诉他们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都一样，是工农的部队。经过我们做工作，总算在延安住下来了，我们又进一步向群众宣传，并找哥老会的家属，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向她们交代政策，保证山上的人下来一个不抓，一个不杀，并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经过几天的工作，群众逐渐对我们有所了解。我们又通过哥老会的家属到山上去把他们的代表请下山来，和他们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马明方也来了，我就向他们介绍说：“马明方同志是陕西省苏维埃的主席，他和刘志丹是一起的，他是刘志丹的好朋友。”刘志丹在陕北群众中威信很高，听说马明方是刘志丹的战友，对马很尊敬。群众知道了我们和刘志丹是一起的，就消除了思想顾虑。我们又反复向他们交代政策，再次保证：对山上的人不抓不杀。代表的思想通了，就回到山上做其他人的工作，有些家属也在山下喊话，叫他们的亲人下山来。后来碉堡里的人就将白衣服挂在竹竿上在碉堡上摇晃，我们工作团的人就在下面喊：“欢迎你们下山来”。山上的人下来后，我们又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并向每个人发给3块钱的路费，请他们回家。我们去延安时，没有带钱，我给洛甫写了封信，请中央送钱来。中央派了管财务的同志带着钱来了。我们诺言兑现，对山上的人一个没抓，一个没杀，还发了路费，群众很高兴，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

3个山头的碉堡问题解决后，我们又趁热进一步发动群众，团结争取延安各界人士，成立了延安各界救国会，高浪山任救国会主任。当时延安的县长还是张学良委派的，叫马豫章，是个进步

人士，他和我们合作也很好。我们还帮助建立了延安市委，王德明担任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郭洪涛是跟我们一起去延安的，他不是工作团的，是去延安看房子，为中央机关安排驻地。碉堡问题解决以后，王观澜也来了，我们一起在延安把准备工作做好后，中央机关于1937年1月搬到了延安。

毛主席到延安后召集我和王春圃、王观澜等人汇报怎样解决山头上碉堡问题，我汇报了工作团在延安发动群众，作哥老会头人家属的工作，宣传党的政策等等情况。毛主席表扬了我们工作团的工作。还指出：碉堡问题能顺利解决，是有枪杆子作后盾，枪杆子和群众工作两方面结合起来，问题就好解决了。的确，如果没有王春圃带的部队作后盾，光靠我们做群众工作，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3. 参加延安会议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主席、洛甫、博古、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以及党中央机关和红军中的一些领导人，约有五、六十人，张国焘本人也出席了。我有幸也出席了中央这次重要会议。

开会时天气很冷，屋里生了几个炭火盆，大家围着火盆坐，记得毛主席坐在我对面，他拿着火钳，把烧红的炭火往我这边拨，开玩笑说：“烧你！烧你！”张国焘在会上作了检查，有很多同志发言批评张国焘的错误。我记得朱光在会上发言很多，会上有许多同志提出要撤销张国焘的领导职务，有的同志还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中央对他的政策很宽，为了挽救他，给他时间，让他自己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中央还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

主席。但是，张国焘口是心非，口头上说要改正错误，后来还是逃跑了。

4.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党代会

1937年5月，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我参加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洛甫在会上致了开幕词，毛主席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博古在会上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在召开苏区代表会之前，中央已经决定要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因此，会议结束后，接着举行了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大会选出的边区党委执行委员有：高岗、林伯渠、吴亮平、马明方、李富春、周兴、李见珍、郭洪涛、王达成、习仲勋、白治民、刘长胜、崔田民、张秀山、刘景范、崔田夫、罗迈。蔡畅和罗梓铭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执委会又选出郭洪涛为边区党委书记，我当选为妇委书记。

这一阶段，延安的妇女工作，基本对象是农村妇女，还是沿用江西中央苏区时的办法，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发动支前工作。支前一个首要任务是动员妇女送丈夫、儿子参加红军。扩大红军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陕北地广人稀，扩红工作难度很大。尤其是家属的工作难做。各级妇女部要配合做妇女工作，通过讲革命道理，表彰先进，典型带动，组织代耕等等形式，打通妇女的思想，使她们不拉丈夫和儿子的后腿，并积极主动的送亲人参加红军；另一项任务是动员妇女将粮食、蔬菜、羊、鸡等等主、副食品支援红军；第三是组织妇女为红军缝衣、做鞋、做袜、以及组织妇女洗衣队、救护队等等。

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陕甘宁边区地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处，经济、交通、文化都比较落后，社会比较闭塞，封

建习俗比较浓厚，妇女都缠足，一般不下地干活，多数坐在炕上做针线和家务，带孩子。我们到陕甘宁后，突然增加了好几万人，吃的穿的都比较紧张，因此，必须发展农副业生产。而我们多次扩大红军，许多农村青壮年男子当了红军，劳动力也紧缺，就必须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这个工作也是相当艰巨的，要改变她们千百年的生活习惯很不容易。各级妇女干部深入到群众中，首先动员妇女下炕，第二步是放脚，第三步是洗澡和参加生产。我们在各区、乡成立了放足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妇女学习生产小组和劳动互助小组等等。组织她们学习生产技能。经过艰苦的细致的思想工作，边区有半数以上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据延安等6个县的统计，妇女学习生产小组有14500多个，参加的妇女有35594个人。她们帮助男人送粪、挑水、开荒、打土疙瘩等等。1937年春，全边区开荒45700多晌，平均每一青年劳动者包括妇女在内，开荒地一亩。

发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文化学习。为扫除文盲，各乡办了识字班和冬学，要求每个妇女每天认一个字到两个字。建立各级妇女代表会，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维护妇女权益增加妇女参政意识，妇女与男子同样参加各级政府的选举。有意识的培养妇女干部，使各级政府中都有妇女参加领导工作。

5. 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成为全民族的中心任务，全国出现了抗日救国高潮。这时，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妇女工作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工农妇女，而是要更加广泛的团结和组织各阶级、各阶层的妇女群众，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扩大统战力量。过去妇女代表会的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的要求，必须建立以工农群众为核心，广泛团结

各阶层妇女群众的组织。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要求在乡以上各级都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建立各级妇女联合会，就成为我们妇女干部当时的中心工作。

1937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由李见珍、蔡畅、丁玲、史秀云等15人为委员的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备会，由我任主任，史秀云为副主任。在筹委会的领导下，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延安、延长、延川、安塞、甘泉、富县、保安、固村等10多个县及所属区、乡都选出了妇女代表，成立了县、区、乡各级各界妇女联合会。1938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和西安妇女代表，也应邀参加了该次大会。大会推选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面的著名人士蒋中正、林森、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林伯渠、朱德、邓颖超、宋美龄、郭洪涛、李见珍、张国焘等20多人为名誉主席团。毛泽东、郭洪涛在大会上讲了话。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了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史秀云任主任，张子芳任组织部长，刘素菲为宣传部长。大会开会期间，我已离开延安到东南局，但大会仍推选我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许多进步爱国的女学生和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一些同志的爱人也从白区来到延安，延安各机关增加了许多妇女干部。协助干部们解决恋爱、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也是妇女部的日常工作之一。记得陈少敏从白区来到延安，江青也在同一时期来到延安，中央要我们妇女部开个会，欢迎她们，并在合作社请她们吃饭，合作社的主任是杨厚珍（罗炳辉夫人），由她操办。这餐吃的是土豆烧牛肉，毛主席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参加了，毛主席还讲了话。

6. 三进中央党校

为了培养妇女干部，中央决定送一批女同志到苏联去学习，以提高她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记得当时中央决定送苏联学习的有：刘群仙、金维映、林彪的妻子（陕北人）和我，还有些名字记不起来了。苏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祥地、列宁主义的故乡，能到苏联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当然是很好的。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和培养，能得到这个学习机会的女同志也是很少的。但我考虑自己是个土包子，连中国的文化都没有学好，到外国去语言不通，外文又不认识，怎么学呢？学不好辜负了党的培养，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别的同志。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组织上谈了，提出：“不如让我在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组织上经过研究，同意我留在延安进党校学习。这样，我就没有去苏联。没有料到，刘群仙、金维映去了苏联后遭到不幸。苏德战争爆发，她们的下落不明，结果一个也没有能够回来。李维汉在世时，有一次来广州，我去看他，他还跟我谈起金维映，他很有感慨地对我说：“幸好你那时没有去苏联，不然，就没有今天了！”

1937年底，我第三次进中央党校学习，前两次进党校都因为有事，半途而废，没有学成。这次我决心集中精力，认真学习，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文化水平。进党校的手续刚办好了，各种关系都转到党校了，谁知又有了新的任务，这次学习又吹了。以后我就再没有进学校学习的机会了，我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学不成，死不了。”

第七章 奔赴华东抗日前线

一、参加新四军改编

1. 到长江局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抵抗日本的侵略，党中央于7月15日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声明：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将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等。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项英遵照中央指示，代表我党到武汉与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问题，进行了反复谈判、协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将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承认给予这个部队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为了尽快将上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恢复和建立南方党的组织，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一批同志到南方去工作。1937年冬，项英和陈毅来到延安，他们提出最好派一些原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同志回去，并指名要曾山、邓振询、罗梓铭和我回去。中央妇委委派我主管东南地区的妇运工作。

12月下旬，在项英率领下，曾山、邓振询、罗梓铭、李见珍、李华楷、朱辉、钟云清、陈世富等一行，告别了延安，取道西安南下，几天后到达武汉。中央在武汉设立了长江局，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夏之栩、钱英、钱之光、孟庆树等同志都在长江局工作。我们一到武汉，立即到长江局报到。周恩来亲自为我们安排了食宿，并让我们在武汉集中学习了几天。主要学习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学习党的纪律和一些军事斗争常识。长江局的同志向我们介绍南方各游击区的基本情况，组织我们讨论研究如何集中和整编游击队，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坚持抗日斗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等问题。并要求大家要做好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思想准备。

我们和长江局的同志们在一起，过了一个热闹而又愉快的春节。春节过后，我们便分赴大江南北各地。罗梓铭去了湖南，张爱萍去了大别山，曾山、邓振询和我经九江抵南昌。

1938年2月，我们到达南昌。此时，新四军军部已经成立，并在南昌建立了新四军办事处，主任是黄道。办事处是公开对外的机关，在党内成立了东南分局，直属长江局领导，分局的书记是项英，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黄道、军事部长陈毅、民运部长邓振询，我是妇女部长。

2. 新四军一支队的改编

南方各游击区，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与外界隔绝。游击队的领导同志，不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也不了解党中央政策的改变，对国共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理解，因而使游击队的集中和改编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困难。项英、陈毅为了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组织各游击队下山改编，做了大量联系和说服教育工作。陈

毅还亲自到湘赣边游击区去，向游击队的同志，讲解国内外的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解释党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必要性，和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形成的现实，使游击队的同志能够自觉地、愉快地带部队下山接受改编。新四军军部成立后，原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发表了《告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号召南方八省各红军游击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接受改编。

我们到南昌后，即分别到各游击区去做集中和改编工作。振询和我到了赣南大庾、信丰和粤北南雄的油山游击区。当时赣南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是杨尚奎、刘符节，秘书是严重（原名陈志华）。我们协助杨尚奎等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把这一地区的游击队集中到大庾池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一支队队部亦设在池江。在改编时许多老红军对红军改用国民党军队番号，思想很不通。家属的思想也不通。这种思想感情也是很自然的。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整天对游击区进行清剿，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血海深仇还没有报，现在却要将自己的部队变成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一下子实难接受。有的同志又耽心部队在未打日本之前，就有被国民党军队零星消灭的危险，而实际上有些部队在谈判中吃过这个亏。家属们过去吃尽了苦头，害怕部队开走以后，安全没有保障，有的家属就哭哭啼啼的。振询就反复向同志们解释和宣传党的政策，我就去做家属的工作。我们的红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深明大义，只要他们了解了国内外的形势，并确认改编是党中央的决定，最后还是愉快地自觉地接受改编。

在油山工作时，我住在一农民家里，他一家对我非常热情，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还认了他家的大娘做干妈。临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直到“文革”期间，老人去世。

3. 新四军二支队的改编

一支队组建后，我们返回吉安，吉安已成立新四军办事处，卫玉平任主任。我们和温仰春、李桂英4人从吉安出发到瑞金。我们带着新四军二支队的番号、关防、军费及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的委任状等到瑞金找谭震林，然后一起赴福建省龙岩，完成二支队的改编。我们一行的公开身份是：邓振询是新四军副官，温仰春是秘书，李桂英和我是护士，我们分乘两辆小汽车，车上插着新四军的旗帜，经南丰到广昌。在广昌住了一晚，第二天经石城到瑞金。一路通行无阻，但到了瑞金却出了麻烦，一到瑞金就听老百姓传说，新四军被抓了，我们就在瑞金城外一个小旅店住下。第二天，温仰春说：我先去和国民党交涉，如果10点钟我还不回来，就可能出问题了。我们在旅店等到12点钟，还不见他回来，就估计出事了。我们就把随身带的文件藏在瓦片下面。果然，不一会国民党的别动队来了，把我们的住处搜查了一遍，连人带东西一起带到河对面的一个小学里，把我们拘留起来，我和李桂英住在楼上，男同志住在楼下。谭震林在我们之先，已被拘留在楼下。我们与国民党别动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他们这样做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违反国共两党共同达成的协议，并指出他们此举要负延误新四军集中开赴前线抗日的严重责任，别动队长以没有接到上级命令，要请示报告为由，不肯放行，将我们扣留了一个星期。当时，瑞金的县长比较进步，他给我们南昌办事处发了个电报，曾山派人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进行交涉，加上社会舆论的谴责，他们才被迫向我们赔礼道歉后放行，扣留的东西也全部还给了我们。

离开瑞金，我们一行赶往福建龙岩。邓子恢、张鼎丞、方方、范乐春都在龙岩。他们都是我们在闽西时期共同战斗过的老领导，老战友，我随中央红军长征去了陕北，他们则留在根据地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大家在不同的战场上生死搏斗。今

天，居然却活着在旧地重逢，真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和范乐春两人抱在一起，热泪直流，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在龙岩，我们协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同志完成了新四军二支队的组建工作，并建支队部于龙岩，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到新四军军部去工作。这时，拟在闽粤赣边区成立潮梅特委，由方方任书记。方方要我到潮梅特委去工作，曾山不同意。我便和振询一起回江西，又到油山地区去了一趟，然后回到南昌，参加重建江西省委的工作。

4. 闽西妇女的杰出代表范乐春

范乐春是闽西永定县金沙乡人，出身贫苦，少年时父母相继去世，被迫到地主家当婢女。1928年参加张鼎丞领导的金沙暴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永定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等职。她曾出席第一、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在闽西苏区范乐春和我都是职务比较高的女干部，她一直在政府工作，我则在党的机关工作。1934年她调到瑞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担任优待红军局的局长。范乐春没上过学，但她很聪明，又刻苦学习文化，从文盲提高到会看文件，写报告，还练出一手好毛笔字。同志们问她为什提高得这么快，她说：“铁杆磨成针，全靠有恒心。”她在工作中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很有魄力，在闽西的干部和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红军长征时，为了革命的利益，她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和丈夫林伯渠分别，被留在苏区。她回到永定，担任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在数倍于我的敌人残酷的清剿下，领导永定县人民坚持斗争。1935年初，陈潭秋、邓子恢、张鼎丞等在永定会合，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她当选为委员兼妇女部长。由于她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在游击队生活极其困难时，

她设法为部队弄到粮食、鞋子、医药和安置伤员，同志们称她是“部队的好后勤”。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里，她出生入死，成年累月，穿丛林、睡山窝、吃野菜、什么样的苦她都吃过，再大的困难也没有难倒她，她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坚定不移，革命到底。

新四军二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后，组织上决定范乐春留在闽粤赣边区，和方方、魏金水等同志一道，继续领导闽西人民的抗日斗争。闽粤赣特委成立后，她任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并兼任二支队永定留守处负责人。1939年，她终因长期艰苦的生活和劳累，患了肺病，当时没有医疗条件，而她仍抱病坚持工作。1941年5月，她与世长辞了，时年39岁。范乐春同志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闽西妇女的杰出代表，人民将永远纪念她。

二、在江西省委

1. 重建省委的工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那时江西各地党的组织曾得到很大发展。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后，国民党政府在江西实行白色恐怖，反复清剿，留下来的红军在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领导下，被迫转移到边远山区坚持斗争，党组织始终保持。但在城镇中心区域，党组织则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损失殆尽。我们一行从延安来到江西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分赴各地集中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同时，即与各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着手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在新四军开赴皖南前线后，各游击区与中心城市都建立了新四军办事处或通讯处（留守处）。这些公开的合法的机构，一方面是新四军的后方机关，为新四军筹措物资、补充兵员等工作；另一方面，这些机构也是党组织的秘密联

络点或党的机关，担负着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以及与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建立联系等方面的工作。

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分局从南昌撤到皖南后，在南昌成立了中共江西省委，曾山任书记，邓振询任副书记兼民运部长，刘符节任组织部长，薛尚实任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秘书长，我任妇女部长。不久，曾山去延安汇报，由郭潜接任书记。我和振询住在三眼井，省委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成立的。以后，我们搬到公园旁边，和薛尚实、郭潜、李健（郭妻）、邱一涵住在一起。省委机关是秘密的，为了安全起见，薛尚实和邱一涵扮着假夫妻。同年秋，传说日本侵略军将沿南浔路向南昌进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搬到吉安，我们省委也搬到吉安。在吉安我们住在一个祠堂里，公开挂的牌子是“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在吉安住了不久，省委又搬回南昌，后日本侵略军进攻南昌，省委全体干部撤退到金华。在金华由曾山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我没有参加），经讨论决定郭潜、涂振农、李健（以上3人以后均叛变）回江西，坚持江西省委的工作，由郭潜任书记，其余干部到皖南。

2. 抗战初期的江西妇女工作

从1938年2月到1939年3月，党在江西的妇女工作，由我负责。这期间，先后在东南分局和江西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同志，我记得的有：邱一涵、李健、邱淑燕，一个叫阿温的，还有一个是薛尚实介绍来的是广东梅县人，名字记不起来了。妇女部的工作分公开和秘密两个方面。秘密工作由我和邱一涵抓，公开工作由李健出面。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战。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组织工作。在党内我们各级党委建立了妇女部，通过妇女部领导该地区妇女群众的抗日运动。妇女部的同志通过各种形式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组织妇女群众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并从

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女党员。公开的工作是，建立广泛的妇女群众组织，我们建立了“妇声社”，吸收抗日的女工、女学生、女职工参加，这实际上是妇女部的一个外围组织，是公开的群众团体，妇女部派李健与之联系。通过“妇声社”这个群众组织，再进一步去组织宣传和团结更广泛的妇女群众。当时“妇声社”在南昌就团结了四、五百名各阶层的妇女，为前方抗日战士制作急救包，鞋子、军衣、袜子等军需品，支援前线，在南昌影响很大。

当时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成立了“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在上层妇女中开展抗日宣传，组织上层妇女为抗日募捐，慰劳伤兵，教妇女识字，救济难童等等。他们做上层妇女的工作。我们“妇声社”则主要做中、下层妇女的工作。

二、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三·八”妇女节，我们创办了《妇声》双月刊，以这份刊物作为我们的宣传阵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动员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良、雷洁琼等都为《妇声》写过文章，这个刊物在江西很有影响。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说《妇声》是共产党的刊物，要加以限制并企图取缔。有次宋庆龄和何香凝来南昌，我们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她们反映。宋庆龄在公开场合说《妇声》这个杂志，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抗战，办得很好，要继续办好。宋庆龄讲了话，国民党省党部没有办法，只好让我们继续办下去。这样使《妇声》在群众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后来，国民党的妇女生活改进会也创办了《江西妇女》月刊，在1939年“三·八”妇女节创刊。我们除了办刊物之外，各级妇女部和“妇声社”还组织人到工厂农村，把党的抗日主张深入宣传到群众中去。

三、统战工作。上海、南京失陷后，有许多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先后来到南昌，如李德全、许广平、史良、胡子婴等，她们一般是公开参加妇女生活改进会的活动，我们党组织也与她们有

联系，她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大的支持。如当时江西各界妇女为抗日将士捐献了一批经费、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国民党政府不愿将这些物资分给新四军。我们一方面通过新四军办事处与国民党交涉，另一方面通过李德全、史良、胡子婴等社会知名人士的活动，和大造社会舆论，迫使国民党政府将部分抗日物资分给了新四军。

我们还派了一些党员参加妇女生活改进会，团结争取上层妇女对我们的合作与支持。在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里有我们的党员，记得其中一个党员叫高景芝。在许多县的妇女生活改进会里也有不少党员担任指导员的，如严永洁是景德镇的指导员，施月琴是吉安的指导员，还有位叫阿温的（名字记不起了）也是指导员，叶群是丰城县的指导员。当时，叶群是一个积极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她几次从丰城跑到吉安来找我，要求去延安，缠着我一定要介绍她去。我就给她写了介绍信，要她去找组织部长刘复节。她就这样去了延安。“文革”期间，她派人来找我，要我证明是我介绍她入党的，我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写了证明，证明是我介绍她去延安，但我不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没有按她的要求写，她便指使人刁难我，后来周总理来广州，为我讲了话，才算完事。

3. 江西青年抗日服务团

抗战初期，京、津和京、沪一带的大批青年学生来到南昌，他们爱国热情很高，积极要求参加抗日工作，许多青年跑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向我们表达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和要求参加工作的愿望，经黄道主任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组织“江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以安置流亡青年。江西省政府也正对这数以千计的流亡学生安置问题一筹莫展，熊式辉同意了黄道的意见，“江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就借熊式辉的招牌成立了，并分散到各地开展活动。青年服务团里有不少党员，我们在各个大队建立

了党支部，由东南分局领导，以后由江西省委领导。振询是东南分局和江西省委的民运部长，此事是他抓的。这批爱国青年深入到工厂码头、乡村去演讲、演戏，教群众唱抗战歌曲，出墙报、写标语，使江西各地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通过这些活动，党组织在其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我们还办了几期党训班，培训新党员。党训班的工作由我兼管，学习结束后，有些人转送到新四军。

那时，蒋经国在赣州任专员，他也办了一些训练班，与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开始到江西时，他们不理，后来看到青年服务团的作用和影响后，就跟我们争夺。蒋经国拉走不少青年，有些人后来跟他去了台湾。熊式辉也从青年服务团拉走一些人，送到武汉。有的到了武汉不堪忍受他们的政治欺骗和迫害，又回到江西，这些人在江西不便公开活动，我们将他们送到新四军。

三、到东南局妇女部

1. 撤出南昌

1939年3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南昌，国民党军政当局推行“焦土抗战”政策，下令火焚市区，仓皇撤走。我们在南昌沦陷前3天分两批撤离，邓振询和我还有薛尚实、谭启龙、严永洁，郭潜是第一批撤出的，曾山、涂振农等第二批撤出。我们从南昌乘火车到浙江金华，火车上人很多，秩序很乱。在金华下车时，发现我们随身所带的行李，包括衣服和日常用品等物，全部被人偷走了。在撤出南昌时，谭启龙和严永洁两人经组织批准，宣布结婚。他们的婚礼就这样在战乱中举行了。到了金华，我们两手空空，连条洗脸的毛巾都没有了，弄得我们好狼狈。第二天，曾山来了，幸好他带的有钱，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套衣服，一条毯子和洗漱用品。在金华稍为停留，便直奔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

地。先到新四军后勤部所在地沙河口，得到后勤部长罗湘涛的热情接待。在这里我们全部换上了新四军的军装，尔后便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东南局机关设在丁家山，离军部不远，两天后，我们一行便到了丁家山。

东南局的前身就是东南分局，1938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改设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当时，武汉已失守，南方局设在重庆。东南局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书记项英、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黄道、军事部长陈毅，青年部长（青委书记）陈丕显，妇女部长（妇委书记）原是章蕴代理，我去后由我担任。

2. 东南局妇女部

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的同志，我记得的有章蕴（后调苏南工作）、邓六金、严永洁、谢志诚、程桂芬、曾之平等。章蕴、邓六金和我年纪大些，被同志们尊称为“新四军三大姐”，按年龄大小排列，称为“李大姐”、“章二姐”“邓三姐”。自此以后，无论党内同志，党外朋友。均称我“李大姐”。妇女部除我们3人外，其余都是抗战时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她们年轻、热情、活泼，有文化，积极上进，为了更好地培养、锻炼她们，我们尽量找机会让她们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记得1940年初，日寇在溧阳、郎溪、广德一带频繁扫荡，使这一地区成为敌、伪、顽、我四股力量同时并存的游击区。妇女部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一地区情况，以利开展妇女工作，派秘书程桂芬到该地区作一次详细的调查。小程冒着生命危险，到该地区紧张地工作了一个多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妇女部提供了大量的具体材料。小程得到了同志们的赞扬，我们提拔她为东南局妇委委员。

这些青年同志跟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她们碰到了困难或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都找我谈心，包括她们的婚姻、恋爱问题

也愿找我参谋参谋。有时她们也向我提些意见和建议。1940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将到，东南局的一个报纸约我写篇纪念文章，妇女部的同志大家在一起研究文章怎么写好，在讨论时，曹之平说：“大姐，你的名字‘建贞’有点封建，不如改成‘坚真’好了”（我不名李见珍，在陕北时，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曾访问过我，在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我一段，这本书在翻译成中文时，把我的名字译成李建贞，以后我的名字就变成了李建贞）。曹之平的建议立即得到那几位姑娘的赞同，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好！同志们都说你原则性强，办事公道，你就改成‘李坚真’吧！”我觉得这班青年人给我改名字是对我的鞭策和期望，反正‘坚真’和‘见珍’的音差不多，用‘坚真’之名可勉励自己，就对她们说：“接受你们的建议，改就改吧！”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这篇文章上第一次以‘李坚真’署名。从此，我就用李坚真这个新名。

我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时，振询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1940年初，他调任苏皖区党委书记。随后，我也调离东南局妇女部，离开皖南到了苏南。

1983年初，我有幸到皖南旧地重游，参观了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凭吊皖南事变中为国牺牲的同志，感慨万千，写下一首山歌，以志纪念：

云岭横空气势雄，

军民九死斗顽凶。

七千壮士血流尽，

朵朵杜鹃遍地红。

——访新四军军部旧址有感

第八章 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一、在苏南根据地

1. 到上海治病

我到苏南后，就在苏皖区党委做妇女和群众工作。不久，我发现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区党委安排我到上海去医治。我和朱明一起去了上海，新四军驻上海联络处的同志已为我联系好医院，一到上海就住进了医院，经检查是患了甲状线腺瘤，在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当时，上海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着，医院不能久住，组织上便安排我住在刘宁一家里。刘宁一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大新公司写字间的职员。他刚和李淑英结婚不久。李淑英从8岁开始就在纱厂工作，也是地下党员，在工厂做工人运动。他们两人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房间里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一些零星生活用品。我去后，他们就把床让给我睡，晚上他们俩就打地铺，睡在地板上。那时，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组织上规定一天一角五分钱的菜金。李淑英给我安排，早餐二分钱豆办咸菜，一分钱一碗稀饭，中午五分钱猪肝或瘦肉二分钱青菜，还有面条。她把肉菜洗净切好，和面条、水、煤油炉一起放在床边，他们白天上班，不回来，我就自己煮面条吃，他们晚上回来一起吃饭。他们对我照顾得很周到，真比亲人还亲。有一次李淑英说：“大姐我陪你到大街上去逛逛”。我说好，当天晚上，李淑英帮我把头发卷了卷说：“大姐，你到大街上走慢点，免得引起别人注意！”第二天我们梳洗打扮了一下，就一起

上街，刘宁一走在前面，我和李淑英并肩走在后面。我穿上旗袍，走起路来很不自然，开始还记着要慢慢走，走着走着就忘了，步子越来越大。李淑英忙拉拉我的衣服，低声说：“慢点”，一路上提醒我好几次，把他们两人弄得好紧张。以后，我不敢再上街，老实待在家里养病。我在他们那里住了三、四个月，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病好后，我便回苏南根据地去了。

我回到苏南不久，即发生了皖南事变。同年夏，我再次到上海去检查手术后伤口的情况。我和田文一起去的，住在上海静安寺路江西会馆，这里是新四军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楼下开了一个商店，我们住在楼上。联络站的负责人是杨彬。有一天，我一个人乘电车到南京路去，我觉得车上有个人似乎在注意我。我便在大新公司站下了车。果然，那人也跟着下了车，我走进永安公司，他也到了永安公司，我警惕起来，就到一个酒吧间，他又跟来了。我得想办法甩掉他，就又转进大新公司，又看见他在远处盯着我。我挤进人多的地方，在群众中转来转去，然后从另一个门出去，跳上一辆黄包车，叫车夫拉到黄埔江边，把那人甩掉了。然后搭车回江西会馆。回来见到杨彬，我还没开口，他就笑嘻嘻的说：“你还行，把尾巴甩掉了”。我奇怪，他怎么会知道了，就说：“你的消息真灵通，我还没说，你就知道了？”他说：“我当然知道”。原来那个人是杨彬派去保护我的，一是怕我一个人出去不安全，二是想试试我能否应付上海这个复杂的环境。想留我在联络站帮助他们做些联络工作。因皖南事变后有些新四军的同志突围出来，辗转到上海找组织，联络站要负责收容和安置这些同志，人手不够，组织上就要我暂时留在上海帮助联络，将这些人转移到根据地去。这样我便在上海住了半年多。同年冬，振询来到上海住了几天，我便随他一起去苏北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

2. 到新四军军部

在去苏北途中，经过丹阳，当时陈光的部队驻在丹阳武进一带，陈光派了一个警卫班（有六七个人）护送我们去苏北。

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刘少奇和陈毅都住在军部。老邓是来向华中局领导汇报工作的，我这次仅是陪他一起来。老邓汇报完工作后，在等着参加华中局扩大会议。我们就一直住在新四军军部。1942年元旦前夕，陈老总问我：“明天过元旦，大家改善一下生活，你给我们做点米粉肉吃，好吧？”

陈老总将了我一军，我还从来没有做过米粉肉，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不会做！”

“你这个江西媳妇，不会做米粉肉？老邓！和她离婚。”陈老总冲我开玩笑地说。

“陈军长，你等着，明天晚上我一定学会做一碗香喷喷的米粉肉给你吃。”说罢我就急忙去找炊事员，向他们请教米粉肉怎么做法。

第二天，我到伙房忙开了，吃晚饭时，果然蒸出一大碗香喷喷的米粉肉，我端到桌上，跟陈老总说：“陈军长，你尝尝我做的米粉肉好不好吃，这回你该不叫老邓跟我离婚了吧？”

陈老总拿着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在嘴里边吃边说：“好香！好吃得很！你这样的媳妇，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哪个敢要老邓和你离婚哟！”

大家有说有笑，美美地吃了一顿米粉肉，高高兴兴在一起迎来了1942年元旦。

2月，华中局在阜宁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振询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代表苏皖区党委作了《关于苏南工作情况》的报告，向大家汇报了江南一年来的斗争情况。会议结束后，我们即离开苏北回江南。

这时正值春节前夕，天气很冷，我们冒着鹅毛大雪，一路南

行。过了长江，在津浦铁路沿线，日寇架了电网，筑了碉堡。我们随行带了一个警卫班，约有七、八个警卫战士，他们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大的也只二十来岁，但个个都很机警、灵活、勇敢。在他们护送下，我们顺利地过了敌人的封锁线。阴历年三十这一天，我们到了丹阳附近的运河边，因没有与游击队联系上，找不到渡船，河面约有三、四十米宽，水深约一米多。振询是“旱鸭子”，不识水性，怎么办？振询说：这里离津浦路很近，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大家互相扶着涉水过河。警卫战士不让我们两人涉水，说什么也要背着我们过河，王新民背着老邓，巢玉祥背着我，其他几个同志在两旁扶着他们两人，就这样安全过了运河。过河后，大家的衣服全都湿了，冷得发抖，又不敢停留，只得穿着湿衣服连夜赶路。到拂晓时，才与游击队取得了联系，游击队把我们带到老乡家，老乡烧了一堆柴火帮我们把衣服烤干。这天正是大年初一，在老乡家吃了一顿年饭，然后启程回到区党委所在地溧水。

3. 苏皖区党委党校

1942年冬，我到区党委党校任校长。当时各县委、地委以至区党委，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年轻干部，年龄普遍在20岁上下，区党委对这些青年干部的培养十分重视，轮流安排他们到区党委党校学习或到各地的训练班作短期训练，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在我刚到党校不久，上海党组织给苏南根据地送来了300多名青年学生，区党委安排这些青年学生到党校学习。这些青年大都是刚跨出学校门的大、中学生，他们要求进步，抗日救国热情很高，怀着强烈的爱国心投奔到新四军来。但这些青年学生刚到我们队伍里，许多东西不习惯，生活上比较散漫，自理能力差，工作学习上有一些自由主义的表现。那时，党校与区党委机关一样，都是随部队活动，部队到那里，我们就跟到那里，没有固定的地

点。这种经常流动的生活，他们一时难以适应。晚上睡觉时，衣服、鞋子乱放，一吹起紧急集合号来，这个找不到衣服，那个找不到鞋子，背包也不会打，乱作一团。因此，有些同志就认为这些青年人自由、散漫，看不惯他们。但我喜欢这些青年人，我觉得他们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走出家庭，积极投奔革命，这股革命热情就非常可贵。我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我很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缺点，我认为应该热情帮助，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使他们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经过实践锻炼，他们就能为抗日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开始，他们不会打背包，我们就手把手教他们。他们亲眼看到我们打背包时那熟练而敏捷的动作，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打出既结实又方便的背包，都暗暗惊叹。我告诉他们，打背包事虽小，但都是每次军事行动中最先要做的一件事，平时多练本领也就有了。以后他们也很快学会了，行军时，我们就发动一些部队的战士一起帮助他们背行李。到宿营地，又帮他们到老百姓家里找门板、稻草。平时，多到他们中间走一走，与他们谈心，提高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与纪律的认识。尽量为他们解决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困难。当时，除了区党委党校以外，各地区办了许多青训班，为党培养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训练，这些青年都被分配到各级党政机关工作。我记得有一个在党校学习的青年，开始到党校时生活和其他各方面都很不习惯，他又是一个深度的近视眼，视力很差，离开了眼镜就寸步难行。我就在生活上多方面去关心他，常常跟他谈革命队伍以及周围同志中的动人事迹，他很受感动，后来进步很快，不久就入了党。这个青年写东西也写得很好，后来在茅山根据地内一个区当区委书记时牺牲了。这些人当中有些为革命牺牲了，有些现在成了领导骨干。

二、邓振询在皖南和苏南的工作

1. 皖南特委书记

1939年初，我们一道从南昌撤到皖南后，振询即担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

皖南特委的前身是皖浙赣省委。1938年初，新四军军部从南昌搬到皖南泾县云岭以后，皖浙赣省委遂改为皖南特委。特委机关设在泾县白果树，由李步新任特委书记。振询调任特委书记后，李步新转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桂英任妇女部长、欧阳惠林任秘书长。

当时的皖南是一个情况比较特殊的地区。既不同于苏区，又不同于白区。有些地方虽是新四军驻防，但政权都是国民党的。我们党的活动也不能公开。皖南特委和东南局对外都称“民运部”，以新四军的名义为掩护进行活动。因此，开展地方工作受到很大限制。群众要求参加新四军，我们收了，国民党就诬蔑我们破坏“兵役法”；群众要求减租减息，他们又诬蔑我们违反“政令”。在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振询同志以其丰富的民运工作经验，根据党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善于运用合法斗争。通过各种方式，很巧妙地发动减租运动，把皖南新四军防区内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支持抗日战争。

振询同志在皖南特委工作期间，一方面把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在他和特委的同志努力下，很快就建立了徽州（今安徽歙县）、南（陵）芜（湖）宣（城）两个中心县委和泾县、南陵、繁昌、青阳等几个县委。另一方面，他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组织青年、妇女等抗日救亡团体以及广大爱国群众参加抗日自卫队、担架队、妇女慰劳队支援前线，配合新四军主力在战场上打击日军。当时，每天还有不少

由南昌、武汉、上海等地的青年学生来到皖南，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振询和特委的同志总是热情接见这些怀着满腔热血从外地来的爱国青年学生、大力开展扩军运动，不断吸收他们参加新四军，为新四军第一、二支队输送了不少干部和战士。

1939年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赴江南敌后去，于11月在溧阳县水西村合并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同志任指挥、粟裕同志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从此，开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时期。同年12月，苏南地区党的领导机关——中共苏皖区党委也在金坛县成立，统一领导苏皖、苏南、苏北三个特委。为了加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陈毅同志要求，1940年3月，东南局派振询到苏南，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

2. 苏皖区党委书记

振询到苏南的时候，正是苏南抗日根据地创建阶段，斗争异常艰苦。苏南抗日根据地是党领导新四军和人民群众在华中敌后最早开辟的一块根据地。它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和皖南、浙西的一部分。这个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工商发达，水陆交通便利、素称“鱼米之乡”，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就在这时候，汪伪在南京粉墨登场，公开成立伪国民政府，配合日军加强敌后扫荡。同时，国民党顽固势力加紧军事反共、企图胁迫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退出溧（阳）武（进）公路以南地区，因而反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由于日伪和顽固派的力量在苏南占绝对优势，加之长江和铁路的封锁，苏南军民一直处于敌顽的夹击之下。因此，决定了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呈现出的艰苦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振询到苏皖区党委不久，领导江南抗战的陈毅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坚决执行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不愿在磨擦中消

耗抗战力量，于7月初亲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其主力部队北渡长江，投入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此时，坚持苏南敌后斗争的领导重任，就落在振询肩上。随后，他和罗忠毅、廖海涛3人组成江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的全面工作，振询任书记。

在困难环境下，振询沉着应付，他根据党中央的《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和陈毅关于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积极发展进步势力，首先动员青年参加抗日部队，充实加强了留在江南的新四军二支队主力部队，几个月间，二支队领导的武装已从2000人增加到4600多人，并建立了茅山独立团、丹北独立团、太湖独立团及第三游击区独立营、金（坛）武（进）宜（兴）自卫团等地方抗日武装共4900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江南各地共发展党员8000人，有组织的民众约10万人；积极加强党的建设，举办了三期党训班，并亲自给学员作报告，上党课。各县委也普遍举办了支部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地方干部，使基层干部地方化；争取中间势力，召开了三次较大的地方士绅会议，讨论流通券、征收公粮、动员地方武装、改革保甲制度、减租等问题，同时在会议上解释了一些误会，检讨了各地行政工作，争取了地方士绅和一些帮会组织。此外，还建立多个边区县的抗敌总会，在有群众工作基础的部分县、区建立了抗日自卫会，作为代理政权机构、使苏南抗日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

皖南事变以后，苏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组织进行了全面调整。政权方面，迅速公开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将原来的抗敌总会、自卫会等代理政权队组成23个县政府，并成立江南行政委员会，下辖6个专员公署。军队方面，成立了新的江南指挥部，谭震林任指挥，统一指挥苏南新四军。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苏南部队为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党组织方面，将苏皖区党委改为江南区党委，振询任书记，下辖南路、东路、路西北、路

西南、浙西北、苏皖 6 个特委。

这一时期，也是苏南抗日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的一个阶段。日伪军相继对苏南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封锁南北交通，在封锁线内所有市镇建立据点。在占领区内强化保甲等伪政权组织。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在清乡区以外积极进攻日伪军据点，破坏公路桥梁，给予日伪以有力打击。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根据华中局和军部的指示，1941年8月，十八旅主力奉命北渡长江，振询随十八旅主力渡江进入苏中地区。但是，苏南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也付出了很大代价。1941年11月底，日寇集中步骑炮3000余人，袭击驻溧阳塘马的我新四军苏南部队六师十六旅，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率领部队英勇阻击，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经过血战壮烈牺牲，部队也伤亡200多人。

1942年1月，振询代表江南区党委出席了在阜宁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苏南工作报告》，汇报了苏南抗日根据地一年来的斗争情况。这次会议确定苏南党和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用一切方法坚持苏南的斗争和阵地，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多交朋友，孤立敌人。在武装组织上应使主力地方化，并加强发展地方武装，注意培养与训练地方干部。会后，江南区党委重新改称为苏皖区党委。华中局派江渭清任十六旅政委，并兼任苏皖区党委书记，振询任副书记。此后，苏南根据地得到迅速恢复。1942年秋，茅山地区开展了以秋收减租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仅江句、溧阳、溧水、金坛、茅山、丹阳、镇句、句容等8个县就组织群众48000人，减租米186万余斤，减息30万元。向西恢复了横山地区，到年底，横山地区共有11个县政府和一个相当于县政府的行政办事处。与此同时，苏南新四军主力也增加到5600余人。

为适应苏南抗日根据地斗争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1943年3

月18日，由振询同志主持，在溧水县蒋家村一所小学里，召开了苏南各县县长联席会议。会上，樊玉林作了题为《苏南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的报告。会议决定成立苏南行政公署，选出江渭清、邓振询、王必成、吴仲超、魏天禄、李坚真、欧阳惠林、朱春宛、樊玉林、李建模、张之宜、诸葛慎、蒋铁如等13人为行政委员。为了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苏皖区党委正副书记江渭清、邓振询分任苏南行政公署的正副主任，区党委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行署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还总结了几年来苏南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讨论研究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敌后抗日民主运动，发动群众，改造基层政权等措施。随后，颁布了《苏南施政纲领》等各种条令法令。同年5月，苏南行政公署制订了《苏南行政公署暂行组织法》，任命欧阳惠林为秘书长兼文教处长，朱春宛为民政处长，李建模为财经处长，张雍秋为公安处长。在苏南根据地的中心茅山地区就建立了11个县政府和1个县级办事处，64个区政府，控制人口122万。至此，苏南抗日根据地自上而下都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政权体系。此后，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敌伪夹击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南抗日根据地已扩展到苏南全境和浙江、安徽的一部分，控制人口600万，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5万多人，成为全国较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坚持苏南抗日根据地，并使这块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苏南军民共同斗争所取得的，同时也是与振询等党政军领导人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认真贯彻上级党的指示，大力培养、依靠党的各级干部分不开的。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振询进入苏南后，与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努力，做了不少工作，作出了显著成绩。陈毅同志在苏南时，统战工作就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团结、争取了大批地方开明人士

参加了抗日的行列。1940年下半年，陈毅、粟裕挥师东进，挺进苏北，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黄桥战役对坚持苏南敌后斗争有很大的帮助。振询和江渭清以及其他区党委的同志根据陈毅的做法和经验，成功地把当时苏南较大的士绅如张干农、李友松、赵乡长都争取了过来。金坛的蒋铁如、朱春宛，茅山的樊玉林都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力量。1940年3月，苏南行署成立时，他们3人都被选为行署委员。但有时由于斗争环境的恶化，有些人也会动摇。皖南事变后，太湖地区有个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利诱下，思想产生了反复，振询听了当时的地委书记陈立平汇报情况后，亲自找这个人谈话，晓以大义，并揭穿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使这个人思想上有所转变，继续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对太湖地区的工作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振询在苏南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尤其重视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当时区党委及各特委（地委）、中心县委绝大多数干部都是20多岁，他从不因为这些人年轻而轻视他们，总是大胆使用他们，敢于让他们挑起重担，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有一次，上海党组织送来了300多位青年学生，有些同志认为这些人太年轻，看不起他们。振询却不这样，他还称赞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朝气，只是还缺乏经验。随后，振询安排他们进青年训练班学习，后来又把他们安排到各级党政军机关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同时，他还十分注意充分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大胆地把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这些地方干部在苏南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直到今天，他们中许多人还工作在各条战线的领导岗位上。

为了使苏南敌后各地能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振询十分重视报刊出版和通讯工作，以此作为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当时尽管困难重重，苏南敌后各地仍然有《民众报》、《太湖日报》、《长溇报》、《前进报》、《火线

报》、《江南党刊》、《江南通讯》、《青年团结》等十几种报刊坚持出版。

振询在苏南工作三年多，对上级领导同志和一道工作的同志十分尊重。与陈毅同志在一起时，他经常向陈毅请示工作。陈毅走后，他曾先后与谭震林、罗忠毅、廖海涛、江渭清等在一起担负苏南党政军领导工作，他们相互尊重，有事共同商量，关系极为融洽。振询对基层干部和战士群众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记得皖南事变后不久，苏南敌后形势恶化，区党委有一位干部不幸被捕，由于没有暴露身份，关押时间不长便被保释放了。当时一时无法查证他在狱中的表现，根据组织原则，振询没有马上恢复这个同志的党籍。而是一方面安排给他一定的工作，另一方面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当这个同志感到委屈时，振询又多次写信给他，叫他相信组织、正确对待，以革命利益为重。如有不理解的，可随时给他来信。后来这位同志经组织调查，把他的问题弄清楚后，恢复了党籍。他十分感激振询对他的关怀。由于振询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战士，大家都乐意接近他，觉得和他在一起工作心情舒畅。

振询参加革命后，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他平时有空就找群众聊天，帮助他们干活，和警卫员一起编草鞋，到伙房帮助洗菜烧饭。许多苏南的干部、群众都与他非常熟悉。他们都亲昵称呼他为“邓同志”或“老邓”。

3. 痛失亲人

1943年4月到10月，是苏南敌后斗争第二个最艰苦险恶的时期，日伪在敌后频繁“扫荡”，在丹北、茅山、太滬地区开始“清乡”；同时，国民党由浙西、皖南各地调集了13个团的兵力进攻我十六旅旅部驻地，侵占我两溧中心区，实行军事“清剿”。振询协助江渭清领导苏南敌后军民，对敌顽的夹击进行了英勇顽

强的反击，取得了反“清乡”斗争和两溧地区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在这一时期，区党委机关随十六旅旅部经常转换驻地，在南京、溧水一带穿插行动。

记得约在这一年的夏天，江渭清、振询和我带着警卫战士在石臼湖附近行动时，突遇日军。敌人用机枪向我们扫射，第一梭子弹打过来，江渭清的手臂中弹负伤。我们正忙着抢救江渭清，敌人接着又是一梭子弹射来，警卫战士巢玉祥非常机灵，神速拖着我和振询滚下山坡，结果，我们得救了，我的马被打死，马伕也中弹牺牲。警卫战士立即阻击敌人，一边叫我们赶快撤退。我们跑了好一阵，警卫连的同志打退了敌人的追击，见鬼子没有追上来，大家才喘了口气。在此之前，振询和我已认巢玉祥为义子，此后，玉祥就一直跟在我的身边，那时，他才十五、六岁。

6月上旬，顽军再次向新四军十六旅进攻。为保存有生力量，十六旅主力全部撤出溧水地区。振询随十六旅四十六团转移到横山地区行动，以配合清乡区内的武装，开展反清乡斗争。8月3日，部队宿营于江宁县冯潭庄，准备迎击“扫荡”之敌。因敌情变化，部队连夜转移，振询同志在渡秦淮河时不幸牺牲，终年39岁。

振询同志牺牲的时候，我不在他的身边。当噩耗传来，我悲痛的心情难以控制，一下子便昏了过去。他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在他牺牲后不几天，在江宁县周岗墟绿杨村举行了追悼会。由于当时敌情严重，原计划开的追悼会规模较小，但各界代表还是纷纷前往吊唁直至深夜。党政军民及地方开明人士都给他送了挽词，缅怀他的业绩，其中有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昔奔革命，今奔革命，中国共产党，功绩伟大。生为大众，死为大众，苏南邓主任，精神不死。”这充分反映了苏南人民对振询的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随后，振询的遗体就安葬在江宁周岗猴山上。

振询英年早逝。人们都为苏南失去了一位好领导而悲痛，为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而惋惜。振询自从参加革命后，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党指向那里，他就战斗到那里。无论是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建设中，还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无论是在延安工作时期，还是在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中，他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十几年如一日地为党埋头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后，苏南人民一直没有忘怀振询同志。每逢清明节，当地都有上千人前往江宁猴山为他扫墓。人们说：“过去他为我们吃尽千辛万苦，我们祭他就如祭祖一样。”（1957年4月11日《江宁日报》“本县各界1500余人祭邓烈士墓”）江宁县还在振询牺牲的地方建了一座桥，并以仲铭（振询原名）的谐音命名为“众民桥”。1983年，江苏省在南京隆重举行振询同志牺牲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江宁县县城修建了烈士陵园，在陵园内建了一个“仲铭亭”；1958年由江宁迁至南京雨花台的振询墓又作了重新修建，以志永怀。

1981年，我在振询牺牲三十八周年的时候，曾写了一首山歌，以作深挚的怀念：

秦淮河水急又深，面上无桥不留情。
三十八年如一日，波涛翻滚永奔腾。

秦淮河畔景色新，桥面通车喜人心。
冬去春暖明灯亮，四化建设日月兴。

三、再当县委书记

振询同志牺牲后一段时间，苏皖区党委一直随十六旅行动，

整天行军打仗。区党委为照顾我，派我到附近的溧水县当县委书记，并从区党委警卫班里派了两个年轻的警卫员和我同行，一个叫张司贵，一个是振询同志生前的警卫员王新民。这两个同志以后便一直在我身边工作，张司贵同志在解放后我回广东工作时才分开。临行，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欧阳惠林等一再嘱咐他们，到了溧水县后，一定要我好好休息一下再工作。

1943年9、10月间，日军出动三、四千兵力“扫荡”我茅山、两溧地区，国民党顽军却望风披靡，甚至还趁机进攻我新四军部队。几天之内日军连占广德、郎溪、宣城、溧阳四县。我刚刚到溧水县委，就接到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区党委要求县委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袭击敌人碉堡，以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部队迅速转移。情况容不得我有更多的考虑，行装甫卸，我便马上同县委和县政府的几位负责人商量。当时，溧水县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县长是曹明亮，各区都组织有少量的地方武装。经过商量，很快就作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作战部署。为了更有效地牵制、拖住敌人，我们制订了主动出击敌人的方案。区党委和十六旅考虑到我们兵力不足，还特地抽出一个主力连协同作战。这次战斗，由我和县委军事部长供田指挥，打得十分激烈。战场上，我想的只是如何完成这次作战任务。我一边指挥战斗，一边抄起时刻带在身边的两支手枪轮番地向敌人射击。其中一支枪是振询生前用的，他牺牲后，江渭清把这支枪给了我。刚刚失去了亲人的悲痛，在战斗中转化为对敌人的仇恨和力量。经过组织了十多次的进攻，我们才打退了敌人，掩护了主力部队胜利转移。

同年11月，新四军十六旅趁日军南进占领郎广等地，旅长王必成（此时十六旅属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栗裕、副师长叶飞、十六旅发展到5个团，江渭清改任十六旅政委）率四十八团尾随日寇，挺进广郎。十六旅很快就解放了溧阳、广德、郎溪等广大新沦陷区。不久，苏皖区党委、苏南行署、十六旅旅部即迁

至郎广地区，溧水则成为苏南抗日斗争的后方。

1944年春，我又被调到广德县（属皖南）任县委书记。此时，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县长是许道珍，当地人，是一个长期在本地开展斗争的地方领导干部，军事部长叫供田（又名谢震国，跟我一起从溧水县调来）负责领导郎（溪）广（德）游击大队。早在1942年，郎广中心县委就根据苏皖区党委的指示建立了郎广游击队，经过两三年的发展，游击队武装壮大到100余人枪，遂改为郎广游击大队，下辖几个中队，成为一支比较强的地方游击武装。在我任县委书记期间，新四军十六旅曾吸收了一个中队，编入主力部队。

当时，郎广地区是比较典型的游击区，有鬼子、伪军，也有顽军，“忠义救国军”也有活动，是敌、伪、顽、我力量同时并存的地区。日伪军，有时甚至顽军也加以配合，经常在该地区“扫荡”“清乡”，因比，我们流动性很大，差不多天天打仗，有时甚至一天打好几次仗。我们的任务是领导游击队和民兵骚扰敌人，配合主力作战。当地的群众很好，积极帮助我们侦察敌情，有时半夜还给我们通风报信。这年三、四月间，日军一个中队和一个伪军大队，配合精良装备到广德杭村“扫荡”，我郎广游击队配合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在杭村附近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敌70余人，还缴获了一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威力很大，是很好的攻坚武器。当时还不曾听说新四军有这种炮，因此非常振奋人心。日军此战失败，更兼丢了威力很大的大炮，羞恼成怒，接着对郎广地区进行了多次报复性“扫荡”，妄图夺回大炮，但都没有得逞。到同年8月新四军十六旅在苏浙皖边发动长（兴）、宜（兴）战役时，这门从日寇手中夺来的大炮真的发挥了威力。

在广德县委工作期间，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组织成立了当地的造纸业“工教会”（纸业工人救国会）和“农教会”（农民救国会）。

广德传统的造纸工业比较多，当时广德造纸业工人约有三、四千人之多，纸槽上千个（一般是每个纸槽4个工人）。过去，由于纸业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方（槽户）对工人剥削很重，工人生活很差，生产积极性很低，不时以怠工的办法反抗资方。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为了支持工人的合法斗争，增强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发挥纸业工人的抗战力量，于1943年底就成立了“工救会”组织。1944年2月，正式成立了县一级的工救会组织，从而增进了工人的团结。在此期间支持工人与资方进行了两次增加工资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为了保障资方应得的利益，我们协助劳资双方订出了工人劳动纪律和双方共同遵守的公约。这样，劳资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保障，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也支援了抗战，资方的利润也增加了。当地的开明绅士和资方（槽户）进一步了解了我党的政策，加强了我们的合作。

在农村，抗日民主政权不单是向群众征收公粮和税收，而且关心群众生产，减轻他们的不合理负担。县民主政府成立不久，领导“农救会”开展“双减”（二五减租、分丰减息）的斗争，减轻了地主豪绅对农民的重租和高利贷剥削，并对一部分穷苦农民主动免除捐税，这些措施深受农民欢迎，因而对抗日民主政权更加爱戴。在1945年上半年三次天目山反顽战斗中，广德县的支前工作做得很好，参加支前的民工人数是最多的一个县。这些民工日夜不停地运送公粮及其它物资上前线，把前方伤病员接回来，使前方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最终取得了反顽战斗的胜利。

四、在苏皖区党委组织部

1944年冬，我离开了广德，调苏皖区党委任组织部副部长兼区党委党校副校长。这时区党委书记是江渭清，吴仲超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党校校长是蓝荣玉。不久，又创办了“苏浙公校”，

江渭清兼任校长。1945年年底撤到苏北，在苏皖区党委开展了整风运动，我们主要是在党校参加审干工作。

当时，区党委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多数是曾经被捕过，脱离了组织关系，出狱后未恢复党籍的同志，或者是过去从事地下工作，刚从白区和敌伪据点撤出来的同志。当时有的同志由于受到党内整风运动“左”的影响，对这些参加整风学习的人有些看法，有不同意见。我认为，对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一定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帮助他们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牢记在闽西时周恩来对我的教导，对人的处理一定要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组织上对这些同志要关心、爱护、信任他们。要吸取闽西肃反教训，不要冤枉一个好同志。

以前和我在东南局妇女部一起工作过的小程（程桂芳），是1943年下半年在金坛被捕的，被捕后由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经过组织营救，关押一年后于1944年底被释放出狱。对小程我是了解的，她在我身边工作的时间较长，是一个好同志。记得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日本鬼子乘机扫荡茅山地区的新四军。一次，我因有任务要从茅山地区到东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当时旅长是江渭清）旅部，东路特委派小程来接我。到了无锡，只见鬼子在四个城门都设了岗哨，我们一时进不了无锡城。见此情景，她想了一下，把我带到离城不远的的一个同志家里住下，商量进城的办法，最后决定还是化妆一下。第二天，我和她到理发店烫了个时髦的发型，我还穿了一件考究的毛料子旗袍。从外表看，我到象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阔太太，小程则变成了一个颇有几分洋气的小姐。她还找来了两个当地的女同志作为掩护，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即朱循又名凤娟）梳着披肩发，甜滋滋的面孔，天真活泼，让她走在前面。另一个是徐雪映，她脸上架着一副银丝眼镜，一口漂亮的“锡白”（无锡话），刮辣爽脆，万一盘问，就

由她出面周旋。午饭之后，我们打点停当，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进城。未到城门，很远就已经看到城门的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眼露凶光望着进城的行人，有的鬼子还牵着口吐长舌的狼狗在巡逻，汉奸便衣，伪军一个接一个地对进城的人边盘问边上下打量着。我们说说笑笑，旁若无人地向城门走去，检查的敌人见到我们那神态自若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引起疑心，没有多加盘问，就让我们进城了。进了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十八旅旅部和东路特委机关已经从原地转移，不知去向，我们两人在无锡城不敢久留。小程建议先出城到严家桥她家里暂时安顿下来，再寻找十八旅。我向她问了一些情况，觉得很好。当天就坐上小火轮离开了无锡，傍黑到了她家。我就在她家里住下了。她家里的人很热情，十分支持她参加革命工作，特别是她妈妈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还帮助我们送信。以后，她就每天四处寻找十八旅的踪迹。一天，她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已经找到了十八旅的驻地了。在她的陪伴下，我们到了太湖边十八旅旅部，和江渭清同志见了面。随后，我到了上海，她还不时与我联系。被捕后，她在狱中通过地下关系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谈了被捕和在狱中的情况。出狱后，她积极寻找党组织，可以说明她的组织观念是比较强的。在审查中，区党委组织部又向金坛、溧阳县委作了调查了解，证明她被捕后对党是忠诚的。同时，又指出了她的某些缺点，经组织同意，便恢复了她的党籍。

小阮（阮波）也是被捕后，根据当时党内纪律停止了党籍。出狱后，到处寻找党组织。1944年冬，她从上海来到苏皖区党委组织部参加整风学习。她当时还是一个只有20岁的年轻姑娘，天真烂漫，活泼好动，还有个好歌喉。一见到我，好象有许多话要跟我说，但未开腔，眼泪却簌簌而下。看得出，她几经周折，现在找到了党组织，感到了无限地温暖，但另一方面，对党组织在她被捕后停止了党籍又感到委屈。我揣摸着她的心情，耐心地向她

解释：“我们共产党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所以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是最纯洁、最忠诚的战士。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政党，它的审干制度是党的纪律所规定的。你出狱一年来，几次找党受挫折，吃了许多苦。但组织上知道你的情况后，就马上派人把你从上海接来，这是党对你的关心和信任，相信党组织会尽快解决你的党籍问题的。”她听了后，心情舒畅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和我唱起了山歌：

千重山，万重山，
家乡就在这山中间，
吃菜要吃白菜心，
当兵要当新四军。

……

一歌唱罢，接着我们又唱起了我很爱听的一首歌曲《马赛曲》，旁边还来了一个同志吹口琴为我们伴奏。不一会儿，就熙攘攘地围了好一些人，兴致勃勃地听我们唱歌。

几天后，根据工作的需要，小阮又回到上海。不久，动员了一批学生，还有一部分中学教师来到苏南根据地。这些学生和教师到苏南后，接着进入了苏皖区党委为培养党的知识分子干部而兴办的“苏浙公校”。小阮很好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她们的任务。约半年后，经过整风学习，党组织恢复了她的组织关系。

党校还有一个学员，是从浙江来的学生，叫童超，学习热情很高，党校的课程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他就自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学习马列主义。到了整风运动时，有的人就说他们是托派。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后来在作结论时，我专门去请示了江渭清，江渭清同意我的看法，没有把他们当成托派。

日本投降后，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的变化，需要对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给予新的任务。我当时觉得，这些同志就要踏上新的工作岗位了，但他们的组织问题可不能搁置起来，否则将会伤害这

一批经过艰苦斗争锻炼又具有一定经验的青年干部。如果把这些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将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于是，我和组织部的其他同志，如张真（组织部干事）和欧阳惠林等，耐心细致地对这些同志在整风学习中所写的自传以及学习和思想鉴定材料作了审阅，在充分了解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组织意见一栏上批上“相信本人交待”。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做是必要的。不但没有伤害他们，而且加深了他们对党的赤诚忠心和坚定信念。在他们结束学习后，每个人都感到党组织对自己是了解和信任的。于是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踏上了新的征途。

苏南在抗战期间，许多县、区、乡、镇都存在汪伪、国民党和抗日民主三重政权，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一般说，农村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控制区，城市与大集镇是日伪汉奸政权控制区，有小部分地区是国统区。而在一些城镇郊区则往往是三种政治势力都同时并存，形成激烈的三角斗争区。在抗战时期，苏南始终是一个游击根据地。当时在华中局任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提出过，在苏南应以“敌进我进”作为指导思想。根据这个策略，敌向我根据地“扫荡”，我主力就向敌后挺进，根据地内留少数部队与其周旋，迫使敌人顾此失彼。敌退去，我也退回根据地。因此，几年来，我的战斗生活总是随新四军部队（十六旅或十八旅）和苏皖区党委或地方政权经常流动，甚至有时不能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上几天。在敌顽我三方斗争激烈的地区，打仗更是家常便饭，往往出现拉锯战的局面，在这敌后斗争的艰苦环境中，我只是在华中局、苏皖区党委的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深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妇女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团结、教育、培养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来到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等方面，做自己应做的工作。

我在苏皖区工作直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1985年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作山歌两首以志纪念：

卢沟桥头起狼烟，
山河破碎血溅天，
一声怒吼齐奋起，
万众同仇斗敌奸。

炮火纷飞整八年，
史绩篇篇非等闲，
今朝同祭烈士魂，
振兴中华再加鞭。

1987年“七·七”事变五十周年，作山歌一首：

“七·七”事变五十年，
昔时苦难记心间。
惊天动地英雄事，
国共合作把敌歼。
抗战八年飞碧血，
为救民族出深渊。
今朝更应同拚搏，
共赋中华统一篇。

第九章 在华中分局民运部

一、淮安鹤钱乡土地改革实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为了实现国内和平，让全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我党主动提出将南方八省的根据地武装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10月，新四军告别江南父老，忍痛北撤。此时，华中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已联成一片，成为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华中解放区。中央为了将华中各个根据地统一成一个解放区，9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原华中局改为华中分局。12月，华中分局与华中军区在淮安正式宣布成立，以邓子恢为书记，谭震林为副书记，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邓子恢为政委。我分配到华中分局民运部任副部长（部长刘端发）。

1946年二、三月间，华中分局民运部召开了一个华中解放区的群众工作会议，即华中工农青妇代表会议。华中各解放区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战胜利以来的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工作经验。会议从各地区的代表所反映的情况中已经注意到：广大解放区的农民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抗战时实行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政策，强烈要求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当时，国内形势正面临着全面内战的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已

上升为主要矛盾。党中央为了保障自卫战争的胜利，争取广大农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持，在新的形势下，巩固工农联盟，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及时地将党在抗日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把土地改革的任务列为“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解放区“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

华中分局接到中央的“五四指示”后，立即召开了分局及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对“五四指示”作了详细的传达和具体的贯彻，作出了在华中解放区进行全面土地改革的决定。为了取得土地改革的经验，以便尽快在整个华中解放区推广，分局决定组成工作队，先在淮安县的鹅钱乡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实验，具体工作由民运部负责。民运部很快组成了一个土改实验工作队，邓子恢要我任工作队队长，王文长（解放后在北京工作，已去世）为副队长，队员共有二、三十人，其中有许多是抗战胜利后刚从上海等城市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女同志，如张真、陈兰（邓子恢夫人）、陈英（王必成夫人）、林平（已去世）、阮波等，张真是秘书。过去，在中央苏区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都是我经常碰到和需要做的工作。这次土改是经过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后，由民族斗争转入阶级斗争为主的历史转变时期进行的，政策性特强，许多问题要重新学习，工作必须十分谨慎。根据分局的指示，5月18日，我和王文长同志就率领工作组到了淮安鹅钱乡，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实验工作。

淮安鹅钱乡虽算是老解放区，但和华中其他地区一样，原来的土地所有制很不合理，贫雇农土地很少，除了交租，终年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生活很苦。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农民得到了一些利益，生活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封建地主剥削，但封建土地关系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当时，鹅钱乡有刘庄村、余庄村、蒋庄村、赵庄村、岳庄村、贾圩村等好几个村子，人口3000多，土地共有6000多亩。土地工作队到了鹅钱乡，就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每个村子都派有工作队的队员。为了方便了解情况，作好调查研究，工作队的同志都分别住在农民家里。我住在余庄村一户贫农家里。

鹅钱乡原有一个地方党的组织，工作队有些同志开始认为，土改试点工作时间紧，对乡党组织不了解，搞土改有我们工作队就行了。我觉得，如果能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的作用，土改试点工作不但不会拖延，而且还会加快工作的步伐，避免或减少工作上出现的偏差，起到工作队本身不能代替的作用。后来，经过我们调查了解，除发现个别人有问题外，整个乡的党组织还是好的。因此，我们决定依靠当地的乡党组织，一起完成土改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的第一步是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开展“清算”运动。在乡党组织的协助下，工作队很快就了解到，抗战胜利后，在反奸反霸中，当地农民分到了一些清算斗争果实，从地主手中取得了一部分土地。但斗争果实没有分彻底，群众反映这只是一笔空帐，原来分配的土地不太合理，贫农特别是雇农，因为无“帐”可算，得到的土地很少，积极性不高。因此，工作队第一步的工作，首先是进行“清算运动”，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收回来。清算就是发动群众算地主的剥削帐，开始有少数人怕变天，怕倒算，顾情面，不敢大胆向地主清算。经过我们挨家串户访贫问苦，以当地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一些具体事实启发他们，让农民弄清究竟是谁养活了谁的道理。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绝大部分群众打消了思想顾虑。于是，我们便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村、乡斗争果实处理委员会。一边进行详细的人口、田亩登记，一边组织群众向地主进行清算。在“清算”运动中，贫雇农发挥了先锋作用，大部分中农也参加了清算。群众起来后，就划分阶级，先

划地主、富农，后划中农和贫、雇农。在划分阶级时，特别注意富农和地主，富裕中农和富农之间的界线。强调要团结和保护中农，防止将富裕中农划为富农，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

第二步是分配土地。拿来分配的土地，绝大部分是从地主手里清算出来的，小部分是说服富农把他们多余的土地献来的（当时称“献田”）。我们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和华中局的指示，结合鹅钱乡的实际情况，运用闽西土地革命时的成功经验，采取了“中间不动两头平”，“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等原则。即中农的土地不动，将地主被清算出来的土地和富农的“献田”，按人口平均分给贫雇农，一般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开始，有些群众怕工作队、新四军走了以后，地主回来反攻倒算，不敢要田。我们就引导他们讨论国民党、“中央军”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哪个力量大？让大家明白只要全解放区的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打垮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还让群众明白地主的田地是从农民身上剥削去的，现在我们分田是土地还家，是理所当然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一旦顾虑打消了，就迫切要求分田地。我们就按分田的标准进行分配，全乡3000多农民平均每人分得2亩多土地，农民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

田分下去以后，农民很关心写田契的问题。他们说：没有田契，无凭无据，拿什么来证明分得的田是自己的呢？我们认为田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对分得的土地所有权的保障，关系到农民对土地改革的信任问题。我们尊重群众的意见，按照当地的习惯，由农民自己请人写，中间人也由他们自己请，然后由土地的所有者在田契上签字画押。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保障妇女的权益，写田契时妇女的名字和男人的名字并排写在一起。契尾写上“老契作废，新契负责”，同时将老契当众烧掉。然后将田契呈送县民主政府备案，确定新契的合法性，使农民所得利益得

到法律保障。

在鹅钱乡的土改试点中，我们遵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对农民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地主，恶霸与非恶霸分子等，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对抗日军人和干部及抗战时曾与我们合作过的开明士绅，予以适当照顾，允许他们保留比一般农民稍多一点的土地；对工商业实行保护，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工商业一律没收外，对一般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均予保留。这些政策得到广大贫雇农的支持，团结了大多数的人，孤立了极少数的敌人。

土地分配完后，遵照华中分局提出的“土改、生产、支前三结合”的号召，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运动，帮助农民组织互助组。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很快便掀起了一个生产支前的热潮。为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民主政权，土改后建立和扩大了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乡里还成立了民兵自卫队、基干队，担任巡逻放哨，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土改果实；经过土改，健全了乡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巩固和壮大了基层党的组织；通过土改巩固了工农联盟，农民与党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关系更进一步密切。记得当时群众经常唱着这样一首山歌：

河里鱼儿要用水来养，
老百姓的军队要由老百姓来养。
新四军打仗在前边，
老百姓帮忙在后边。
军民大家一条心呀，
打败敌人保家乡！

工作队离开鹅钱乡前，全乡农民召开了一个庆祝土改胜利大会，附近各乡也派了代表来参加，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欢庆农民翻身。在大会上，许多青年响应政府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和参加

民兵，翻身农民纷纷表示决心，要加紧生产，支援前线，不忘共产党和民主政府，还特别写了封信感谢毛主席。

工作队在鹅钱乡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战斗，于6月下旬结束土改试点工作，鹅钱乡是华中解放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在华中分局直接领导下，开展土地改革的第一个实验乡。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十分重视这次实验，多次找我了解工作情况，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及时予以指导。这次土改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得到分局的高度评价，认为鹅钱乡的经验，对华中解放区全面开展土改运动具有指导作用。邓子恢亲自总结了鹅钱乡的经验，并在《华中通讯》和《盐阜大众》等刊物上连续发表关于鹅钱乡土改的文章。邓子恢认为，鹅钱乡有几点值得向各地党组织介绍：

一、鹅钱乡的土地状况是中国土地状况的缩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从鹅钱乡状况可以看出，只有实行彻底的土改，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村购买力、从而扩大工业市场，从而扫除封建残余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土地改革是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两个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谁不赞成土改，或对土改消极怠工，甚至阻碍破坏，他就是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利益，就是阻碍中国走向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大道、就是革命的罪人。

二、鹅钱乡土改取得的成绩是：充分发动了群众，贫雇农建立了优势；农民从地主手里收回了土地，从经济上翻了身；初步发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武装起来了，建立了自卫队、基干队，站岗放哨，保卫自己的土地；改造了党支部，吸收了一批党员，加强了党的基础；解决了拥军优抗问题；教育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斗争情绪、胜利信心和策略观点。

三、从鹅钱乡土改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党的正确的阶级政

策，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对富农又斗争又联合，对地主采取分化改造的政策，巩固了农村反封建的民主统一战线。

四、从鹅钱乡土改中可以看出，发现与争取当地积极分子，作为运动的核心，是开展运动的中心一环，而在运动中继续发现积极分子，大胆提拔积极分子，形成新的组织核心，并以此来改造旧组织，或加强旧组织，又成为巩固运动胜利的基本条件。

五、从鹅钱乡土改中，可以看出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关系。邓子恢指出我在鹅钱乡工作不足之处，是完成了点的突破，没有及时推动全局。当时，鹅钱乡分配土地的消息传开后，周围很多乡的农民跑来找我，要求我到他们那里去帮助他们分田地，甚至埋怨我厚此薄彼。我当时要他们稍等一等，待鹅钱乡搞好后即去。这样其他地方的土改就比鹅钱乡慢了一步。邓子恢指出，如果我当时马上派人到各乡去，抓住这个时机，把各乡的土改都搞起来，这样不仅突破了一点，而且推动了全局。这是我做得不够的，因我当时不仅是鹅钱乡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而且是华中分局的民运部副部长，是可以也有权这样做的，说明我工作还不够大胆和主动。邓子恢指出我的不足，是对我极大的教育和爱护，此后，在广东搞土改时，我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在抓点的同时，注意到面上的工作。邓子恢教我的这个工作方法，不仅适用于土改，对领导其它工作也是极宝贵的经验。

当时，在华中解放区，有些地方的土改出现了侵犯中农的现象。9月1日，华中分局发出《关于团结中农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把鹅钱乡土改采用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办法，作为团结中农的政策之一提出。华中分局又将鹅钱乡土改的总结上报中央，邓子恢要我准备去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因全面内战爆发，党的土地政策又有些变化，我没有去出席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

二、新安和莱阳土改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和全国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协议，调动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进而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国内战爆发。7月中旬到8月下旬，我华中野战军在苏中进行自卫反击，七战七捷，歼敌6个旅和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000余人，我军解放了徐州和陇海路沿线的一些地区。这时，邓子恢要我带一个工作队到陇海路沿线，江苏和山东交界的新安县去进行土地改革和发动群众参军，支援自卫战争等等工作。

我到新安去搞土地改革时，党中央对于内战爆发后土地改革的政策又作了新的指示（即《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地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主要放宽些。”我遵照这个指示精神和鹅钱乡土改试验的一些具体办法，在新安一带开展了土地改革。

通过土地改革，大大调动了农民参加自卫战争和支援前线的热情，在农村掀起了一股参军参战的热潮，给部队送去了一批新战士，同时在各乡、村建立了民兵组织，参加游击战争。我们还动员了大量民工，组织运输队、担架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时又正值秋收季节，翻身农民踊跃为部队送粮。组织妇女为部队做衣、做鞋、磨面、送菜、护理伤员等等。翻身农民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在新安一带工作了约有半年时间。于1947年春，又跟曾山

到了山东莱阳地区。当时，莱阳地区的土改搞得比较“左”，有的地方出现了侵犯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还有个别地方出现乱打乱杀现象。还有同志对基层党组织不纯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如有人反映说：“东头山党支部是国民党的支部。”曾山要我去东头山了解一下，对这个支部进行整顿。我去到东头山，经过调查了解，认为这个支部基本上好的，只是混进了个别坏人，我把混进来的坏人清理出去，对支部其他成员组织他们学习，进行教育。党员经过学习教育，与坏人划清了界限，积极性大大提高，然后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改选，成立了新的支部。回来后曾山又派我到莱阳地区去纠正过去土改时的一些错误做法。这个工作相当艰巨，我还是尽力去做了。工作了一段时间，正值传达贯彻中央土地会议精神，说我们搞的土改右了，又重新派工作队到莱阳地区来，我们插不上手，只好回到分局。

我在淮安县鹅钱乡搞的土改试验工作，和以后在新安县及莱阳地区的土改工作，都是邓子恢和张鼎丞直接领导的，工作中他们给了我很多教育、支持和鼓励，邓子恢对我的工作也是很满意的，并一直记在心中。直到1972年，邓子恢病危，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他时，老人家正在昏睡中，邓老夫人陈兰同志告诉他：“坚真同志来看你了，”邓老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着我微笑地说：“坚真，你土改回来了！”我一时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一股热泪簌簌地往外流，连一句安慰他老人家的话也说不出来了。邓老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为农民的彻底解放奋斗了一生，耗尽了心血，直到生命垂危之际还念念不忘土地改革的事。全国解放后，他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致富的道路，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见解。这些意见在党内一直争论不休，不仅没有被采纳，还因此事受到打击，直到他与世长辞。

三、撤退到大连

1947年冬，解放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已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我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向全国大举进攻，华东地区的战争在紧张激烈的进行着。根据这一形势，华东局决定将一些体弱不能坚持领导斗争的领导干部和军队主要领导干部的家属，转移到大连去。组织上决定要我转移到大连。和我一起转移到大连的有：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孩子，邓子恢的夫人和孩子，曾山的夫人邓六金和孩子，粟裕的两个孩子，江渭清的夫人和孩子，方毅的夫人和孩子，袁国平的两个孩子等等。我们从胶东坐船到大连，船行到石岛附近，要过海过不去，邓六金在船上生孩子，偏偏又是难产，她怕连累大家，要把孩子丢掉，我不准她丢。这个孩子留下来了，取名海生。船在石岛附近停了半个月，组织上决定分两路走，我带了邓六金的两个大孩子和一些同志，先到了威海，从威海再坐船到大连。当时形势很紧张，我们分两路走，也不知那一路是安全的，我和邓六金两人作好思想准备，万一遇到危险，只要有一路安全到达大连，就能保住她的孩子。幸好，我们两人都安全的先后到达大连。

华东局在大连设有一个办事处，主任是吴仲超，我们的一切生活由吴仲超管。开始我们住在疗养院，李桂英在疗养院当指导员。开始生活很苦，徐海东有病住在疗养院旁边的一个地主的家里，他见我们那里条件差，就要我们搬到他那里去住，我和邓六金带着孩子就搬到他住房的下面一栋房子去了。大连公安局长搬了些锅碗瓢盆给我们。在大连休息了一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休息。

第十章 华东局的妇女工作

一、发动妇女群众支援淮海战役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伟大胜利。4月，山东兵团攻克潍坊使山东解放区连成了一片。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了山东省会济南市，济南的解放使山东省除青岛等少数敌人据点外，全境获得解放，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11月，东北野战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同时在华东开始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开始后，需要大量的地方干部来动员人民群众支援战争。组织上通知我返回山东，担任华东局妇委书记，我便从大连到达济南。此时，华东解放区包括山东、苏皖和河南等解放区，华东局辖江淮、苏北、鲁中南、渤海、胶东等区党委。华东局书记是饶漱石，副书记是陈毅和康生。

当时，整个华东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淮海战役的胜利。11月20日，华东局发出了《紧急动员起来，支援淮海战役的指示》，号召华东区党、政、军、民全力支援前线，力争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各级党委妇女部的中心工作，也是动员妇女全力支援淮海战役。我在大连休息了近一年的时间，回到山东精力充沛，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支前工作。我和各级妇女部的同志一起，动员解放区妇女积极参加运输队，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和各种军需物资；动员妇女为部队碾米，光滨海妇女一个月就为部队碾米4000多万斤；组织青年妇女参加担架队，上前线救护伤员；动员妇女送亲人参加解放军，还有许多青年妇女参加

民兵，巡逻放哨，为部队送情报等等。在华东解放区出现了许多支前模范，如一等功臣董力生，民兵女司令刘虎城等英雄妇女，以及母送子，妻送夫参军参战的动人事迹。在整个淮海战役中，有数百万的民工参加支前工作，其中约有半数妇女。陈毅在战后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而能够取得胜利。

1949年初，淮海战役胜利后，华东局妇委召开了华东区妇女代表大会，总结了妇女支前工作，表彰了妇女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号召华东妇女向她们学习。妇代会并选出了出席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

二、率团出席第一次全国妇代会

华东妇女代表大会以后，于3月初组成了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华东妇女代表团，由我任代表团团长，邱一涵、陈少敏、章蕴任副团长。代表团共有50多人，代表着山东、苏皖和河南等华东解放区的2500多万妇女。在代表中有17岁就参加战斗，消灭了17个日寇的女英雄孙玉敏，有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女民兵司令刘虎城，有参加孟良固战役的钢铁担架团一等功臣董力生，有治理黄河的女工程师钱正英等。代表团组成后，华东局领导同志，专门拨了几匹青蓝色的细棉布给每个代表做了一身崭新的列宁装。那年轻姑娘见了列宁装，高兴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就穿上。那些农村来的代表却舍不得穿，怕弄脏了到北京不新鲜了，把它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到背包里。

代表团于3月5日，自山东青州乘汽车出发北上。几天后抵天津，在天津市军管会和特种兵团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全体代表参观了我国第一支全由大炮、坦克、装甲车装备的机械化部队

——特种兵团的演习。这些大炮坦克都是人民解放军从敌人手中缴获过来的。代表们看了演习，情不自禁地高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3月15日，我们改乘火车去北平，萧华司令员亲自到车站为我们送行。当天到达北平，妇代会筹备处派了两辆敞篷车来接，将我们安排在前门南面的一间普通旅馆——天有店下榻。大会接待处的同志向我们解释说：北平刚刚解放，开的会议特别多，一些较大的旅店都住满了，只好将你们安排在这里了。其实，在繁华的大都市北平，一间这样的普通旅馆也比解放区的条件好得多了。大会开幕前，邓颖超大姐找各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开了一个会，向我们讲这次大会的性质和情况，特别强调：这次大会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统一战线问题。要我们学会和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在妇女运动中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开创妇女运动的新局面。我们回到各团，向全团代表传达了邓大姐的讲话。

3月24日，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了，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一个光辉的日子，也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西北、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原五大解放区的妇女代表共425人。这时，中共中央机关还在西柏坡，仍未迁来北平。但代表们看到场上悬挂着中央领导同志为大会写的题词，就好象看到了党的领袖在我们的身边。毛主席的题词是：“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刘少奇的题词是：“解放妇女，发扬妇女的积极性，是建设新中国的必要条件。”朱德总司令的题词是：“目前妇女工作的中心，要移到城市去做女工工作并妇女联合工作。”周恩来的题词是：“努力生产，打破封建。”任弼时题词是：“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各行各业也赠送了锦旗和发来贺电。我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之一，华东代表团的钱正英、董力生也选进了主席团。

全国民主妇联筹委会主席蔡畅同志向大会致开幕词。她首先提议全体起立，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朱总司令及全体指战员致敬，向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致敬，并默哀三分钟。接着，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大会开幕的第二天，即3月25日，大会通知全体代表到西郊机场迎接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由西柏坡抵达北平。当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参加妇代会的代表这边时，蔡畅和邓颖超同志将妇代会的英雄模范人物和知名人士一一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介绍。大家非常高兴，心情十分激动，都抢着前去和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握手。毛主席在代表中一下发现了我，忙走过来跟我握手，笑着说：“李坚真，你还活着！”我说：“活着！活着！毛主席，你身体好！”我自1937年底离开延安后，就没有见过毛主席，中间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此时，此刻，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活着相见，心情无比激动，在旁边的记者，立即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一难忘的激动人心的镜头。

会议期间，先后由邓颖超同志向代表们作了题为《中国妇女当前的方针任务》；李德全作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妇女运动的报告》；蔡畅作了关于《世界民主妇女运动的现状及其任务》的报告。

在会议发言中，华东代表刘虎城、钱正英的发言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虎城是江苏省泰兴县姜南区九东乡的一位女民兵英雄，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刘司令”。这位女司令年纪才30出头，但由于旧社会贫困生活的折磨，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人看上去已是近40岁的人了。她正担任乡里的支部书记，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她的家乡。她毫不犹豫地抛下自己的两个孩子，带领民兵打击下乡抢掠的敌人，掩护群众藏粮转移。不久，她当村长的公公和共产党员的丈夫先后被反动派惨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不

幸死去，她把悲痛化作仇恨和力量，向敌人主动出击，在一次袭击中，打死了敌人的连长夺回了被抢去的粮食，解救了被抓去的两百多个乡亲。自此，敌人闻风丧胆。在她的威名下，一次就有两百多个还乡团的团丁投降过来，刘虎城也被拥戴为泰兴姜南区的区委书记。

治理黄河的女工程师、山东省河务局副局长钱正英的发言实在十分精彩。会议期间，这位30岁左右的女工程师整天和代表们在一起说笑，不认识她的人，谁也看不出她是一位既有学问又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钱正英原是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1942年还差半年就要毕业了，但她毅然舍弃学业，投奔山东根据地，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献给了党的事业。她依靠党和人民的力量，在自古以来多少人为之奋斗而不能制服的治理黄河水患工程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人问她是怎样赶退了黄河水的？她说：“其实，真正治河的英雄是共产党和人民！没有共产党，象我这样一个妇女，连参加海河工程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党引导我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技术与人民相结合，我怎能为人民服务呢？我只是参加这一工作的一份子。”许多代表听了她的发言后都称赞道：“有功不夸功，才是真功臣。”

最后，大会通过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领导机构，以蔡畅为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区梦觉为秘书长，我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共51人）。

4月3日，朱总司令出席了大会的闭幕式。朱总司令讲了话，他指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有着特殊重大意义的，它标志着全国人民的胜利和妇女运动的新发展。雷洁琼先生致闭幕词，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到会为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党中央的许多

领导同志还特地抽出时间在香山接见了妇代会的全体代表。

大会结束了，但代表们仍然没有忘记郭沫若同志献给大会的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多少人民血，
换来此光荣。
思之泪欲坠，
欢笑不成声。

这首诗道出了代表们此时此刻的心声。

妇代会后，我们代表团回到山东。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接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了长江，第三野战军解放了南京。5月下旬解放了我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华东局搬往上海，成立了山东分局。书记由华东分局副书记康生兼任，组织部长是曹轶欧，宣传部长彭康，我留在山东分局任妇委书记，兼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任。

9月，我作为山东区的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党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无数革命先烈为了这个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第十一章 广东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一、重回故园

1950年，中央准备在全国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当时，邓子恢同志任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亲自抓中南五省的土地改革运动，因我曾在邓子恢领导下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华中区的土改，所以他就把我从山东分局调到中南局来，协助他搞土地改革。同年4月，我便从山东分局调到中南局。刚到武汉，邓子恢即要我参加中南军政委员会任委员，正好这时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二书记张云逸到中南来开会，见我已调到中南，张云逸同志要我到广西去搞土改，叶剑英同志要我回广东来。因我刚刚调到中南局，具体工作还没有定，邓子恢就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留在中南还是愿意回广东？抑或是去广西？我也没有多加思索就说：“还是回家乡吧！”就这样，我重新回到阔别了整整20年的家乡。

“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我到达广州，组织上派人把我接到梅花村，住在梅花村22号，叶剑英住在通园，离我的住所很近。叶剑英和方方同志很关心我，当天，他们就来看我，要我先休息几天，把家安顿好。我那时只一个人，东西也很简单，没什么要安顿的。我的秘书王广平，警卫员是从山东跟我来的，他们也是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我就对叶剑英说：“生活都安排好了，请组织上给我工作吧！”

叶剑英说：“要你回广东，主要是抓土改，准备成立省土改委员会，由你来负责。土地改革要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广东刚刚解放，现在不知道具不具备土地改革的条件？广东华侨多，工商业比较发达，土地改革怎么搞法？现在心中还没有数。”

我说：“我离开广东整整二十年，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是不是让我先到各地去看看？”

叶剑英说：“好！你先到各地去跑一跑，摸摸情况，回来再研究。”

第二天，我就到广州市大街上去转，我虽是广东人，但这还是第一次到广州。那时，广州大街上有不少卖菜、卖水果的农民。我就走过去跟他们交谈，那知一开口问题就来了，语言不通，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广州话。我在福建、江西、陕北、华东地区都做过群众工作，没有感到语言不通，回到广东来反而语言不通了。语言不通，很难接近群众，所以我决定还是先到讲客家话的地区去跑一跑。方方同志长期在闽粤赣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对广东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和叶剑英都叫我先到梅县地区去看看。

二、兴梅调查

约在六、七月间，我带了分局党校的几个教员，记得有谢盘石等人，出发到兴梅。兴梅的地委书记是贺旭东，组织部长是王维，我向地委的领导说明来意，征求他们的意见，兴梅地区在今冬有没有条件进行土地改革。地委的领导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兴梅地区的一些基本情况，认为有条件在今年冬天开始土地改革。他们说：第一、兴梅地区干部基础比较好，干部思想倾向土改，县、区级干部一般都有二至五年的斗争历史。从成份上看，贫苦出身的知识分子多，工作积极、肯干；第二、群众基础比较好，已组

织起来的群众有四、五十万，其中比较可靠的组织有 20 万到 25 万。兴梅地区山多田少，群众生活比较苦，农民迫切要求得到土地；第三、从社会条件来看，各区经过清匪反霸，治安比较好。在今冬进行土改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们听了地委领导同志的介绍又从各方面了解了一些情况，就到兴宁、梅县等地去调查，主要是摸清土地占有情况，群众的生活情况，群众的觉悟程度，对土地的要求，基层干部和党组织的情况等等。经过调查了解后回到地委，又和地委的领导同志一起讨论，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兴梅地区可以在当年冬天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从兴梅地区回来时，路过东江地区，我又在沿途几个县停留了一下，顺便了解东江地区的情况。然后，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跑了一趟。回到广州将调查的情况向叶剑英和方方作了汇报。叶剑英听了汇报后说：“农民对土地有迫切要求，我们就要尽快开始土地改革。从粤东到珠江三角洲地区比较来看，珠江三角洲比较富，粤东山区比较穷，山区、穷区的群众对土地要求更为迫切，群众容易发动，还是先从粤东穷区开始搞起为好。”

三、“全省着眼，三县着手”

为了使全省的土地改革顺利进行，分局决定先从粤东选择一个县作为典型试验，以便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选哪个县作为试点？叶剑英和方方又找我去商量。开始，我考虑以梅县做点，后来大家商量认为梅县靠近福建，对广东的影响不大，且梅县华侨太多、学生多、妇女多，特殊情况多，不够典型。大家觉得兴宁条件比较好，兴宁是半老区，干部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比较好，兴宁以农业为主，但地少人多，农民迫切要求分配土地；兴宁工商业比较发达，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比较多；有华侨，有一批起义人员，也有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各种情况都有，《土地法》规定的

各项政策在这里都能体现出来，在兴宁搞好了可以取得贯彻各项政策的经验，便于向全省推广。兴宁的地理位置也比较好，西接东江专署，南邻潮汕专署，兴宁的土改搞好了可以影响整个粤东。这样就确定以兴宁作为全省土改的典型试验县。后来分局认为全省搞一个县还不够，还要在其它地区再搞几个点，为便于领导，就决定在东江和潮汕两个地区各找一个各方面基础都比较好，又临近兴宁县的县为点。正好此时龙川县委向分局打报告要求土改，我到龙川去调查时，县委书记刘波就向我要求过开展土改。我将这个情况向叶剑英和方方反映了，就决定东江地区以龙川为点。吴南生曾经带工作队在揭阳县搞过清匪反霸斗争，那里基础比较好，便决定潮汕地区以揭阳为点。三个典型试验县就这样确定了。

叶剑英说：“广东是新解放区，干部没有土改经验，我们先从三个县开始搞，但着眼点要放在全省，从三县的土改中取得经验，培养干部，再逐步向全省铺开，就是‘全省着眼，三县着手’。”叶剑英提出的“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方法，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法。同年8月，我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0月，叶剑英向毛主席汇报土改工作，毛主席指示：“土改面积除原定三县外，其它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11月，分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县为土改试点县。

四、土改机构的建立

1. 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组建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

报告，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

同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中心是讨论土地改革，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阐明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展开了。

三中全会后，华南分局通过决定，成立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并决定了省土委会的人选：

主任：李坚真

副主任：林美南

委员：谭政文、区梦觉、李凡夫、陈冷、徐云、孔石泉、林平、张文、李伯球、罗明、刘兆麟、朱曼平、王维。

6月21日，分局将此名单上报中南局审批，同时即要我着手筹建土委会的办事机构，及早开始工作。分局决定由陈冷和徐云两同志任土委会的秘书长，协助组建工作。我们四处奔跑，与各方面交涉，要房子，要干部。后来要到中山医学院对面的院子（广州市第十六中学）作为土委会的办公地点。又从各单位调来一些干部，很快便把土委会的办事机构建立起来，即开始工作。为准备土改，从各单位抽调了大批干部集中在分局党校，学习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等文件，还请一些有土改经验的北方来的干部去作报告，我自己到党校南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去作报告。主要讲解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介绍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具体做法、经验、教训等等。

10月，中南局将分局上报的省土委会的名单批复下来，中南局意见，省土委会主任由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同志兼任，我为副主任。

2. 省土改工作团的组建

1950年9月，以分局党校、南方大学学员为主，加上从中山大学和省直机关抽调来的干部共1000多人，组成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下辖兴宁、揭阳、龙川三个分团。工作团和各分团的领导成员是：

省工作团团长：李坚真

副团长：林美南、罗明

秘书长：徐云

兴宁分团团长：廖伟

副团长：梁集祥、罗亚辉

揭阳分团团长：林美南（兼）

副团长：吴南生、孙正明

龙川分团团长：钟俊贤

副团长：杨应彬、黄中强

同时成立了相应的党组织——中共广东省土地改革工作团委员会。党组的成员是：

书记：李坚真 副书记：林美南

委员：李坚真、林美南、徐云、杨应彬、吴南生、罗亚辉、钟俊贤、廖伟、黄钟祥、陈彬、孙正明。罗明那时还没有恢复党的关系，分局决定罗明列席党的委员会。

工作团的上下隶属关系是：党的关系直接属分局领导，代表分局领导土改工作，并指导地委工作。行政关系属省政府领导，对下代表省政府指导专署。分局还决定由我代表分局和省政府指导地委和专署的工作。

同年10月中旬，省土改团分别下到三个县，省土改团团部设在兴宁，我和罗明驻兴宁，林美南和吴南生到揭阳，杨应彬到龙川。赖仲元也在兴宁，他是党校学员的带队人。兴梅、东江、潮汕三个地委也抽调了一批干部参加土改工作团的工作，3个县的县

委书记都参加了分团的领导。土改是3个县的中心任务，县委主要力量都投入土地改革运动。省、地、县三级参加土改的干部共约6000多人。

五、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步骤

1950年开始的南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建国以前北方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有所不同，以前是在战争环境下进行的，而南方的土改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上的战争已基本结束的环境下进行的；是在我们党已经有了30年领导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丰富经验和教训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党中央对这次土地改革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并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地法》）。土地法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由于南方新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条件和环境变了，因此土改的政策也比建国前北方老解放区的土改政策有所改变和缓和。主要表现在以几个方面：

对富农的政策的变化，即将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业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为什么要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毛主席在1950年3月12日给中南局和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通知中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这样做的

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大，地主叫唤的声音也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在保存富农的同时，在政治上对富农则采取中立的政策。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志在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今后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应该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对地主的政策也比以前宽大了许多。刘少奇同志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同时，应没收地主的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这种多余的粮食及多余的房屋家具和耕畜农具，连同土地一起没收，并加以分配，同样也留给或分给地主一份，是必要的。”“除开这些以外，地主的其它财产，包括地主所经营的工商业在内，不予没收。自然由于地主的多年剥削，多数地主是还有许多其它财产的。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没收和分配地主这些财产就要引起地主对于这些财产的隐藏分散和农民对于这些财产的追求。这就容易引起混乱现象，并引起很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破坏。这样，就不如把这些财产保留给地主，一方面地主可以依靠这些财产维持生活，同时，也可以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这对于社会也是有好处的。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对于地主这样处理，和过去

比较，是要宽大得多了”。

土地改革的方法是从上到下的，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进行。刘少奇同志在同一报告中指出：“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他还指出：农民协会是土改队伍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在农民协会中贫农、雇农应占领导地位，同时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领导，各级农民协会领导成分中有1/3的数目从中农中挑选，农民协会还应吸收乡村中贫苦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参加。农民协会在会外还必须团结乡村中一切反封建的分子，包括那些赞成土地改革的开明士绅在内，组成农村中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

中央对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有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我们党30年来领导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付出了代价，用鲜血换来的。有了这一套方针、政策就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所遵循，不致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全心全意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土地改革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能够顺利进行。

为了把广东的土改搞好，在省土改工作团临下去之前，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同志又把我叫去再三嘱咐：“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团结大多数，结成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要注意斗争策略，掌握政策，对地主的斗争，侧重点放在发动群众，揭发地主阶级剥削的罪恶，除少数罪大恶极及公开和我们对抗的恶霸要坚决镇压外，一般不要在肉体上消灭，而要采取说理说法的斗争，因为土地改革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个人”。“广东华侨多，工商业比较发达，要特别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

商业者的利益”。叶剑英还再次强调：“要稳妥地进行土改试点工作，要把工作搞好，要着眼全省，在三县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你们下去要依靠当地干部和当地党组织，地方干部人熟、地熟，和群众关系密切，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互相帮助。”

六、三县土改的具体做法

土改工作团下到各县后，以团为单位立即集中各县参加土改的干部进行培训。主要学习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思想教育，以提高土改工作队员对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斗争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增强他们对参加这场伟大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的责任感和光荣感，从而全心全意地积极地自觉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二是进行政策方面的教育，提高工作队员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使他们能自觉地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人民政府规定的各项政策和法令。在集训期间，我曾轮流到三县去作了关于《发动群众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强调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群众能否发动起来是土改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强调在土改中必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强调必须按政策法令办事，遵守纪律等。我还介绍了老解放区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发动群众的一些基本方法。

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叶剑英的指示，土改工作总团制定了工作队员必须遵守的八项纪律，和三县土改的工作计划、步骤的决定。决定强调：“我们的工作应是重点试验，逐步推开，波浪式地前进，反对任何冒险的、无计划的，企图一下子轰开局面，贪图热闹的做法”。

工作队员必须遵守的八项纪律是：

- (1) 严格执行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令，不得违反；
- (2) 坚决拥护土地改革，不得包庇地主；

(3) 廉洁奉公，不得贪污果实，不得接受贿赂；

(4) 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倾听群众意见和批评，不得欺压人民；

(5) 一切重要问题和大家商量，不得个人决定，强迫进行；

(6) 依照法律手续办事，不得乱捕，乱罚，乱打，乱杀，不得使用肉刑和变相肉刑；

(7) 坚决服从上级指示，不得阳奉阴违；

(8)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得各自为政。

以上纪律，土改团各级领导要带头执行，执行有功者予以表扬奖励，违反者不论何人都要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土地改革的三个阶段是：

第一阶段，实际准备。这一阶段的中心内容是在三县选择八个乡进行典型试验，集中土改骨干在八个乡搞好典型试验，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办法。面上的工作，主要是建立与健全领导机构，整顿队伍，培训干部、开展社会宣传，完成秋收、秋征、冬耕及兴修水利等生产工作。

第二阶段，重点分田。每县挑选一、二个区每区挑选一、二个乡进行重点分田。把试点乡的经验向面上推广。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种代表会，在面上发动群众，以典型乡的胜利来教育、鼓舞群众，同时动员社会力量支援土改。

第三阶段，全面分田。土改运动在三个县全面铺开。

三个步骤是：

第一步是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我向工作队员反复强调，一定要紧紧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要把根子扎在贫雇农家里，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诉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苦，算地主的剥削账，要让群众把苦水吐尽，彻底揭露和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通过扎根串连和诉苦，逐步把贫雇农组织起来。先组织贫雇农小组，再组织贫雇农代表会，继而成立贫雇农主席团，使

贫雇农成为土改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同时吸收中农和农村贫苦知识分子参加农民协会，以结成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诉苦时一般采取小组为单位背靠背进行、只有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才组织苦大仇深的农民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为了防止地主阶级的抵抗和破坏，组织民兵对恶霸分子和不法地主进行监视，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对地主还规定了“四要”和“四不准”（四要是：要守法，要保护耕牛农具，要实报土地及生产资料，要劳动生产。四不准是：不准抵抗，不准破坏，不准隐瞒，不准造谣）。同时对地主阶级采取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那些恶霸分子、不法地主，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苦主、婢女、长工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剥削本质，算他们的剥削账，诉他们压迫农民的罪恶，斗他们的威风，直到他们低头认罪。

当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就强调注意掌握政策。群众发动起来后，一些过去被地主逼得倾家荡产的和亲人被地主害死了的农民，便要求报仇，会有过激的行动。有的妇女说：“我要用担桿戳死他（指地主），一头一个挑起来游街”，有的要用烧红了的火钳来烙死地主。这时，我就向工作队强调要注意政策，掌握火候，防止出现乱打乱杀现象，特别是兴宁会武术的人很多，动起武来打死人不好办。要求工作队员注意引导群众，采取说理说法的斗争，不要用肉刑。有一次，我到龙川检查工作，去到一个村，正好碰到在斗争地主，有的农民就拿起烧红了的火钳在烙地主，我看这样不行，又不好当场制止，就立即把工作队队长找来，要他马上向群众宣布：现在上边有紧急任务要传达，暂时休会，用这个办法制止了使用肉刑。当然，我们反对乱打乱杀，并不是说一个也不杀，对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分子，是要严惩的，要处决的。对这样的恶霸地主分子如果不杀，便不能平民愤，不能建立革命的秩序，但是必须经过人民法院审判来处决。在整个土改过

程中，由于我们反复向工作队员强调，要向群众做好思想工作，把政策交给群众，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放在三个县的试点工作中，没有发生群众乱打乱杀人的现象。经过人民法院的审判，处决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分子，由于在土改前的清匪反霸斗争中，各县已经杀了一些，故在土改时杀的人不多。以后有人说我们对地主不狠，杀人太少，是和平土改。我们认为杀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多杀人乱杀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杀多了人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而实际上反而会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的。早在1948年，毛主席就指出要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他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

第二步是划分阶级。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和组织群众诉苦，斗争恶霸后，群众发动起来了，工作队对村里各家各户的基本情况也摸清了，就开始划分阶级。划阶级由贫雇农主席团主持，工作队当参谋。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先由群众自报，贫雇农主席团研究后，张榜公布，再由群众去评议。经过几上几下讨论、评议，最后三榜定案。先划剥削阶级，再评贫雇农、中农。在划分阶级时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对掌管公尝田的农户如何划分阶级的问题，群众中和工作队中都有不同的认识。我根据老解放区的经验，向工作队解释在划分阶级时应将公尝田除外，按农户原有土地情况，该划什么成分就划什么成分。公尝田是要没收的，但不能将公尝田的数字算在掌管农户的田亩数来划阶级，因公尝田是轮流掌管的，如果土改时正好碰上贫雇农或中农掌管，按公尝田亩数和收租的情况将他划为地主或富农那就把我们的阶级兄弟

划到敌人方面去了，就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从道义上来说，也会冤枉了好人，群众会认为我们不公平。

第三步就是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财产。我们按照《土地改革法》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地主放的高利贷没收，地主的其他财产及经营的工商业不动，不追浮财、不挖底财，地主在城市、集镇的房屋以及在农村直接用于工商业的房屋、均保留没动。为使群众掌握好这一政策，各分团还提出了“五要”、“五不要”（五要是：要土地、要耕牛、要农具、要多余房屋、要多余粮食。五不要是：不要浮财、不乱打乱杀、不侵犯中农、不侵犯工商业、不动小土地出租者）等口号，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

对工商业兼地主，只割掉其在农村的封建剥削的尾巴，即征收其土地、耕畜、农具，对其在农村的房屋只征收其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如果是他本户住宅、厂房、仓库等项房屋，则加以保护，没有征收。

对富农在政治上中立，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对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动，对富农过多的肥田，则说服他进行抽肥补瘦，适当调整，富农小量出租的土地，土地法规定是保留不动，但在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因粤东地少人多，群众要求分配，我写信给中南局请示如何处理，11月中南局答复：“对富农的封建性出租土地基本上是应当动的。”根据中南局这一批复，我们对富农的出租土地采取了征收的办法；对富农和富裕中农放的高利贷，取消其高利息，本钱还给他们；对中农和富裕中农的一切土地财产，一律保护不得侵犯。

分配土地和其它财产的方针是在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前提下照顾其他阶级。具体的就是满足贫雇农对土地要求，坚决保护中农，保存富农经济，照顾小土地出租者。分配的原则是按人口平

均分配。方法是照顾原耕者，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七、几个特殊问题的处理

1. 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

广东是侨乡，华侨问题是广东土改中碰到的一个特殊问题。据土改时的调查统计，当时居住在海外的粤籍华侨约为640余万人，占全国华侨总数80%强，占全省总人口的20%。华侨眷属，多数留居原乡。在进行土改试点的三个县中，揭阳和兴宁的华侨比较多，如揭阳县，全县98万人，海外华侨13万，在乡侨眷23万，占全县总人口的23%强。侨眷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侨汇，如抗战前广东侨汇每年平均为2.6亿元，折合美金8000万元，占全国侨汇总数的80%，是我国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侨汇除维持侨眷生活外，部分购买了土地、盖了房子，置些产业，投资工商业及兴办公益事业等。抗战结束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时的通货膨胀，和外汇管制，1946年60%的侨汇转移到港、澳，到1948年则转之一空。因此土改时对华侨的土地财产的处理，要特别慎重。处理好，可安定海外华侨及其在国内的眷属，争取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同情土地改革，巩固我党和华侨的统一战线。处理不好，就适得其反。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曾反复讨论研究，并组织人起草了几个关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上报政务院。1950年11月7日，政务院下达了《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的规定。为了使下面能够正确执行政务院规定的政策，华南分局又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这些界限，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将国外的人口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凡在国外从事体力劳动者，均以家庭有劳动力计算（分配果

实时不计国外人口），这样就将许多侨眷划到劳动人民范围之内，据揭阳三个华侨最多的区统计，土改时刻的华侨地主占华侨总户数的2%左右；

（2）严格区别出国前就是地主者和出国后其家庭上升为地主者的界限。对前者按一般地主对待，对后者只没收其土地，对其房屋、耕畜农具、粮食均不动；

（3）过去是劳动人民的侨眷，解放前三年因有侨汇回国，购置十余亩土地，以后才放弃耕作靠出租土地和侨汇维持生活，这些人剥削不大，可有意识地把他们划为其他成分而不划为地主，以防打击面过宽，但其土地可依法征收。

（4）对华侨中的劳动人民（工人、职员、小商贩、自由职业者）的少量出租土地，其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200%者，均保留不动；

（5）侨汇一律不动。

我们按以上政策界限执行，使95%以上的华侨在土改中得到保护，从而团结了大多数。

在处理华侨的土地财产时，还有一个问题要特别讲一下的，就是关于华侨房屋的处理问题。《土地改革法》规定，对地主是没收其多余的房屋，多数华侨在家乡盖了房子，且他们盖的房子一般比当地农民的房子要大些、好些，除了给留在家乡的眷属居住以外，有些房子是留着自己回来探亲祭祖时住的，也有些房子是借给其他农民居住。这些房屋显然是多余的房屋。我们考虑如果将这些多余的房屋没收，在分配果实时，固然可以宽松些，但也不能完全满足贫雇农对房屋的要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雇农的居住问题。一旦华侨回家乡探亲，见祖屋被没收，在思想上会引起很大反感，有的甚至不再回来，这样我们就会失去海外华侨对土地改革甚至对人民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如果我们将华侨的这些房屋保留，或暂时租借给无房少屋的贫雇农民居住，所有权仍

归原主，这样土地改革对华侨的震动就不会太大，就可以争取他们多回来探亲，和在国内投资，这对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经请示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后，将华侨这些多余房屋予以保留，没有没收。华侨对此反映很好。如揭阳县安乐区蓝桥村，在没收征收的那天，有家姓郑的华侨地主弟兄三人，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到门外，准备农民来没收房屋，但成队的农民走过他家门口时，对他们说：“我们按政策办事，你们是出国后劳动上升的华侨地主，只没收土地，农具不动，除原来是农民居住的房屋以外，其余房屋一般不动，东西搬回去吧！”郑家兄弟很感激人民政府和农民的照顾，立刻写信到南洋，向他们的家人报告人民政府照顾华侨的情况，在当地华侨中引起很好的反响。建国初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封锁，争取海外华侨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和技术封锁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我们的做法后来受到批评，说我们“照顾其他阶级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阶级分析……”等等。在土改复查和其他县的土改中，将许多华侨的房屋没收了，以后又随着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对华侨房屋的政策也几经反复。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团结海外华侨，争取他们对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支持，在国家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拿出巨额的资金来退赔，仅广东一省用于落实农村华侨房屋政策的补助款共4.93亿元，至今仍有97万平方米的农村侨房尚未清退，尚须补助金3880万元，才能使侨房政策逐步得到落实。

2. 对工商业者的政策

广东是沿海省份，工商业比较发达。在进行土改试验的三个县中，尤以兴宁县的工商业较多，据土改时统计，全县58万人，

从事纺织业者就有7万多人，全县有染织厂138家，染布作坊50家，布店183家，棉纺商行22家；另有其他工商业258户。城镇的工商业者，不少在农村有房屋，有土地，有的自耕有的出租；农村的地主也有不少在城镇兼管工商业，工商业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地改革中，对待工商业的政策，在《土地改革法》和中央的方针政策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是完全按照中央的规定去做的，在执行过程中对几个具体问题是这样处理的：

对工商业兼地主者，坚决割掉其封建尾巴，即没收其农村的土地，耕畜、农具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对其自住的房屋超过了一定的数量，则予没收。“一定的数量”没有统一规定，各县、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对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按《土地法》规定，没收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多余的房屋，其属工商业的部分，不论在城镇或乡村，都没有动。为了保持城镇的繁荣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无论是对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的都没有让农民进城去清算索赔。这也是后来批评我们照顾其他阶级多，没有首先考虑满足贫雇农要求，缺乏对贫雇农的感情的问题。当然，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是土地改革的一个首要任务，土地改革的结果，也是有利于穷苦的农民，帮助农民解决了一些穷困。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的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只有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了，农民的穷困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只能部分地解决农民的穷困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一切穷困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用破坏工商业的办法，来满足贫雇农一时的要求，来解决农民一时的穷困问题。这不是对穷苦农民有没有感情的问题，而是从眼前考虑还是从长远考虑帮助农民彻底摆脱贫困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48年毛主席就尖锐地批评过的，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对于这种已经批判了的错误，没有必要再去重犯。

3. 乡村小圩镇的问题

在广东农村小圩镇比较多，在圩镇里有些工商业者，但多数是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圩镇的四周就是农村，因此，这些人很多在农村有土地，有自耕的也有雇人耕种的，有的有小量出租，如何划分他们的阶级成份，比较复杂。对这类问题，在土改工作团，看法也不完全一致，大家感到没有把握，我就回来请示叶剑英。叶剑英对我指示说：“在土改运动中，一定要保持市镇的稳定，不要乱。小市镇是农村和城市的桥梁，是农村通向城市的喉管，人类在原始社会时代就懂得交换，交换是一种手段，农民生产的东西要通过市镇来交换，农民群众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如油盐酱醋、火柴、肥皂等都要从小市镇上去买。农民种的蔬菜、水果，养的家畜家禽，要拿到市镇去卖。所以一定要保持市镇的正常营业和繁荣，这样才能促进城乡交流，促进农村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市镇上的小商、小贩不能划为资本家，对又种田又做工或做小买卖的，如织布的、卖锅的等等不能划为地主，他们的土地不能没收，要保护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我们在三县试点时，遵照叶剑英的指示，在市镇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宣传，宣传土地改革的政策，稳定市镇各阶层人的情绪，发动他们支持土地改革，同时在农村广泛宣传党对市镇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的政策。从而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保护了市镇的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保持了市镇的稳定与繁荣。

4. 如何对待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的问题

兴宁和龙川两县都是和平解放的，1949年5月，在中共华南分局的策动下，国民党广东省第九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保安十三团团团长曾天节，率所属军政人员起义。兴宁、龙川和平解放。因此，在试点的三个县中有一批起义人员。另外，这三个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建立过红色政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都是游击区，有些人在二战时，曾经打过红军，甚至杀过我们的人，但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又跟我们合作，或支持过我们，在危险时掩护过我们的同志，关系比较复杂。这些人在与我们合作和帮助我们时，往往是秘密的，隐蔽的，群众不知道，他们在打我们时，是公开的。他们往往又是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过农民。土地改革时，群众发动起来了，就要求把这些人拉回来斗争。在土改工作团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主张拉回来斗争。有些在本地参加过游击战争的同志，了解情况，不同意拉回来斗争。我认为起义人员或过去帮助过我们党的人，即使他们过去做过一些坏事，也应既往不咎，应该团结他们，不应拉回来斗争，不然人家会说我们过河拆桥。这个问题牵涉面比较广，是个重要问题我不敢擅自作主，便回来请示叶剑英，叶剑英对我说：“对民主爱国人士、起义人员，我们要很好团结他们。过去有血债的，在困难时帮助过我们的，或现在向人民起义了，已经放下了武器，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也应该很好团结他们，决不能拉回去斗争。他们的家庭成份，应按他们的经济状况划分，该划什么成份就划什么成份，他们以前在家乡修的碉堡要拆除，枪枝、弹药和一切军用品都要没收。”叶剑英还指出：“对地主的子女，凡在外面读书、做事或做生意的，也不能拉回来斗争，他们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但他本人的成份是什么职业就是什么成份，不能按地主分子对待。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才能更好地孤立地主。”我回去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按照这个指示执

行，在三县土改运动中，保护了一批民主爱国人士和起义人员。兴宁县在分配果实时，将李洁之先生在农村的房屋分了，后来，分局统战部派人下去，和土改团一起做群众工作，又把这些房子退回了李洁之先生。后来在土改复查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杀了、抓了。这几年又重新给他们平反、落实政策。

八、三县土改的成绩和问题

兴宁、揭阳、龙川三县的土地改革，由于有了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于华南分局的领导，尤其是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广东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由于土改工作团各级领导同志、土改队员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他们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到这场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贫雇农的利益，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由于三县的广大贫苦农民对土改的拥护和迫切要求，从而使三县的土地改革健康顺利地进行，较好地完成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务，成绩是显著的。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三县土改共没收土地 588320 亩，耕牛 5446 头，大小农具 140901 件，房屋 57313 间，粮食 84895 担。地主占有的土地，三县分别从土改前的 34.4%、40%、45% 下降到 1.6%、3%、4.4%。土改后平均占有土地，兴宁是 0.62 亩，其中地主为 0.46 亩，贫农为 0.56 亩，雇农为 0.55 亩。揭阳县人平均占有土地为 1.005 亩，其中地主为 0.865 亩，贫农为 0.966 亩，雇农为 1.050 亩。龙川土改后，全县人平均占有 4 厘，其中地主平均是 3.4 厘，贫农人平均是 3.7 厘。三县土改后地主人平均占

有土地均低于全县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数，更低于贫雇农人平均占有的土地。这样就废除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剥削，改变了长期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的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土改后在农村掀起了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三个县的粮食比1950年分别增产1070万斤（兴宁），2313万斤（揭阳），龙川则增产20%。

第二、从政治上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土改后各乡、村建立了人民政权，各村成立了治安小组，登记户口，调查匪特，维持社会治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农村各群众组织，三个县农民协会会员共增加123783人，民兵增加31821人。在农民协会、民兵、妇女等组织中树立了贫雇农的优势，世代代被压迫的穷苦农民成为主人；土改肃清了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收缴了残存在农村的枪支弹药，据不完全统计，兴宁缴枪1613支，揭阳缴枪1894支，龙川缴枪968支。各县民兵不分昼夜，不顾风雨，站岗放哨，护路守桥。如龙川上坪过去是一个土匪窝，土改后由赣南窜来15个土匪，立即被民兵包围俘虏缴枪。使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社会治安得到稳定。

第三、巩固了工农联盟，贫雇农翻身当了主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踊跃参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参军4025人）；土改后三县农民积极参加修建国防公路，兴宁出动26.8万多人，完成103公里的筑路任务，建桥113座，涵洞122个。农民自带被服，到工地安营扎寨，日夜奋战，许多领导同志见此情况夸赞说：“如当年老解放区人民支援前线一样”；农民踊跃交售公粮，支援国家建设。

第四、提高了农民的觉悟，打破了宗法观念，基本消除长期存在的房界姓界之间的械斗，增强了农民之间的团结，并破除了

一些旧的习俗。

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而又复杂的社会革命，特别在广东阶级关系比较复杂，又是新解放区，无论是干部或者群众，都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虽然中央在方针、政策、办法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一接触到实际，还会碰到许多实际问题，需要慎重处理。对这些问题凡是我自己感到没有把握或影响较大的，我便回来请示分局和叶剑英，分局不能解决的，便请示中南局，得到指示后，再回去贯彻执行。尽管这样，在实际工作中，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我们的土改工作团6000多人，各人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工作经验，文化修养等方面不同，对于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解程度也就不能完全相同，在贯彻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因此，运动的发展也就会不平衡，有的区、乡工作搞得好些，有些区、乡的工作稍差一些。有个别的乡和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斗争不彻底，划成份时将个别小地主漏划了。也有个别乡村斗争搞得过火了，将富农甚至个别中农错划成地主的情况。对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土改工作总团和分团发现了的，便及时予以纠正，也有个别漏划或错划的成份，到土改结束时还没有被发现或予以纠正，直到以后土改复查时才纠正的。存在这些问题，并不奇怪，“人无完人，金无足金”，更何况要改变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样一场大的社会变革，不可能一点小问题都没有，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

九、对三县土改的再认识

三县土改结束后，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对三县的土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50年3月，方方代表分局对三县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总结，认为三县的土地改革，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阶级敌人基本上被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

制，在土地改革中没有侵犯工商业，没有侵犯中农，没有乱杀，保存富农经济，照顾了华侨，照顾了其他劳动人民，打破了房界地界矛盾（这是广东农村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认为三县的土改试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全省的土改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三县的经验值得向全省推广。方方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三县土改存在的缺点：群众发动的不充分，不巩固，基层整顿不够；对敌人打击不够狠，不彻底。

1950年1月和4月，中南土委会的领导同志两次来到广州，先后召开了十一县土改总结会议和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对方方的总结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广东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第一，十一县的土改，缺乏农运高潮，党内部分同志未坚决站在农民方面，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斗争；第二，照顾其他阶级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阶级分析；第三，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第四，广东基层组织不纯，不能依靠。这四条就将三县的土改全盘否定了。当时华南分局的领导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长江日报又连续发表《论正在前进中的广东农民运动》和《认真学习，稳步前进——再论广东农民运动》两篇社论。后来三县的土改也被指责为：“和平土改”，领导土改的各级干部都被迫作了检讨，有的还受了处分。我这位具体领导人，当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检讨了几次，我的省土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虽未明确撤销，但也是名存实亡。我被下放到惠阳地区去土改。分局的领导明确向惠阳地委书记梁威林交待：“大姐是老同志，有经验，但在土改中犯了错误，是来锻炼的”。梁威林对我很好，把我安排在新田埗。我下去时带了秘书王广平，我们和群众同吃、同住，参加各地的土改。不久，北京中联部副部长李凡夫带了一批越南人、缅甸人和日本人来参加土改，来到惠阳地委，梁威林就要我到他们那里，把那批外国人交给我管，我就带着这批外国人在惠阳地区搞土改，直到土改结束，才又把

我调回省委，要我当贫协主席，又当巡视员到处跑。1952年到粤中区党委任第二书记，参加粤中的土改。1954年任粤中行政区党委第一书记。

我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干部，长期在根据地做群众工作，对农村的情况是熟悉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直接参加了闽西的土地革命。我们按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开展土地革命，群众很拥护，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后来，以王明的“左”倾错误的领导，党中央机关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搬到中央苏区，也把“左”的一套搬到中央苏区，他们批评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来了个“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地主扫地出门，把地主剃成阴阳头游街。结果，许多地主富农逃到山里，使中农害怕，对这种做法也不满。一些地主富农出身参加了多年革命的同志，也被清洗出去。这样做的结果是孤立了自己，增加了根据地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时，加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造成根据地斗争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而开始了长征。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不应该忘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于1946年发出“五·四”指示，将抗战时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当时我在华中局任民运部副部长。我带工作队到淮安县鹅钱乡搞土改试点，后来有些地方，土改搞的很厉害，又是把地主扫地出门，侵犯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等等错误。邓子恢和曾山要我到山东莱阳地区去纠正这些错误做法。因此，我对土改中那些“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是深有体会的。

1948年，中央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纠正这些“左”的错误，并对我们党三十年来指导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土地改革中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已经

用国家法律和政府规定的形式向全国公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种规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应该模范地贯彻执行国家和政府的法令，不能按个人意志随意更改法令。更不能重犯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而已被党中央纠正了的错误。如果明知是错的，还要去做，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能原谅的。因此，我在具体领导三县的土改工作中，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决按《土地法》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力求杜绝那些乱打乱杀，侵犯工商业、侵犯中农等方面的错误再发生。

关于发动群众的问题，我们党一贯倡导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我们在发动群众时，既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尊重他们的创造力，但同时也要对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对他们的自发势力，必须善于引导，无条件的歌颂自发势力是错误的，笼统的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尾巴主义。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能做群众的尾巴，而要善于引导群众进行正确的斗争。要善于预防和及时克服群众运动中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一些违犯政策的混乱现象，把土地改革这场群众斗争引导到党中央的政策和人民政府颁布的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的去进行。

三县的土地改革就是这样去做的。三县的土地改革，是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同志直接抓的一个典型试验，目的是为了取得经验，培养干部，把全省的土地改革搞得好些。

在土改试点工作开展前，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同志，对广东的社会情况、阶级状况和干部队伍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要求各地区从群众、干部、办法三个方面进行积极的准备。叶剑英同志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广东濒临沿海，华侨多、工商业比较发达等特点，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比较稳妥的办法。在三县的土改中，结成了比较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既狠

狠地打击和孤立了封建地主阶级、又团结了大多数的各阶层人民，从而使这三个县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在顺利完成土地改革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城镇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正常进行。这体现了叶剑英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思想作风。但是，在当时这种实事求是的正确作法，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反而受到批评。三县的土改试验被指责为“和平土改”，参加这一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被迫作了检讨，不少同志还受到处分，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长期受到压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直到1986年叶剑英同志逝世，党中央在致叶剑英的悼词中写道：“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他领导的广东土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一历史问题，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检验后，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使当年参加三县土改的广大干部，放下了长期背着的“和平土改”的沉重包袱，积极投入到祖国四化建设的事业中去。

我作为当年三县土改的具体领导人，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前车之鉴，供后人参考，我想还是有所裨益的。

后 记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70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全党同志、广大人民群众英勇牺牲、艰苦奋斗而得来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就我个人来说，只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人民群众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之所以将我60多年的经历记录下来，主要是为后人提供一些具体的历史事实，供研究我党历史的参考，也使后人了解我们这一代人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的真实情况，使他们懂得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艰巨的曲折的，胜利来之不易，希望能激励他们继续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

这部回忆录是在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现党史研究室）的多次敦促和帮助下完成的。他们派了专人对我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访问，根据我的谈话记录和提供的线索，搜集资料和采访有关的同志，综合整理成文，经我审阅，经几次修改后才定稿。尽管如此，由于时隔久远，我的笔记和保存的材料在战争年代都已损失殆尽。因此，回忆录所记述的事情可能有挂一漏万或失之谬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回忆录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郭洪涛、王达成、罗明、侯政、刘英、邓六金、彭儒、钟月林、谢小梅、贾红玉、陈兰、李钊、彭炎、阮波、程桂芬、贝纹、张真、章行、石磊、刘道鐸、何璧、侯任成、王广平、吴成等同志的热情支持、提供宝贵的资料。还得到了广东省档案馆、福建、江西省委党史办，丰顺、长汀、龙岩、遵义、定边、溧水、广德、淮安、兴宁、梅县等地、

县党史办的协助，提供资料。在此，向他们一一表示感谢。

陈丕显同志为回忆录撰写了序言，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同志、省委党史领导小组顾问杨应彬同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遐瓚同志对回忆录的撰写和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对他们深表谢意。

回忆录由杨起君同志具体帮助我执笔撰写，写作的过程是：1985年完成的初稿，1937年以前的部分由杨起君整理，李汉今同志参加了研究、讨论并提供调查线索和部分资料，李森祥同志帮助整理1938年至1949年的初稿。初稿经我审阅、修改，并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由杨起君继续搜集资料和整理，于1987年写成全书第二稿。经我审定后，部分内容先后在《党风》和《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再由杨起君帮助修改，于1990年完成了第三稿，并经我最后审阅定稿。在修改过程中，梁春和省党史研究室的其他一些同志也给予大力协助。

这部回忆录仅是我在民主革命历史阶段经历的回顾，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历仍将继续撰写。

李坚真

1990.12.4.

责任编辑·邹林春

封面设计·胡燕欣

ISBN 7-80023-387-1 / K · 390 定价: (精) 7.50 元 (平) 4.50 元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序 [陈丕显]

第一章 踏上革命征途

一、苦难的童年

二、彭湃指引我走上革命路

第二章 参加武装暴动

一、丰顺暴动

二、年关暴动

三、丰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四、饶和埔根据地

第三章 进入中央苏区

一、在闽粤赣特委

1. 和村巧遇张鼎丞

2. 首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3. 闽粤赣边区第一次党代会

4. 反“立三路线”

5. 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6. 闽西山歌

二、到长汀当县委书记

1. 嫩肩挑重担

2. 布置假会场

3. 周恩来的教诲

4. 闽粤赣省党代会

5. 腿勤、手勤、嘴勤

6. 支援东路军攻打漳州

三、闽西的土地革命

1. “抽多补少”与“抽肥补瘦”

2. “何时分田何时得禾”的后果

3.按人口分田还是按劳力分田

4.查田运动

四、在福建开展的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1.事情的起因

2.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情况

3.强迫命令进攻大田屋

4.李明光牺牲

五、重回省委妇女部

1.陈潭秋指导我做女工工作

2.福建省第三次党代会

第四章 在红色首都瑞金

一、进中央党校学习

1.党校的课程

2.董老是非分明

二、在中央局妇女部

1.中央局机关

2.苏区的妇女工作

第五章 长征

一、出发前的准备

二、踏上长征路

1.告别众乡亲

2.途中的群众工作

3.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4.在土城安置伤员

5.遵义会议的传达

三、长征中的干部休养连

1.特殊的连队

2.钟赤兵锯腿

3.茅台酒香

4.报务员不能丢

5.贺子珍负伤

6.寄放连长之争

7. 金沙江畔的欢声笑语

8. 难以忘怀的收容队

9. 过泸定桥

10. 雪山千里行

11. 女红军的艰辛

12. 七天七夜过草地

四、长征胜利到陕北

1. 脱离险境

2. 胜利到达陕北

3. 长征山歌

第六章 陕北岁月

一、初到陕北

1. 从吴旗到瓦窑堡

2. 瓦窑堡的婚礼

3. 赤源筹款

4. 谢唯俊同志牺牲

二、到陕北省委

1. 在省委妇女部

2. 三边巡视

三、重回中央妇女部

1. 洛甫召见

2. 率工作团进延安

3. 参加延安会议

4.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党代会

5. 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

6. 三进中央党校

第七章 奔赴华东抗日前线

一、参加新四军改编

1. 到长江局

2. 新四军一支队的改编

3. 新四军二支队的改编

4. 闽西妇女的杰出代表范乐春

- 二、在江西省委
 - 1. 重建省委的工作
 - 2. 抗战初期的江西妇女工作
 - 3. 江西青年抗日服务团
- 三、到东南局妇女部
 - 1. 撤出南昌
 - 2. 东南局妇女部

第八章 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 一、在苏南根据地
 - 1. 到上海治病
 - 2. 到新四军军部
 - 3. 苏皖区党委党校
- 二、邓振询在皖南和苏南的工作
 - 1. 皖南特委书记
 - 2. 苏皖区党委书记
 - 3. 痛失亲人
- 三、再当县委书记
- 四、在苏皖区党委组织部

第九章 在华中分局民运部

- 一、淮安鹅钱乡的土改实验
- 二、新安和莱阳土改
- 三、撤退到大连

第十章 华东局的妇女工作

- 一、发动妇女群众支援淮海战役
- 二、率团出席第一次全国妇代会

第十一章 广东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 一、重回故园
- 二、兴梅调查
- 三、“全省着眼，三县着手”
- 四、土改机构的建立
 - 1. 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组建
 - 2. 省土改工作团的组建

五、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步骤

六、三县土改的具体做法

七、几个特殊问题的处理

1.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

2.对工商业者的政策

3.乡村小圩镇的问题

4.如何对待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的问题

八、三县土改的成绩和问题

九、对三县土改的再认识

后记

附录页

封底